



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

[以色列] 奥莉·卡斯泰-布龙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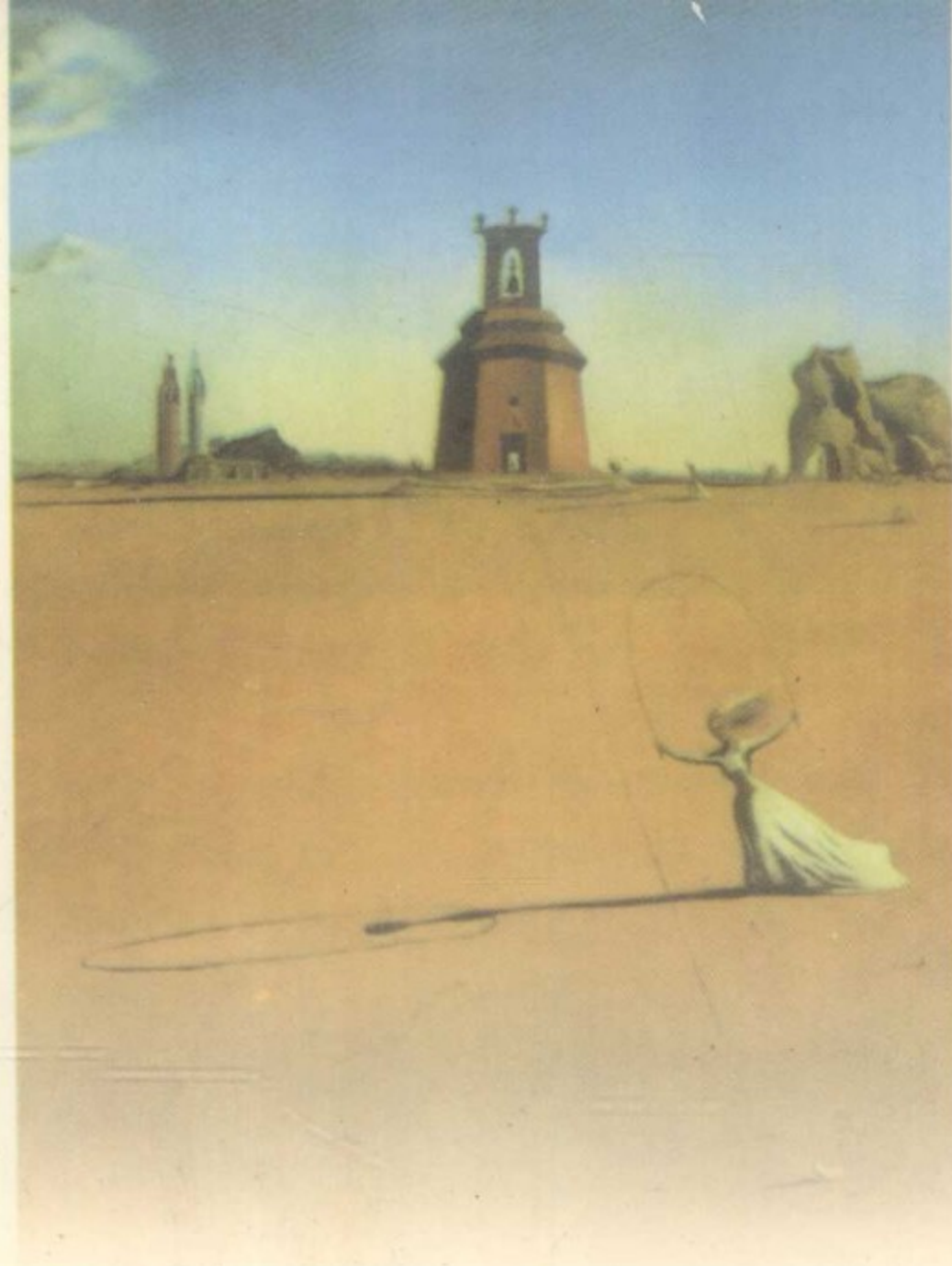
# 米娜·丽萨

现实与幻觉交织的世界  
乘着荒诞之波飞行  
扭曲的时空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26231





ISBN 7-5004-2322-5



9 787500 423225 >

ISBN 7-5004-2322-5/I · 323 定价：9.00元

# 米娜·丽萨

奥莉·卡斯泰—布龙 著  
杨玉功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

米娜·丽萨

The Mina Lisa

by Orly Castel-Bloom

Copyright © by Orly Castel-Bloom.

Chinese Translation ©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Ramat Gan, Israel.

---

本书由以色列希伯莱文学翻译所授权出版

新  
平  
和  
解  
學  
PDG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字: 01-98-127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娜·丽萨 / (以) 布龙 (Bloom, O.C.) 著; 杨玉功译.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8

(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

书名原文: The Mina Lisa

ISBN 7-5004-2322-5

I. 米… II. ①布… ②杨… III. 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9705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燕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106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9.00 元

## 译者序

对于小说的翻译，我以为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对原书性格的总体把握，译者应深入书中构造的世界，用心体会书中的意境，这样才能在翻译时蓄积足够的“气”，吹入译文的躯体，使它活跃起来，赋予它生命；二是对细节的传达要曲尽其意，力求直透，譬如临摹王羲之《兰亭集序》，连其中的笔误也是要照单全收的。

以色列女小说家奥莉·卡斯泰—布龙的《米娜·丽萨》是一部“特别”的书。说它特别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但在我读过的有限的书中，还没有一部使人如此真切地产生“不知此身何处”与“不知今昔何昔”的感觉。你看，它的开头应该说是亲切而平易，普通的家庭妇女的“我”，丈夫，孩子，丈夫家的老太太，然而没过多久味道就变了，这个老太太弗罗拉竟是个二百多岁的吃纸的“怪物”；这也罢了，反正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读者的眼界又宽，不过稍感新奇而已；但是还不够，弗罗拉还要带“我”乘胡话之波飞往现实与幻境的不可思议的差异之地，于是以读者想象力之丰富，要跨越似乎此身此时此地的现实与荒诞不经无法可想的境界之间

的广大之极的时空序列也不免感到吃力。因而本书的性格无论从哪方面讲都配得上“现代”一词的最现代的涵义。“现代”往往是“不可理解”的同义语，本书也不例外，然而它毕竟是可理解的，因为它的视角始终是“我”——一个写过剧本的普通的称职的家庭妇女——的视角。作者通过“我”而引导读者领略了一番奇异的风景。

本书原文是希伯来语，中文版是根据英译本译出。譬如摄影，一般而言翻拍的照片总要比直接冲印的照片要损失一些分辨率；但也不尽然，用专业的翻拍技术制作的片子可能比质量低劣的直接冲印的照片还要清晰。所以只要眼光好，光圈大，在原本光线暗弱的文字环境中也可摄得清晰的意义。本书的文字平易，活泼而机智，且不乏不经意的讽喻及幽默。书中的一些意象值得注意，诸如：胡话助你飞升，实际上胡话助你飞黄腾达也未可知；这本是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箴言”，不过在书中，胡话变成了物理世界的“波粒二象”中可以载人升空的波；“精神食粮”本是一句老生常谈，又如所谓“含英咀华”，都是说用嘴吃烧鸡与用心智之口“吃”诗文反正都是“吃”，而在书中，两种吃合二而一，变成了弗罗拉吃剧本中写有对白的纸，想必哈姆雷特的独白之类是这位可敬的老太太常吃的项目；书中情节的高潮是时间警长的加冕礼，即谋杀了正警长的副警长“强暴”吃书的古董老太太的仪

式；倒也不错，现代电影除了“性”与“暴力”，所剩也就无多，书中对此是一种“干净”的也是匪夷所思的讽喻。

最近与我的一位学生聊天，他谈到：文字所创造的世界应该自成体系，未必与现实的物理的世界相关。这确实是欣赏许多“非传统”作品的一个切入点，是真正心智享乐的开端。一般而言，有的作品诉诸于读者的逻辑的亦即现实的心理状态（比如莎士比亚），有的作品诉诸于读者非此世的想象的能力（比如但丁），而《米娜·丽萨》一书则表现了一种“扭曲的逻辑”：平常人的视角与反逻辑的语言构成相映成趣，想象性的比喻降落在现实的地上成为肉眼可见的东西。也许本书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它的写法；不在于它现实的地位，而在于它所启示的方向；不在于在其中能读懂些什么，而在于读过之后的真实的意识转变。

本书的出版多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曹宏举先生的关注与努力，在此深表谢意。笔者浅陋，译文中的错漏之处，请专家前辈不吝赐教。

杨玉功

1998年6月于海淀西三旗



## 《米娜·丽萨》故事梗概

米娜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三十八岁，每天尽心尽力地照顾她的丈夫奥维德和三个孩子，生活优裕而平静。但自从奥维德的祖母弗罗拉进入他们的生活，一切都急转直下。米娜偶然之中发现弗罗拉把她做的饭菜扔到花园里，却大嚼她过去所写的电影剧本。而奥维德告诉她：弗罗拉生于十八世纪希腊克里特，由于谨守摩西“要孝敬父母”的宝训而获得长生，至今已有二百多岁了。弗罗拉尝了米娜的剧本后就再也不想吃任何山珍海味了。所有的剧本都吃完之后，米娜拒绝提供新的剧本食物。后来她发现弗罗拉原来是“时间警长”的情人，米娜被迫就范。弗罗拉怀疑“时间警署”副警长谋杀了时间警长，于是弗罗拉与米娜乘荒诞之波进入幻觉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去进行调查。不知她们此去命运如何……

## 作者简介

奥莉·卡斯泰—布龙于 1960 年生于特拉维夫。她曾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电影专业。小说《我在何方》获 1990 年特拉维夫文学奖，她还获得 1992 年总理文学奖。她的第一部剧本《购物街之夜》在海法剧院公演。

责任编辑：周晓慧  
责任校对：林福国  
封面设计：王 华  
版式设计：王智厚

# 第一部 暴露

---

## 1

在生活的喧闹忙乱之中，有时我们会忘掉弗罗拉。她坐在自己房间的扶手椅上，如同一件过去历史留存的古物，等待我们之中有人挤出时间去看她。她不会弄出一点响动。任何别的什么人早就会变得满怀怨恨，或眼泪汪汪，或灰心丧气，但弗罗拉不会。无论我们谁去看她，她都会神情自然地接待，而且带着一丝惊喜，仿佛某个自由的精灵飞进了她的房间，而转瞬间又要飞出去似的；谁也无法确切知道她在我们进门、停留和离开时的感受。

家里的大多数人总是很忙，于是照顾这件古物的差事几乎毫无例外地落在了我的头上。谁也没有像我那样说那么多诸如此类的话：去看看弗罗拉；弗罗拉很孤独；弗罗拉有点紧张；可怜的弗罗拉，她整天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也许该有人冲

她笑了一笑——但大家都明白，由于我的职业肉眼难以识别，我才是那个应该负责她的健康及其室内温度的人。她对天气的变化异乎寻常地敏感，你甚至可以说：天气就是她的生活。她对“你好吗”这句问候的回答首先是：我觉得热，要不就是我很冷；把暖气调高点，或者把暖气调低点。

自然，我还负责带她出去散步，不过速度是每小时一米整（你可以想见我领她横穿马路时会引起多大的骚动）。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会把她装上我那辆老通用车，带她出去兜风（这样我当然更喜欢）。我这个人谁也不肯信托，连自己也不信，却被付与带弗罗拉外出的任务，我也只有顺从。认真而无可奈何地尽我所能罢了。凡是我能想到，那辆通用车也能跑到的地方，我都会带她去，只要午饭前赶得回来就行。而那时正是孩子们饥肠辘辘地从学校或幼儿园赶回家，急需他们的妈妈、她的饭菜以及她的耐心的时候。

我们曾去过阿弗拉、阿什克隆和耶路撒冷。在这些往返的旅程中，弗罗拉就坐在我身边。她的脑袋不是左右摇晃，就是四下转动，忽儿认真，忽儿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急速掠过的景色。我透过睫毛朦朦胧胧地瞥了她几眼，弄不清这位老太太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也许她是在比较这一次与那一次的异同，也许是在回想过去的美好时光；一个人能作出多少类比，你还能得出多少莫名其妙的结论呢？

但我还是去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我带老太太从所有那些地方来来往往，我还尽力照料她所有身体上的需要，正如我会尽力照顾所有其他家庭成员的需要，包括我的丈夫和三个孩子。我毕竟是家中的女性角色，我是家中的主妇。作为家庭主妇，我有收拾东西、清洁房间以及偶尔做出牺牲的天



赋，当然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收取报酬。是的，我要求给我的牺牲以充分的报偿，而我的奉献也不会是那么廉价。



弗罗拉是一个责任迅速减少的自主的人类个体，当然主要是权利在迅速减少；但随着一大笔款项的支付日益迫近，而且由于我对这位老妇人的爱，我必须在我每天的日程中找出一些空隙来讲一讲她的故事，以及因为她而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不管到目前为止我明白还是不明白。让我遗憾的是，事情的记叙不得不在较短的时间序列中完成；我缺乏足够的空闲时间，无法涉及犄角旮旯般的故事细节。这使得这件事更加困难，但回头再一想，这是一件极好的事。事实就掌握在我的手中，不需要虚构任何东西。而且，夜晚长时间的写作有可能把外加的意义引入事件的进程。因而，尽管时间和空间的压力都会给我一定的限制，我毫不怀疑，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会得到准确、全面、生动而真切的叙述。为什么还要浪费更多的口舌呢？时光苦短，而我重任在肩。



有关弗罗拉某些性质及特征的真相开始泄露出来——真相总是这样泄露的。它一旦泄露——你可以惊恐万状，也可以承认你早知如此，像一座围城的卫兵一样，它就在你意识的入口处，你却不敢承认。从她进入我们家的那一刻开始——那是在我婚后的第十一个年头，在我丈夫奥维德的妈妈被一辆巴士撞死之后不久——我就觉得这

个老妇人身上有点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我在年轻时也有过祖母，实际上是她们把我养育成我现在这个样子——一个女人，或者说，一个女人气十足的女人。而她们，我的祖母们，对事情总有一些自己的理解，也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而弗罗拉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她发表自己的意见，她总是有话可说，但她的结论总是大而化之，而结果她几乎总是对的。而且，她从来不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之类的话。

在我们家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她的行为让我感觉不太舒服。由于年龄、经验和阶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过去奥维德死去的母亲待我极其傲慢；总是对我操持家务的方式横加批评，这些批评又总是以一般性建议的面目出现；而弗罗拉却把我当作远景中的一个点，当作画面下方一长列柏树中的一棵树上的一小节蜷曲的树杈。

我知道她是奥维德的祖母，一直与他的母亲一起生活，直到他母亲被巴士撞死为止。既然我丈夫是独子，她理所当然地会来与我们一起生活，直到她寿终正寝。我把这看作是一种家庭义务，一种由母亲传给儿子的责任，当然这个儿子要有一位可信赖的妻子。尽管把一个外人带入家庭的圈子相当困难，但我必须强调，发生在三月底的这次进驻行动完成得无懈可击：通过车库旁的后门，再穿过大花园中我种的多汁植物，从那儿来到厨房，再从那儿带上一托盘我烹制的相当美味的菜肴，上楼来到我们为她准备的房间，这也是我极少有机会使用的书房。换句话说，一切都顺理成章。当天晚上，等一切都各就其位时，根本不可能找出任何证据表明：在这个家中生活的人数已经多了一个。回顾把她安置在我们家的过程，我可以给满分：毫无纰漏。



她不喜欢下楼来吃饭，所以我就不得不一日三次端托盘上楼。可她几乎一点也吃不下去。我以为我的菜不合她的口味，我就问她想吃什么，有没有什么我能给她做的她又喜欢的东西。我要她不必害羞，告诉我她喜欢吃的东西。可她说她什么也不需要。她说，“没什么，没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点也没有”。我发觉她是那种说“一点也没有”，而不是说“没有”的人。这虽无关宏旨，但我还是注意到了。

随着初春的第一簇萌芽，我种下了三色紫罗兰：我把柔嫩的幼苗从黑色塑料箱中取出，轻柔地把它们种在土壤之中。我之所以如此轻柔只是因为我是女人，而女人行事温柔；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主要是由于这些植物本身十分娇嫩。既然它们很纤柔，我也待之以温柔。

正当我在地上按一定的间距开挖细巧的小洞时，我发现土里满是食物。我并不是指土壤的天然产品，而是的确确实烹制加工过的食物。在弗罗拉房间窗户的正下方地面，或在她甩手可及的范围内，食物堆积得尤其浓厚，周围挤满了蚂蚁及其他小爬虫。这与食物变质的时间倒是一致的——一两个星期。我深吸了一口气，强压住心中涌起的对我那位老房客怒火，找来一个塑料袋，装上残余的骨头、豆荚与豌豆，然后又种完了我的紫罗兰。

我知道我不是本故事的主角，但我毕竟是写故事的人，这使我有权利偶尔插进一点对我手艺的恭维之辞：我认为我是一个相当漂亮的业余园丁，我烧的菜也不错。那么，为什

么——我不禁自问——这个老太太要把我做的菜扔出窗外呢？而且，要是她把菜都扔了，那她靠什么活着呢？

像人家常说的，答案不久就见了分晓，尤其是当我加速其出现之时。在我发现她把整盘菜扔出窗外几天之后的一天，我透过门上的钥匙孔观察从她接过我的托盘之后一直到她把菜扔出窗外的过程。你且听听我来讲一讲我所看到的景象：我看见她站起身，看见她打开我存放“零头碎脑”（我就是用这个词来指我的手稿，就像丢失的衬衫上的旧扣子一样）的抽屉，拿出我的剧本手稿，打量一番，然后就咬了一口。真的，就那么冲着我的电影剧本或者小说剧本的开始部分张嘴就咬，然后就咽了下去。

在我看来她好像是神经错乱了。我真的看见她先尝了尝那东西，又把它调一调，仰起头，朝嘴里洒了点盐，然后就嚼一嚼往下咽。我不知如何是好，是冲进屋去保护我未完成的创作（我完成的剧本不到四部，而未完成的大约有二十部），还是回去闭门沉思以彻底弄明白这位老太太的行为呢？生活教我懂得事情往往表里不一。我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告诫自己：也许有一种比事件本身所显示的情形更为单纯的解释。比如，她也许缺乏纸中存在的某种维生素，就像过去缺钙的人往往会吃墙皮。

于是我就撤退，下楼，给自己弄了一杯咖啡。孩子们回家了，我就带他们进行下午的活动，我想等这些活动结束后再说。我会去做别人期望我做的事情，那些书里写的，电影里演的，大家都知道必须要做的事情。而有一个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我：这到底是一段孤立的插曲呢，还是这个老太太一直在吃纸？

# 5

那天晚上，奥维德把我已经听了很长时间的故事的最新进展带回家来，当然是有关他自己公司的故事。他每天长时间在公司工作，换句话说，那公司也归他所有。我丈夫是一个做大买卖的生意人，而且还经常跟我商量生意上的事儿。我呢，也尽我所能给他提供一些我觉得既全面而又行得通的建议。我常常用这句套话：你干吗不如此这般呢？而他则常常回答：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或者他也会说：这主意不错。此时奥维德心绪烦乱，倒不是绝望。他从沙发上站起身，踱到门廊上——从那儿可以眺望对面的旷野——继续琢磨他目前的“大买卖”。我根据说明书把盘子排在洗碗机里，然后上楼来到弗罗拉的房间。

在开门之前我给折叶上了油，我知道这门以前一直吱呀作响。门毫无声息地开了。她在睡觉，她小小的身体在大毛毯中几乎显不出体积，但还是能看出她在那儿。我打开抽屉，弄出响动不大但很讨厌的噪声，但她一动也没动。我拿手中的小手电朝抽屉里照照，我那被吃剩的剧本就在那儿，另外一些她没有尝过。

好极了，我心里想到。这女人在吃我的稿子！我该怎么办？首先，我感到受了侮辱。倒不是我认为这些稿子会有什么光明的结局，也不是认为某个制片人或导演会爱上我那些台词；我都三十八岁了，我知道游戏什么时候结束——尤其是它还没有开始。我不指望我的剧本能拍成电影，可每当我为这个房间的书柜除尘，每当我的眼光扫过这些抽屉时，我知道我的剧本完好无损地存在那儿，这就够了。我没有执行



权，而我的剧本就像是对无名罪行的判决——而现在，我自己的判决都被吃光了！下面该轮到什么了——我不禁要问——我孩子的练习本？我女儿的地理作业？

我关上抽屉，离开了房间，同时在我记忆的每一个角落大肆搜索，试图发现这些未完成的剧本是否在哪儿还有备份。即使没有副本，我也尽力去考察是不是还有可能恢复我十多年前所写的台词，因为她的确没有吃掉整场的内容。我亲眼看见她只是用牙齿咬稿子的边边角角。

于是我的思绪急速飞驰，如同训练有素的宝马良驹（训练它们是我的工作）；我那种现实的乐观主义又开始支配我的行动。我决定等到天亮，查明情况，然后抢救出有问题的文稿，到本地的邮局去复印，即便花去半天的时间也在所不惜，哪怕这会占用我本应随时响应亲人召唤的时间。

可是第二天早上我什么也没有干，我没理会那件事。我让这个侵入我生活的问题去自行发展，而且在以后的几天中，对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一直没加理睬。我也根本没有机会。我开车带弗罗拉去了海德拉附近的某个自然保护区。在那儿有一些塘鹅，弗罗拉看得饶有兴致。那儿还有一个充沛的降雨积成的大水坑，愚蠢的海鸥俯冲下去捕鱼；弗罗拉点了点头，评述道，那些海鸥真是天真，而鱼恰好不在那儿，鱼又是多么机灵呵！

在回家的路上，我换了一个角度来理解奥维德的母亲曾在公共图书馆当过管理员的事实；我突然回忆起她在退休后是如何坚持一周从图书馆借三本书，尽管有一些管理上的困难。当我想到读者打开一本她借过的书时脸上那种惊讶的表情，不禁哑然失笑；而当我想到奥维德的母亲把那些中空的

书交还图书馆时脸上的表情，我更是大笑不止；她当时一定会竭尽全力转移图书馆管理员的注意。假如她还活着，我想我会向她问及那些尴尬的瞬间，我会说：“你想不想谈谈那事？”



在我们已经叙述的那些事发生之后的那一周（的确，这是一个径直发展的故事），有一天晚上，我正坐在床上，面对着电视屏幕：上面正放映着一部电影；观众往往会对这种影片中的主角发出感慨：哇，他真老！我一会儿在看，一会儿不看，看两分钟，随后的两分钟又没看。在其中的一个间歇，我自言自语道：米娜，出于对你本人以及对你那种趋于极致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持家能力的尊重，你为什么要每天给她做饭？无论如何饭菜都会飞出窗外。休息一下，省点钱；你正寻找休息的机会，这不正是个机会吗？把那难以承受的最后一根稻草从骆驼背上拿开。把从窗口扔出去的饭菜捡起来，再装上盘，再捡起来，再装上盘，如此这般地循环往复。大家都在谈再循环，你为什么 not 自己搞点再循环呢？

我就是这么干的。我把一个盘子标上记号，我对奥维德和孩子们解释说那是弗罗拉的盘子，仅供弗罗拉本人专用。我再用另一个盘子把它盖上，于是我就加入了再循环的过程。过了几天，我又加以改进：我把一块大塑料布铺在地上，上面放好盘子。假如饭菜击中盘子——那就太棒了；假如没有——就从塑料布直接入盘再托上楼。

两周之后，当她正在洗澡，一个雇来的园丁正在除草，

洗衣机正在甩干孩子们的花衣服，而我正在擦走廊地毯上的顽渍之时，我暂且停下手里的活儿，走进她的房间，想再瞄一眼她的牙口又干了些什么。这一次我注意到她主要是在咀嚼我写的对白。说实话，我自认为这些对白写得相当精彩。我还发现她特别喜欢我为短片所写的剧本，而对于我为大型故事片所写的剧本，不管是初步的尝试，还是有限的成功，除了这儿或那儿地咬一小口之外，她都很少触及。我不知道她是有所节制呢，还是根本不感兴趣。

于是我又回去继续对付地毯上的顽渍。我想：多可惜呀，我所写的最佳部分——冒号之后的部分——都让人大嚼特嚼过了；而另一方面，它也为一个别的什么都不喜欢吃的老妇人提供了食物……我写的那些东西也不完全是徒劳无益，尽管我是一个被淘汰的已成昨日黄花的剧本的作者，我的作品倒也没有因为我的失败而被冲入下水道。可它们也并没有真正存留下来，我也没有真正地去保护它们，我是说，我本该用牙呀、尖指甲呀什么的去保护我的作品。而我也想到：真荒唐！我的最具独创性的文稿、最具试验性和最具个性的作品，竟然已经被人咀嚼过了。就这样，我不停地思索、考察这些不期而至的矛盾的各个方面。那天下午我甚至告诉了奥维德。他下班回家来显得十分紧张，我好久没有见过他这么紧张了。其实弗罗拉的饭菜这档子事对我来说倒没那么严重。当时电视开着，各种真正令人震惊的事正在世界上发生——一座桥坍塌了，五十个人掉进了水里，几架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竭力试图营救落水者。我对奥维德说：

“告诉我，奥维德，你知不知道这位一千岁的弗罗拉在吃纸呀？”

他一边快速换频道，一边心不在焉地说道（不知他换频道是为了想看点什么，还是只为了好玩）：“那可能是因为她不想浪费我们的饭菜。”他在一个不太清晰的频道上停了下来，也同样是溺死者的尸体被人从汹涌湍急的河水中捞上岸的镜头，同时一个修过眉的现场女记者正在报道某个曾经在灾难现场的人，这个人就出现在屏幕左下角的一个小视窗中。

“那，很好，”我说，“可她确确实实在吃纸。你觉得她能消化吗？”随即我又小声说：“我的剧本，奥维德，她在吃我的剧本！你会怎么想，要是她吃你的……你的……”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对他而言非常宝贵的文稿。甚至钱本身对他来说也没有很大的价值。他一年只做三四笔“大买卖”来维持公司和家庭，而大约有十笔生意不会有任何结果。体育频道上正好有一场危险而疯狂的摩托大赛，他锁定了那个频道，突然来了兴致。

“我们干吗不给她旧报纸吃？”我问道。

“不，她不吃旧报纸。”他随口说道，而话一出口，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你早知道她吃纸？”我惊讶地问道。“你早知道！”我自问自答道，而奥维德则作出苦恼的表情并且闭上了眼睛。

“对不起。”他说着又重复了同样的表情。那个表情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曾看到奥立弗·诺思在接受美国法官的质询时也作过同样的表情：他先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曾有一套科学节目讨论过面部表情和面部肌肉两者之间的联系，以及作此表情之人的情感状态。那套节目的导演曾说这种表情证明此人正遭受着真实的道义及情感的折磨。

“我别无选择。”奥维德同样苦恼地继续说，“知道她吃过真正的经典之作对你有什么帮助呢？”随即他又微微摇了摇头，企图改正自己的说法，“我的意思是说价值为世所公认的作品，我并不是说……”

“你知道，奥维德，你什么都不说可不好。我本可以把别的东西放在那儿的。我终于明白我那些剧本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了。”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想说点什么来安慰我。

“周六我们起早一点儿，看看损失有多大，星期天我把所有剩下的都拿到办公室去复印，好不好？”

“星期六你要飞往欧洲的，记得吗？”

“那也不过十天时间，那我们以后再说，我保证。”

我起身走出门外，坐在我的面包车里，直到我觉得可以出来为止。然后我走进房间，把门甩上，同时反复对自己说：从现在开始我得自己照顾自己、我的孩子，还有我的电影剧本，以及所有其他我所珍视的贵重物品，尤其是平息内心骚动（这是生活对我的基本要求）的东西——安眠药。耐心，这才是你最需要的，我对自己说道。至于其他的一切——让别人去操心吧。



在随后的几天中，我感觉很好笑。我发誓这真让我觉得可笑，甚至在我的天宫图中也是这么说的：本周你将觉得好笑。奥维德不在家的时候，我碰见谁就跟谁开玩笑。我去接送孩子们，去做这个叫做生活的职业框架所要求的一切。当我看着我的小儿子在游泳池里使出全身



气力试图游泳时，我心里想（甚至可能是对自己小声说的）：弗罗拉，祝你好胃口！

这种欢快的情绪进一步四处传布。值三十谢克尔的食品我给了二十谢克尔小费。傍晚，那些送餐的小工把比萨饼送到我们家，我极其大方地把硬币递给他们，他们笑得合不拢嘴，一边与我的孩子们挥手告别，一边骑上他们漂亮的黄蜂小摩托车飞驰而去。我感觉我真了不起；正当我做着这一切时（包括丰厚的小费和四处的欢笑），一个老妇人却正在吃我的剧本，而我没有做任何事情去阻止她。我觉得我正完美地遵从着某种不成文的规则。那几天我真是伟大，是的，就是这么回事：伟大。

然而，我再次提醒自己：我并非本故事中的主角，尽管我承认我的手有时会由于失去兴趣而肆意发挥，不自觉地想要讲我自己的故事，但我还是忍住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提醒自己注意所应受的限制。

于是，我的丈夫飞出去做生意了，甚至等他回来，安息日已过，我那些残缺的剧本既没有找到，更没有去复印。不论是我，还是奥维德都没有理会剧本的事。他是经过一夜飞行从新加坡回来的（原来他是去了新加坡）。疲劳使人无所作为；而生活要求生活者的体力。使我惊讶的是，我竟能适应弗罗拉吃纸的现实；当我们进入流金铄石的夏日，这事就愈来愈显得自然。过去，我通常让七八月溜过去，我知道现在这段时间做点什么事毫无意义。无非是开门或关门，从外面的暑热进入开空调的凉爽的室内。或者相反：早晨我单独带弗罗拉出去散步，或者下午她与我们一起带孩子出去。

在那几个月，还有别人也常常在我们家进进出出：大多

是男人，戴领结，手持移动电话，就在我们家里接电话。他们正在与奥维德讨论什么进口许可证。我在厨房也偷听到一点，当然，水哗哗地流，洗碗机全速运转，很难听清楚。我听到他正与另一个人争夺一个进口某种仪器上的盖子的合同。这种仪器是安装在火车的发电机上，可以防止点什么，应该是预防事故吧。随后在客厅里又开始了对某个台灯合同的争夺战；这种台灯既能当闹钟，又可以遥控。后来又有一笔报警器的生意，一笔汽车报警系统的生意，还有什么进口意大利画架的大买卖。

在所有那些生意经之间，我还偶尔听到笑声，低沉的抗议声以及大嗓门的声音，后来还有听起来受到挫折的声音。当我端着托盘给客人们布让一些零碎小吃时，像他们常说的那样，我努力表现出我的最佳状态。如果有人问我问题，我尽量回答得简短而得体；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帮助我的丈夫，怎么样又会增加他的烦恼。有时那些商人以为我是一个女仆，或者以为我是孩子的保姆，是主人为了尊重客人才让我去侍候的。我并没有去纠正这种印象。我不知道我的丈夫是如何对他们描述他的妻子的，而我不想让任何令人尴尬的窘境破坏生意上的机会。只是待他们离开之后，我才看着奥维德，等着他说几句我侍奉客人的情况：他们是怎么把我当作女仆的。可他已经让这些会面搞得精疲力尽，疲惫不堪，晕晕乎乎，嗓音嘶哑，他自己也需要有人拍拍他的背安慰一下。我的确拍了拍他的背，所以我对后来发生的事就更惊讶了。



九月一日这一天，我把孩子们送到学校，然后我回来打开抽屉，看到她的进展良好。嗨，你以为呢？我自语道。她难道会整个夏天都饿着肚子吗？

在九月一号和二号之间的那个晚上，我坐在后门廊，在那张大塑料桌旁边，借助花园的灯光，极其严肃认真地察看我的剧本被吞掉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像他们常说的，情况糟糕透顶。在我生命的黄金岁月中所写的剧本大部分都没能留下来，只剩下那种类型所特有的一些标题，比如，内景。玛莎的房间。白天。除了还有一点关于剧情开始的说明以外，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我坐下来，用我那圆润的笔迹（字体随意而优雅地向右倾斜）把那些标题和抽屉里残余的文稿抄录在一张索引卡上。一连好几个小时我都忙于这项工程——当然我并不是在从大火中抢救古卷，但我还是想把残余的文稿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在早晨四点四十五分，当太阳以暗红色的光芒刚刚开始照亮赫兹利亚城区的时候，我的脑袋垂靠在桌子上，深深地沉入了睡乡。

在随后的几小时之内，谁也不知道我头枕着桌子睡在门廊上。后来我才知道，奥维德主动把孩子们送到学校或者幼儿园，然后就开始在整个地区四处找我。到了中午时分，他才终于发现我原来睡在家里。他一面把我摇醒，一面狠狠地抱怨。

“我睡着了。”我一边说，一边看了看太阳的位置，想确定一下时间。

于是他把在过去几个小时中心里积聚的所有对我的抱怨

合盘托出。他告诉我他在哪儿哪儿找过我，没在哪儿哪儿找过我；他是多么害怕；他又是如何编了一篇又一篇谎话来瞒过孩子们；他花了多少钱；他又是如何对付弗罗拉提出的问题，如何瞒过她；他一天都没能工作，如果我以为损失仅仅是这些，那我就错了；我竟然没有让他知道我在哪儿就睡着了，这种可耻的过失在今后的日子里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由于他不得不取消一次与人家的会面，他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才会有时间跟他见面；假如我以为维持这个家庭的正常运转是件容易的事，那我就又犯一个错误，而且是大错特错；还有些事情他没有告诉我是为了不让我担心；他又补充道，我所做的一切都脱离真实的生活；做饭，擦地，送孩子，无论如何与他肩头承受的重担不可同日而语；他总结道，生活是一场战争，一个危险而狡猾的敌人，而我是在中立地带，完全是局外人。

“对不起。”我说。

“我也是，我也是。”他说着坐了下来，说实话他是瘫在椅子上的。“我真想睡他 50 个小时，好像我老是倒不过来时差。糟透了！”他摇了摇头，看了看窗外那些从东南方向掩映着这所住宅的大树。

“现在她该吃什么呢？”我指着收集在一个四开硬纸盒中的残余的剧本稿，小心地问道，“我们得给她找点什么吃的。”

“我们会找到的。”他说。

“我可不想让她吃孩子们的练习本。那就太讨厌了，是不是？”

“不，不，月底我们去一家书店，把整个冬天的货办

好。”

“干吗要等到月底，干吗不明天去？”

“她在九月份不吃东西。”奥维德说。

“她九月不吃东西？”

“什么也不吃。”

“可她会死的。”

“她死？根本不可能！她已经这样活了二百年了。你以为她要死吗？她的消化系统在九月份休眠。”

这时我想他说二百年的意思一定是说 90 年。为了强调而夸张。可随后他意味深长地盯着我说：“弗罗拉已经 200 岁了。”

“二百岁？”

“二百岁。”

“什么？”

“快到二百零三岁了。你别让我送她去养老院，她都能当那里的老人们的奶奶了。把她留在家里是我们家的传统。”接着他语调忧郁起来，说：“如果我有三个三长两短，不要把她扔到什么老人之家去。我真的累坏了，我可能随时会散架，垮掉。我要你答应我。”

“答应你什么？”

“答应在我死后你不会送她去养老院，假如我很快就死的话。”

“你为什么会死，奥维德？”

“你答应不答应？至少这件事决定下来对我来说很重要。”

“好吧，”我说道，随即他脸上紧张的表情松弛了一点并



微微一笑。

“很好，”他说着站起身，显得非常振作。他吻了吻我的脸颊，说：“我去接孩子。今天别担心做饭。我带他们去吃汉堡。车钥匙在哪儿？”



我得说，在最初几天，甚至这个有关弗罗拉的最新发现也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至少没有立即影响到），无论它是多么古怪，多么令人惊讶和莫名其妙。

我知道我自己并非那种浑身上下对现实规律充满绝对信念的人，尽管生活已经教会我装作懂得游戏的规则并选择了某种确定的道路。所以，即便是一个老妇人，一个奶奶的奶奶的奶奶挤进了这个现实体系，挤进了我的家庭，我又正养着三个孩子——我也并没有感受到我若不是我而本应感受到的那种巨大的失衡感。现实本身有多种面孔。当某种异乎寻常的事发生时，许多人会大惊失色，惊呼：那怎么可能呢？简直不可思议！生活真是……无法形容！而我对自已说：那么我们家有一个二百零三岁的老太太，会吃纸，但九月份不吃——那又怎么样呢？再有点什么违背日常现实规律的事发生在我们家，我也不会觉得满怀自豪。

我作如是想，而且我还是继续度过我在尘世间有限的时光，哪怕是一天也不能重新来过，没办法停下来盘桓盘桓，与五十亿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毫无二致。是的，我并不比人类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好到哪里去。

在发现她的年龄之后的好几天——我知道这听起来傻乎乎的，可这是事实，我也无法否认——我才想到：这位尊贵

的客人怎么会如此长寿呢？她到底是怎么活到这个年龄的？她如此长寿的事实本身说明什么呢？

我坐在大花园里，静静地欣赏它的美。印度树以及其他各类树木高大繁茂、昂然而立。它们的枝叶从邻家的花园伸展到我们家的花园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一棵树的枝条触到了另一棵树的枝条，结果并没有迸出火花，相反，安宁，一种无名的静谧传遍了花园。此时，那个问题突然出现，一个本应早就出现的问题，就像一个站在大门后面问路的人，我知道那条街在哪儿，可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

于是我站起身，急匆匆地赶到本地的书店买了一本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书上说当今世界上最长寿的人生活在卡瓦拉伦坡的一间木屋之中；她一百四十八岁，每日靠鸡蛋，主要由树胶构成的一种混合物以及一片面包维生，而且她极少喝水。书中还有一张她站在木屋旁的照片，她身旁站着她那九十八岁的儿子，显然他也恪守同样的食谱。

我感到需要找个人聊一聊，我想跟谁提一提这事，跟一个人全面讨论一下。我想给我一个长时间没有音信的老朋友打个电话，可我忘了她家的电话号码，于是我就打给她的父母。她的小妹接的电话，寒暄几句之后，她告诉我我的朋友目前正在圣路易斯出差。

随后我真的给圣路易斯打了电话，还真是我的朋友接的电话。我们说了几句之后她就告诉我她在那儿的时间，她在圣路易斯的生活，她有几个孩子，她是多么怀念以色列；又问我国内有什么新闻，还要我确认或否认各种各样有关以色列的消息；十分钟过去了，我还没能告诉她我打电话的原因。我刚把听筒放下就已经对这次通话的每一分钟都觉得后

悔。我已经打算否认我们电话单上将会出现的一大笔话费，“这打到圣路易斯的电话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圣路易斯又认识谁呢？”

那天晚上奥维德回来得很晚，我也忘了长途电话的事了。他刚到门厅我就发现他的白衬衫和米色长裤上到处都是浓浓的咖啡渍。原来是他的秘书不小心溅上去的。他觉得事情的经过挺好笑，他说那位秘书正要把杯子放下，一只蜜蜂叮了她的鼻子，杯子当即翻倒了。“有时这事难免……”他说着脱下了衬衫。

我决心想办法洗掉那些咖啡渍，把他的衣服弄干净。我先在污渍处喷上除渍灵，再用硬刷子刷，然后把衣服投进洗衣机，定在不用甩干的洗精致衣服的程序上。我的洗衣机本身就是一段故事。它在甩干时会发出一种像是在某个遥远国度的某个无赖部族连续不停的暴动中超期服役的一架机关枪的声音；由于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意为他们提供新机枪，所以他们不得不继续使用那挺旧机关枪。我那台洗衣机也是这么回事。可我说过，它这会儿没有用甩干程序，还挺安静；我在洗衣机旁边还能与奥维德说话。我的丈夫奥维德正在厨房里给自己做点吃的；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发现弗罗拉的惊人年龄的，是谁告诉他的，是否可靠，换句话说，这事是不是真的？

他拽着我的上衣，把我拉到沙发那儿，然后扶我坐下，好像他是要传给我将伴我一生的神秘知识。他告诉我他是在年龄相当大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在完成装甲团的基本训练之后，他回到家没有跟弗罗拉打招呼，他干脆把她忘了。现在有时候也是这样，她也太不显眼了。他已故的母亲当时

把他叫进厨房，她正在剥洋葱；她眼泪汪汪地告诉他，自他小时候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弗罗拉不是你回家可以不与她打招呼的脏兮兮的老奶奶，她可是一位出生在 1792 年的老妇人。奥维德当然不信他妈妈的话，但她给他看了一张古老的羊皮纸，根据他母亲的解释，上面记载着弗罗拉出生在克里特岛。他妈妈说弗罗拉是克里特人，在她三岁时，她全家乘一艘渔船离开了希腊。她的姐姐不幸在海里淹死了，她父母活了下来，她自己当然不仅仅是活了下来，还特别长寿。

奥维德的母亲告诉他：我们的老弗罗拉与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不然她也是在一旁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这些事件的震动及影响。弗罗拉在 1825 年有过一次婚姻，对方是一个住在雅典的希腊犹太人，她给他生了五个孩子；这些孩子当然早就去世了；之后她就与她的孙子们一起生活，等等等等。一战时她在伊斯坦布尔，在那儿她六次死里逃生。从 1934 年开始她住在巴勒斯坦，因而逃脱了二战时在欧洲的几乎必死的命运。五十年代以来她住在耶路撒冷，奥维德就是在那儿出生的。六十年代初，她与全家搬到了国家的中部。

“弗罗拉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奥维德说，“她是一个时代，她经历了二百年的岁月。我妈妈告诉过我，在我们家，她比什么都重要。她是死后生命的活证据。”

“死后生命？”我问道。

“是的，我妈妈还跟我说过点事。”

“什么？”

“弗罗拉会忘记。”

“老年痴呆？那我一点都不奇怪。”

“不是老年痴呆，”他不高兴了。“是忘记。她在漫长一生中经历了许多事情，她的记忆机制已完全遭到了破坏。也许这就是她能够不断活下去的原因：她忘掉了过去。她惟一记住的就是她的名字：弗罗拉·本伍尼斯蒂。我们家里人说她一辈子从来没看过医生。”

“奥维德，”我问道，“你说忘记是什么意思？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着，那次在厨房里与我妈妈谈过之后，我心里很烦乱，我感觉糟糕透了。我觉得羞愧，好像我们家有某种残疾似的，或者相反，好像我们家有某种特权，这让我承受了巨大压力。后来我跟爸爸谈了谈。他教给我一个诀窍。他对我说：‘你有什么可担心的？过你的生活，别急得头痛欲裂的，你的头也裂不了。这事你根本没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那老女娃一百八十一岁了（当时她只有一百八十一岁），你根本无能为力。你还年轻！’”

奥维德不禁微笑起来。

“他这个人多棒，”他对父亲大加赞赏，“真是了不起！”

他爱他的父亲。根据他的概念，他父亲是彻底不为人所知的人，一个完美的默默无闻的典范。在那一刻，奥维德似乎魅力四射，连我也想完美地默默无闻，实际上我就是这么回事，也许这就是他爱上我的原因吧。奥维德接着说：

“别为这事自我烦恼，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如果你今天不信，在将来你也一定会相信的。你会看到大家都死而就是她不死。有朝一日，我们会把她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家这样做已经有好几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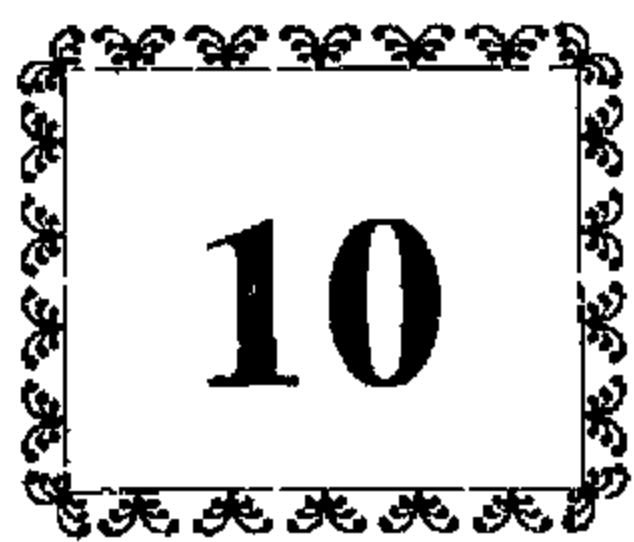
“你是不是认为她是永生的？”

“我不知道。”他表情痛苦地说道，“这么说吧：她会坚持下去。也许这跟她吃的纸有关系。当时我妈妈想告诉我更多的细节，但我不想听，那会让我心乱。我可不想让我以后的生活罩上一层阴影。我真是不想。”

“奥维德，”我看出他突然有些悲伤，于是我小心翼翼地问道，“我既不想急破我的头，也不想急破你的头，可你不觉得这整件事像是他们无中生有地杜撰出来的吗？我的意思是说从头到尾都是杜撰？”

他看着我的样子像是在看一个一窍不通、大脑不可挽回地受到损伤的家伙。

“既然她在这儿，无论如何都接受她，好吗？你想认为她是四岁吗？要是对你有帮助，你可以把她想成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你可以选择。这事也不可能刨根问底。这不是我最重要的事。如果你想去看——那倒没关系。不过我可不想让你这么干。我劝你还是把这种冲动埋在心里好。”



九月底，我们到赫兹利亚一家大商场的书店去为弗罗拉买吃的，用我们的“伊兹拉卡尔”车装了三大箱美味。女店员在算账时兴奋得得意忘形，她说希望所有的顾客都能像我们一样有如此良好的教养。回到家我把书随意地放在原来放剧本的抽屉里。但是，身体衰弱的弗罗拉不想吃这些书。不管是现代作品，还是过去时代的作品，那些男、女作家的书她一口也没有尝过。我时不时会检查一下，我发现这些书不但没有人吃，也没有人读。

一天下午，我给洗碗机装上弹药，清理好餐桌，爬到桌子下面去收拾掉下去的残羹剩饭，擦了擦地，把仍然温热的平底锅放进冰箱，趁机弯下腰整理一下冰箱，把一块变黑的卡门贝干酪扔了出来——然后，我走进她的房间，坐在椅子上，直截了当地问道：

“弗罗拉，我给你买了很精彩的书，你干吗不吃呢？”

我说这句话时没有看着她的脸，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失误。我错过了几秒钟，当她把脸转向我时，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深深的沟壑充满了泪水。于是她的皱纹从干涸的小溪变成了奔涌的季节河。我走到她身旁，用我那油乎乎的袖子给她擦了擦脸，道：

“你怎么哭了？”

“我想哭。”她说。

“不要哭吗，”我说。“是什么让你这么垂头丧气的，你脸上的河床都涨大水了。”

“是悲伤，我的孩子。悲伤。”

“悲伤？为什么？”

“是为了你们在那些书上投入的不必要的花销。我不需要。我建议你把书退还给书店。这些书我根本没碰过。我感觉今后几周之内我就要死了。”

“你要死了吗，弗罗拉？”我几乎要加上“终于”二字。但我不明白这女人的生命本能到底有多强。在那一刻我及时三缄其口是一件好事。

“谁知道呢，”她拍了拍手答道。“谁知道我还能控制自己多久。”

“那该怎么办呢？”



“没什么可办的，”她说道，过了一会儿，又道：“再给我写点电影剧本。再来点对白。靠几行对白我就可以活一个星期。”

我发出一声表示惊诧的咕哝声或咯咯声。我首先惊讶于她竟然有脸向我提这种要求，有脸给我提条件，再者，她的言词竟然毫无掩饰。她真让我服了。

“我一旦尝过你写的对白，对别的东西就一点胃口也没有了。”

“可这太荒唐了！”我站起身叫道。“真是荒唐！我最后一次写对白是在……”

“在你结婚的第一年。那是大卫和里昂之间的对话，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莫桑比克，一个是冰岛。你不嫌麻烦，把确切的日期也写上了。”

“不，不！”我叫道。“真的！我不写！我恨写作！我早就搁笔了。我隐退了。反正我的剧本从来没有一点用处。”

“没有？”现在她倒觉得受了冒犯。

“除了你可以吃以外。”

“你以为我要你给我写剧本是自私自利对吗？可你要相信我，我有一个我已经进行多年的计划，为了这个计划，我活下去很重要。只要你继续为我提供你的美味佳肴，你就会成为参与一个伟大进程的正式合伙人。你与其他认为自己参与了一项伟大进程的人有一点差别——我会在这儿每天对你说：你将参与一个伟大的进程。”

“是不是说你捧我我就捧你了？”

“一点不错，我亲爱的米娜。相信我，我有经验。”

“我真是可笑，”我说道，我本想说“令人气愤”。我脱

口而出道：“这差不多是剥削。我一直认为我的剧本或许是我那一成不变的过去留给我的惟一的遗物。你把它们吃掉之后，我还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可现在竟到了这样的地步：你想让我再一次坐下来胡涂乱抹好让你有东西吃吗？”

“为了一番高尚的事业，米娜。为了一番高尚的事业。”

“这事业是什么？”

“为了未来。”

“嗨。你跟未来又有什么关系，弗罗拉？”我喊道；接着我又改口道：“好吧，够了。我得很快做一个玩具熊形状的生日蛋糕，我还没有备好料呢。我手头的鸡蛋不够。我怎么能忘了买鸡蛋呢？”

我因为没买鸡蛋而跟自己生气。上次购物我应该买五十个鸡蛋，那我现在就不会一筹莫展了。我烦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弗罗拉接着说：

“如果你给我写一部剧本，你就不用考虑鸡蛋的问题了。”

“为什么？那谁去考虑鸡蛋的问题。”我一边说，一边在我的记忆中四处搜寻，试图找到一个不用很多鸡蛋的生日蛋糕配方，因为商店就要关门了；结果我一无所获。

“别人会考虑那些鸡蛋的问题。如果没有人考虑，那就不用考虑。”

“你说不用考虑是什么意思？那就做不成生日蛋糕了！”

“让我有吃的要重要得多。这极其重要！”她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盯着我：“米娜，照我说的做！”

“是，夫人。这是命令吗？”

“这是命令，是命令。”

我走出她房间时差点没把房门扯掉。我的确怒不可遏，可我并没有那么做。我是快四十岁的人了——教养良好——这也包括压制住突然想要把门从门框上拆掉的冲动。我走出家门，坐进汽车，系好安全带（真该为这些人们有时不得不做的事而谢天谢地）。我想，她接着就会告诉我她的计划关系到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她是在制造钚元素片，或者是在制造魔力饼干，其中携带的信息会取悦于以色列的敌人并降低他们仇恨的程度。

我于是倒车，驶离我的停车位，开往赫兹利亚附近的一处农场去买鸡蛋。一路上我不停地摇头，咕哝道：这是什么事呵。跟我毫无瓜葛的一个人来到我们家，某一天一起床，把她的食物与我那久遭忽视、令人怀疑的创造力联系起来，还拿她二百岁的权威命令我继续写作，就因为她喜欢那个味，还说她吃这个东西是为了一项我已经参与的与一个伟大而秘密的进程相关联的高尚的事业，可我不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真是妙极了。

“你要多少鸡蛋？”那农夫问道。

“二百。”

“二百个？”农夫惊讶地叫道。

“噢，抱歉，五十个。”



亲爱的弗罗拉开始衰弱了，她在我们面前一天天地憔悴下去，她拒绝吃东西。时令已到了十一月，冬天已然定下了基调。我们的地下室跟往年一样又遭了水淹。消防车又来用它们巨大的水泵把水抽走。这些机器引

起孩子们的兴趣，也引起了我的注意。静观抽水的管子，倾听发电机的轰鸣，使人产生一种愉快的结构与秩序的感觉。真可惜，就在这同时，一个女人行将就木。月底，她已经不能动了。而奥维德，这一家传宝物的继承者，变得越来越痛苦和神经质，他急切地想找个什么人来承担罪责。我不明白这一遗物的保护对他竟是那么重要。另外，他从意大利进口的画框生了虫子并且很快腐烂。幸运的是，他及时把它们退给了意大利人，几乎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从那以后，他从罗马尼亚以本应打开市场的价格进口的一些咖啡没能打开市场，他赔了钱。还有他从捷克斯洛伐克以相对便宜的价格大量进口的咖啡磨碎机没能让那些本应大量购买的消费者满意，所以他手头积压了大批这种机器。这些用硬纸盒包装，带捷克文说明书的机器就堆放在他的仓库里。

我丈夫奥维德并不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不，这个人远不是一个财务专家。我们这个核心家庭的存款账户还能够设法保持稳定，当然它们也不会直线攀升。在家里我们总是能保证需要。我们从来不必为无法交纳市政账单或没钱买副食而担心。可现在奥维德反而要我停止购买所有诸如昂贵的牛肉或衣服之类的东西；他还告诉我——别在这儿买，到那儿去买。

他自己也不再买那些奇特的小塑像。他每次从国外出差回来都会带回来一个，并且在书架上放一会儿，然后就把它丢在某个抽屉里。我必须承认：在我的丈夫降低我的购买力之后，我自己没有多少事可做。那些我常常逛超市并满载而归的时光变成了阴郁无聊的日子：我不是去考虑该买什么，而是考虑如何限制自己买东西。我沿着超市的过道踱步，小

心不让自己去买什么。最后来到收款口时，我的手推车里只有四件东西沉在底部，像是湖底的几个石子。我羡慕地看着前前后后的女人们，她们按照她们自己的逻辑把手推车装得满满当当的。我不禁想：过去我也曾经跟她们一样，我也曾经把我的手推车装满，那些日子还会回来吗？

起初，我没有注意到，生意的衰退和生产力的下降是与那老妇人的健康恶化相联系的。在又一次生意上的惨痛失败之后，奥维德从瑞士的一家酒店给我打电话，道：“你看看这些后果，这预示着我会是那个失去她的人。”显然他是指弗罗拉。他不想让弗罗拉死在他这一代，死在他的统治时期。他不希望在将来的家族历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曾有一个活了二百岁的女人死于奥维德·希姆逊三世的时代（他的姓是希姆逊）。

于是厄运接踵而来——财务上的困境导致客户纷纷撤离，当然都是以那种含糊其辞的方式：“你瞧”，“我理解”，还有就是“时机不佳”，“现在的市场真是狗娘养的”。奥维德失去了过去的运用策略的能力。在劝说那些银行家时，他的魅力不再能使他立于不败之地；他们要求提供实力雄厚的担保人，而当这些条件不能满足时，他们就要求用房产作抵押。我还能说什么呢——有时候时运不济，这正是其中的一次。尽管我们不是葡萄，他们却踩在我们的头上践踏。孩子们也遭到了忽视。我们无力再送他们去培训班，他们就呆在家里不停地吵架。账单也没付清，人家一连五次打来电话，又一连五次挂断电话。有时他们只说奥维德的名字，我一说他不在家，他们就冲我咆哮起来：“他什么时候在家？”我一回答“我不知道”，他们就“呼”地把电话挂上，我连说一

句“我可以给他留个条吗”的机会都没有。

我不再能完成所有那些像兔子一般以几何级数激增的家务，我不再辅导孩子们的功课。大女儿在一月底写的报告像是对我们所处境遇的一种哀伤的回顾。

接着，谣言也开始传布，使得一些怪异的信使在怪异的时刻来我们家造访。他们是奥维德家族的远亲，第二代或第三代表亲。他们也深知弗罗拉长寿的秘密，都坚定地主张：绝不允许她的死在我们这一代发生。于是在午夜会有一些神秘兮兮、意在责难的电话。其中一个人来自加利利的一个庄园，他的房子四周为雨林所包围；若有森林火灾发生，他们会把它扑灭。这个人在一天夜里两点钟来敲我们家的门。他的白色货车的发动机在外面突突作响，车上的两条大狗在狂吠；他对奥维德说：假如他无法延续老太太的生命，无法避免她的死亡，他就把老太太带回庄园跟他们一起生活。可奥维德却拒绝了，还再三坚持说不。我不明白他是怎么回事。让那农民带她走吗，让她吃他们的纸去，而且——两百年还不够吗？报纸上满是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死亡的消息。尽管我尊重她的经历和耐久的神力，不过这太过分了！

于是我也突然间非常积极地出现在这个故事之中。不妨想象一下，一向被动的米娜一到晚上，待弗罗拉睡着时，就偷偷潜入她的房间，用我大女儿的剪刀，把用我们的辛苦钱给她买的新书剪碎。为了增加真实性，我还用我的槽牙把书咬一咬，然后把残余的破烂四处散开。最后我把那些内容，或者说是食物投入马桶里。我想让奥维德相信：弗罗拉在吃东西，但还是免不了一死。

几天之后，我们家住宅的管道遭到严重阻塞。我们不得

不召来一组面孔赤红的管道工。这些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管道里取出一大叠湿透的书页。奥维德站在那儿看着那堆烂纸，我则心中惴惴地付钱并给管道工们解释。奥维德忽然急匆匆冲到弗罗拉的房间，脸上的表情像是刚刚解开了一个天大的谜团。

我对管道工们说这是孩子们不想做作业弄的，他们一下子就接受了我的解释。我把他们送出门外，然后焦急地等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我关上漆成白色的门，我在门内，门外是街道。奥维德从螺旋形的楼梯上缓缓走下来，好像他的背上扛着沉重的地毯，当然他的背上没有什么地毯。我逃进厨房，躲在冰箱后面的高脚椅上，好让别人看不见我。他叫着我的名字走了进来。他只有在对我气愤至极时才那样叫我的名字；他心中强压的怒火到了嘴边反倒成了可怕的玩笑。他叫道：“米娜，米娜，米娜·丽萨，你在哪儿呀，我的米娜·丽萨？”

我听见他穿着拖鞋进了厨房，感觉到他正在水池旁，还在桌椅形成的空凹处找我。他咕咕哝哝地自言自语，说我不在那儿，然后叫着“米娜·丽萨”继续找我。冰箱旁的这个藏身之处如果说还不够隐蔽，但还算舒服。在我的前面和右面有两处可以透光。离我不远处是房间的后门，弗罗拉来这儿的的第一天就是用的这扇门。奥维德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吃了一片药。我想应该是治头痛的药，因为他一生气就头痛。他又朝起居室走去，碰到一个孩子，问他妈妈在哪儿；小家伙说不知道。我就向小家伙发送了一系列心灵感应指令：“上楼去玩你的木马，你会很喜欢上楼玩木马。”

“爸爸，我要上楼去玩木马。”我那乖觉的小儿子说道。

我倚靠在墙上，后脑感觉着墙体的硬度，又摇了摇我那不明所以的脑袋。橱柜上面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扫了。正当我的脑袋左右转动的时候，我发现一条蜈蚣。我悄无声息地站起来，打开存放清洁用具和杀虫剂的柜子，然后用杀虫剂猛喷那只小活物，直到它蜷曲而死；这一切都在寂静无声中进行。我又回到我藏身的地方。只是几秒钟之后，我听见奥维德在起居室中说：

“这是什么味？”

我溜出厨房。正当我来到厨房门旁边的灌木丛后面的时候，我听见他说道：

“你着什么魔了？你疯了吗？”

“当然没有，”我立刻站起来，捡起一把像是刚从手中滑落的耙子，耙了八片叶子。“你还好吗？这花园需要随时护理。噫，瞧，多可爱呀！”

在耙子翻开的一个小盆子下面，我发现一只小老鼠正在给幼小的鼠宝宝喂奶。

“快去，叫孩子们来。他们得看看这个。”

我太了解奥维德了。我知道，当某种自然中发生的事以这种方式闯入生活时，越是令人恶心，他越是要急切地捉住不放并以此来逃避现实。他所深爱的父亲曾是一个小学自然教师，我想他这种投入可能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我心怀感激地看着那只老鼠——孩子们对他很重要，孩子们能看到这一自然现象对他也很重要。三个孩子缓慢而又迅速地从屋里出来，看着那只正哺乳的小老鼠，听父亲给他们讲解。我赶紧撤离现场，通过前门绕道去弗罗拉的房间。尽管我没有遭到奥维德的打骂，我心知他想打我一耳光。噫，他多想打我



一耳光呵。也许就该这样，有时候每个人都该被狠狠扇一巴掌——但这一次我逃脱了而且上了楼。

“你告诉她的，是不是？”我一打开门，还没有见到她的人影就说道。

“他自己发现的。”她坐在床沿上说道。

“你正在损害我们的婚姻，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是你危害着你们的婚姻，你明白吗？你还危害到孩子们的前途。你必须写电影剧本，好让我胖起来，恢复健康，好让你的丈夫重获心灵的平安，好让他的客户恢复对他的信心，好让一切再回到正轨。现在的局面与以前不同了，我的亲爱的。你如果明白这一点，你就会重新开始写剧本，写好后就放在那抽屉里。”

“就为了让你活得更长一点？为什么？我不明白。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永远拖下去？你是生活在什么样的谎言之中？你凭什么认为你有权利把这个家里每一个人的哪怕是一点点自尊都夺去？”

“小心你说的话，米娜，小心点。别忘了，你在这个家里的位置就是你在你们婚姻中的职责。只要奥维德踢你一脚，你就会滚到街上，一无所有，就像你嫁给他时一模一样。你该感激才对，而你却朝自己喝水的井里吐口水。”

“你怎么敢这样说话？你这老母狗！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你怎么还敢来威胁我！”

“这是我的职责。你为我做的事也是为你自己。你自己想去那些地方，我是陪你去的。”这位老太太心思机敏地说道。

“告诉你，我不相信你有二百岁。在我看来，你也就八十二岁，到头了。这整件事我根本不相信，太荒唐了！”

“在安那托利亚平原上我曾发下誓愿：为了表示对我父母的崇高敬意（是他们给了我长久的尘世寿命），我将不吃普通的食物，而只吃上面写有我所心仪之文字的精美纸页。”

“那你是与谁定下了交易，弗罗拉？与上帝吗？”

“我与谁订了交易与你无关。至今已经有许多年，我一直从我们这个广大世界的各个角落接收令人苦恼的讯息，然后再把这些讯息传送到适当的地方，这是我的职责。我发誓我说的是实话。我是某种无限电台。我与悲惨至极，遥远至极，平凡至极的人们都有联络。”

我坐了下来。这也太过分了。她听起来至多像是在一些古怪的电视频道上讲道的教士：所有的听众都会频频点头并说是呀是呀，真不错！我脱口而出：

“奥维德知不知道你是一台调频收音机？”

“我不是用调频，你以为我会愚蠢到用调频立体声广播吗？我有我自己的频率，这些频率当然是保密的。”

“当然。”

“我只是接收、处理，再进一步发送。”

“比如说接收什么内容？比如说向谁发送？比如说接收谁的讯息？”

“比如说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一场大雪中迷路的一个犹太人团体的苦难。”

“今天吗？”

“五十年之前。”

“啊哈！”

“两周以前，一个以色列旅游者在哈萨克斯坦迷路了。我传送了这个消息，我希望他能获救。”

“嗯……”

“我不反对帮助犹太人，不要误解我。在非洲有许多多可怕的事情发生，先是想一想就令人不堪忍受；可我还是把它们接收并传播开来。不要以为它们在我身上不留痕迹，它们留下痕迹，会的。”她停了停，叹道，“邪恶与灾难在地球上游荡，你明白吗？它们的魔爪每次都伸向不同的地方并在那里胡作非为。我会收到信号，通知我苦难将会降临何处，我就作好准备。”

接着她就开始列举她曾接收到苦难信息的各种人群。她还根据经线和纬线，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并且用不同语言记录所有的数据（在二百年中她学会了多种语言），然后再把数据发送出去。我斜倚在她房间的门上，一边轻轻用头往门上撞，一边咕哝道：

“真是胡说，一派胡言。”

我当时没有做好接受这一切的准备，但后来也没人问我准备怎么做，我有什么看法，以及在我眼前出现的图景应如何与在生活中多年累积起来的观念和潜意识相协调。他们为我设了一个陷阱，我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描述我陷入其中的感受，我也绝不会只为了“填满一些空页”而这样做。如果决定权在我，我会略过对下面一些事件的描述。我当然不想再一次重现当时的情景。现在，即便是对当时的回忆也会引起我身上讨厌的、莫名其妙的痛苦，或者引起其他不必要的烦恼。可是，既然我当时在场，而现在的局面业已形成：我写下我的叙述，其他人的眼睛从纸上读取——我想这是所有

12

我再次碰到奥维德的时候，他不再用以前那种眼光看我。让我来解释一下。平日，如果说他的眼光并非精明锐利，也是诚挚、坦率的。他通常总是显得很真切，却不会令人有烦乱或受到胁迫的感觉；但另一方面，他也不会沉入自己的思绪或埋头读报纸。他不是那种心不在焉的丈夫；你一叫他就能听到他的回答。他有着“正午”的目光，清醒，放松而令人愉快，使人产生一种融融洽洽的感觉；尽管这种感受稍有点令人怀疑，但也不至于破坏融洽的气氛。总之，他是一个目光令人望之愉快的男人，进入他所在的房间也同样令人愉快。他的这些品质，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品质，使得我们家的生活绝对可以让人接受，钟表的滴嗒声不会让任何人感到紧张。

走出弗罗拉的房间，我发觉他的目光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似乎隐藏着什么。那不再是可以通常方式对付的怒气。

“出什么事了？”我问道。而他回答道：“出什么事，能出什么事？”我明白他是指我拒不提供剧本。于是我自忖道：如果他想玩游戏，那我们就玩吧。我就是不写剧本，即便你对我说这些剧本可以直接从你的抽屉飞到加利福尼亚最好的电影制片厂，或者直接获得以色列鼓励高品味电影基金会成员的一致喝彩，我也不在乎。既然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闯荡，那么这一揽子交易就应包括有权利说：不，谢谢。我是对剧本说不，不是对弗罗拉说不。

奥维德不再想吃我给他做的饭。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件小事；但对于一个一天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厨房里度过，花费大量精力做饭和清理的女人来说，把整张馅饼都扔进垃圾，又明知道它本应在丈夫的消化系统之中，这实在令人灰心。这一点都不可笑。奥维德开始对我说：“我在外面吃过了”，或“我不饿”。可我做的却是他过去喜欢吃的东西。他突然觉得有必要带着孩子们和几乎站都站不住的弗罗拉去走访各式各样的叔伯和表兄弟姐妹。他上车之前会对我说：“这个周六你自己过吧。”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周六我自己过？我自己一整天独自在家该干些什么呢？就我自己在所有的房间转悠吗？像这样整个周六把我一个独自留在家里，他真是太讨厌了。我知道我在服刑，可我觉得也该结束了。有一次我问他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一起去，奥维德说车上没有空位了。我说要自己去看一下，他嘻笑一声，道：

“我这车上没空，你要是不相信我，你只会受更多的苦。”随即他就飞驰而去。

我不会像他敲诈我那样去敲诈别人，但显而易见，她以及她的遗产对他来说比我更重要。起初，我以为我能对付，在这场战争中我有反击的手段。这的确是一场战争：为争取我的自由以及隐退和保持沉默的权利而进行的战争，即使这会致弗罗拉于死地。

在他们从内盖夫的基布兹·尤德瓦塔返回之后的一天晚上，我叫醒奥维德，要他给我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待我；不仅要他解释为什么会因为弗罗拉而这样待我，而且是要他解释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比较，

为什么对他来说这会更重要。我想把他逼到角落里，我想要他跟我说实话。

他说，我们早晨再谈吧，也许早晨我已经写出了几行对白给弗罗拉吃。他说完又去睡觉了。在关掉暖气之后约一个小时，我被冻醒了。我披上睡衣向弗罗拉的房间走去。我痛苦不堪，但这痛苦与写作毫无关系，这是一种脸上的疼痛。他们的脸皮真是其厚无比；只有一流的厚脸皮才会相信弗罗拉讲的故事。如果认为弗罗拉胡乱联系的事情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才是愚蠢透顶呢。

顺路我去看了看孩子们，他们可从没有要求过我不愿意给他们的东西。我把他们的被子盖紧，把窗帘关严，把大女儿的台灯关上，合上她正读的冒险故事，然后走进了弗罗拉的房间。她正睡得深沉，鼾声如雷。她没有盖被子，但显然，经过二百年的岁月已没有这个必要。当然我也没有特意去给她盖好被子，我不想惹这个麻烦。

我看着这堆卑鄙地使我的生活悲惨不堪的人渣。我看着她脸，摇了摇头，心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愤怒。在我面前躺着极端恪守摩西第五诫“要孝敬你的父母以便在尘世得享长寿”的结果，我不禁自问：她在儿时都干了些什么竟能得到如此褒奖。

我拿了一把椅子，坐在屋子的中间。我故意坐在远离书桌的地方，万一上天不容，她竟然醒过来，她也不会认为我是来写电影剧本的。我有意两手交叉，双腿前伸。正当我这样姿态放松地坐着，屋里突然充满了一种极为恼人的哨声，一种极其尖利、令人无法忍受的高音，而仍旧酣睡的弗罗拉从她的喉部（我到近处听见了声音是从那儿发生的）发出另

外的哨音加以回应；她发出的哨音有长有短，大部分相当短促。我脸色煞白，心里明白：不可否认地存在一个针对奥维德·希姆逊三世夫人米娜的阴谋；这一阴谋又是另外的、更大的阴谋的一部分；而在所有阴谋的进行之中，不可能知道还有什么牵涉其中，也不可能知道他们是如何受这些阴谋的支配，在多大程度上受这些阴谋的支配，他们又准备走到哪一步。

哨声继续着——毫无疑问，乌拉尔山的西坡发生了什么异常事件，或者在什么偏僻之地一场屠杀即将开始，或者，谁知道呢，某个孤独、悲惨而卑微的可怜虫要干出点什么；反正弗罗拉突然起身，在一阵非同寻常的恍惚之中，极其绝望地冲向我儿子的房间——我随后跟着——她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吞掉了我儿子的“阅读初步”课本。

我没有阻止她，我最怕的是孩子醒过来，目睹一个无从解释的场面。我宁愿等她完事之后回到她的房间，再在那儿跟她算账。

可当我追到她的房间，我惊讶地听见她微弱的哭泣声。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那倒不是一场发作，而是情绪累积而成的哭泣，有着相当广泛的背景，其中也有由于某个特定原因而造成的辛酸。她一连好几分钟躺在床上抽泣，拳头捶打着硬硬的床垫。

我离开了她的房间，因为我觉得再呆下去就太不体面了。

# 13

第二天我身上发生了奇怪、可怕，同时也发人深思的变化。这样说吧：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控制了我的发音系统。也可以这么说：我的喉音消失了；字母表里的某些字母我发不出音了，结果我说的话变得莫名其妙。我是在早晨给孩子们做三明治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们：你们要吃煎蛋饼吗？话一出口是断断续续、糊里糊涂的。我女儿问我：“什么？什么？”我冲她笑了笑，在一张纸上写道：“我失声了。”这使我免受他们的盘问，我也不必说话了。我不知道是否前一天晚上的哨音损伤了我的声带，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但不管怎样，我喉音的消失绝不是偶然发生的。等他们都离开家之后，我坐在厨房的高脚凳上，过了许久。我试图从头到尾背诵希伯来字母表，可还是徒劳，那些喉音就是发不出来。尽管我感觉很糟糕，我并没有去想我的感觉还会有多糟。

弗罗拉走了进来，坐在我的对面，好像已经恢复了元气。我刚才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竟没有注意到她下楼来了。

“给我来杯咖啡好吗？”她说道。

除了她吃的纸之外，咖啡是她惟一的饮料。我指了指那台咖啡机，要她自己去弄。

“开车带我去转一转好吗？”她问道。“昨夜我睡得很糟糕，我需要点新鲜空气。”

我没有回答，只是挠了挠我的手背，接着好像又抓了抓我的前额；我有时就会这样。

“米娜，”她呷了一口浓咖啡，开口道；那咖啡最后还是



我给她冲的。“总的来说你是一个好女人，相当聪明，有一定魅力。你的孩子们教养得也不错，你的丈夫很欣赏你。你根本不是一个坏女人。你并没有一副不容置疑、无可改变的铁石心肠。相信我，我需要你的剧本。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写得很精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意识到，你的剧本有一种气息，比古老的中国茶更为美妙。你知道吗？”

我怀疑地摇了摇头。这是我惟一的武器——怀疑。

“是呵，是呵，”她说。“你无法用你的鼻子闻到，可我的鼻子立即就能分辨出你那美妙而独特的质料。”

她用手来抚弄我的头发；我本能地退缩着。

“我喜欢你的头发，你的头发真不错。”

现在我怀疑她到底要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我喜欢你的脸，”她继续说。“我也喜欢你理家的方式。一切都妥帖得体，真不错，这会给孩子们一种安全感。但我还是最喜欢你的剧本，我喜欢那种情节的展开，还有你作品主人公说话的方式，他们会说：‘滚开，不然我杀了你。’有一部剧本你写到一个阿拉伯女人没有脸，她把脸借给别人了。那本子真是挺可爱的，可惜你没有写完。”

我从椅子上猛地站起来，椅子被我带得向后倒了下去。我想找点话说，甚至像“弗罗拉，你是个白痴”这样的话也行。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因为不再有什么我能发出音的字母了。所有的字母都跑掉了。是的，所有这些事都发生在赫兹利亚，离人们每天按部就班过日子的地方并不遥远：他们总是很清楚他们的需求和目标，没有人再去费心思寻求深一层的意义并加以分析——我再也无法发出任何字母的音。弗罗拉和奥维德真是不太对劲。

如果作为剧本作者我想缄口不言，那也并不意味着要剥夺我与周围人交流的能力呀。如果我的孩子遇上麻烦怎么办？我难道都没有呼救的权利吗？

弗罗拉道：“相信我，我很喜欢你，我一点也不想伤害你。可我毫无选择，你必须接受教训！你必须明白！你看！”

她从睡衣兜里掏出一张上面有她的照片的磁卡，道：

“现在你相信了吧？”

我接过那张卡仔细看了看。多么龌龊的勾当！原来她是时间警署的一个女警员。真是滑稽！我们家竟出了一个女警察，还是在一个谁也没听说过的警察部队——时间警署。

“你知道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吗？”她问道。我耸了耸肩，于是她说：“救援每一顷刻，远离一切灾祸。”

像他们常说的，我还没来得及对目前局势的发展作出反应，前门一开，奥维德走了进来。他比通常下班回家的时间要早。

“那，她写没写点什么？”他对弗罗拉道。弗罗拉则答道：

“别担心，我会让她回心转意的。”

“真的，米娜，”他对我说。“有什么难办的，不就几行字吗？内景。一家工厂。白天……内景。主任办公室。下午……外景。一个公园。晚上。然后中间再添上几行对白，有什么可小题大作的？就是几个场景，你就完事了，啊？”他直盯住我的眼睛，就像过去的日子。“我找到了那批机器的买主。有一个耶南来的阿拉伯人，按我买入的价格把它们全包了。至少我没有亏本。”

“耶南？你要到耶南去吗？”

“不，别担心。已经没事了，生意已经做完了。我拿到了钱。七万，是美金。在外面车里。明天我要去银行把这笔钱存一段时间。”

“你把所有的钱都留在外面了？”弗罗拉问道，似乎她是在我的位置说话。

“是啊，过一会儿我就去取。”

“你不觉得你现在就该去取吗？”弗罗拉问道。

“过一会儿。是在车库，在车里，锁着，而且是放在一个普普通通的装松下扬声器的箱子里。”

“我觉得无论如何你应该把它拿进屋来。”弗罗拉坚持道。

“有什么关系？”奥维德令人惊讶地说道。“你要吃那些绿票子吗？我还以为你只吃我妻子的剧本呢？”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弗罗拉生气了。“我只是想，以上帝的名义，你应该把钱拿进来。有一种惯例：你不把无人照看的钱放在外面。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行为模式。”

“我同意，”奥维德道。“过一会儿我就起来去取钱；我喘口气就去，我定定心神就去。”

“你现在就该抬脚去把钱拿到屋里来！我们家族已经有许多大笔钱失窃的案例，这是有遗传性的。”她突然转向我，“这种案例每三十年零一天发生一次。我一听说你带着现金，”她又转向奥维德，“就感觉这事随时会在你身上发生。自上一次至今已经有三十二年了。我看很明显这事又要发作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会儿就去把那钱拿进来。五分钟之内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能向你保证。钱不是水，弗罗

拉，会流向空旷低洼的地方去，钱就是钱。”

“钱就是钱，我知道钱就是钱。可正因为钱就是钱，你最好现在就站起来去把那钱拿进来，我们好随时看管。你不能把七万美元放在外面无人照管。你不明白分秒之间会发生什么事；你以为我活了二百零三岁还不知道分秒的力量吗？你错了，我亲爱的，站起来按我说的去做，就现在。”

“告诉我，”我想问他们俩。“你们是一对鬼魂还是什么？你们进行的是什麼荒唐不堪的对话？”但是，不仅客观条件不允许我这样说，而且就在那一刻，从我们车库的方向传来尖利的刹车声。

大家立刻站了起来，包括我。奥维德跑了出去，正赶上看到他那辆车的尾部沿着通往海边的那条路疾速远去。他发出一声绝望的呼号，整个街道都引起了回响，引得邻居们把头探出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弗罗拉缓缓走近奥维德身旁，打了他一个耳光，道：“真是蠢材，蠢材，蠢材。”他眼里涌满了泪水，他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至少在我面前没有过。

至于我，一个哑巴，在那一刻决定逃离这个家庭，这个大嚼剧本，迫害剧本作者，每三十年一次循环失窃的家族。从弗罗拉的观点来看，我这个计划或许会被看作是脑力枯竭的症候；可是，我在这种情形之下，也许把我的大脑留下来逃向自由会更好，反正我不能再呆在那儿受人戏弄了。

我是一个家庭主妇。当时我真想开车跑到另一个家庭，比如说大草原上的某个家庭去当一个主妇；这样我就又可以开始除尘，整理厨房的柜子，在搁架上铺上纸；也许吧。可我知道现在要带孩子们上车并回答他们的问题是多么不可能——不仅是因为我的喉音，还有其他的音已经消失，而且也因为我不想吓着他们。假如我已经由于我的“写作天赋”而落入这个恶梦之中，我为什么还要把我那些无辜的孩子们拽进这个臭水塘呢？

让我们回到我们正在展开的情节吧，让我们像狗一样回来；在我那可怜的逃跑企图之后我也是这样回来的。当时我上了那辆通用车，问我自己：米娜，现在该怎么办？逃跑也是要生活，时间依旧流逝，你依旧要操心。真正的逃跑与想象中是不一样的。逃走与留下不可能兼得；又不可能不留下而想看到我逃走会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我不在家他们会怎样生活呢？我回去他们会停止向我施压吗？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吗？我真希望他们不再折磨我，但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停止的；所以，我想坐在车里放一把火算了。可我觉得在赫兹利亚做这种事太可怕了，这座城市不适合有这种行为。这样的事应该留到战场上去做，或者留到第三世界某个偏远的广场上去做；在那些地方，人们会为了某种社会——政治——经济局势而自焚。再说，我也许会以“自焚的女人”铭刻在赫兹利亚人的记忆之中。

除此之外，一般而言，我还是想继续活着。

整个晚上，奥维德开着货车到处追踪他藏钱的那辆汽车。他到了赫兹利亚警察局央求那些警察，可他们谁也不肯

去耶南。他们宣称，由于一千零一个原因，这件事过于复杂。奥维德手中有耶南那个家伙的完整地址也无济于事。他们说根本无法确定就是那个人；奥维德说当然是他。他们说，你怎么知道没人跟踪你？他说，没人跟着我；但那些警察告诉他他们目前毫无办法。

那天晚上，我的丈夫没能把钱带回家，却充满可怕的挫折感和怒气。至于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不想在这儿叙述。你不会谈论那样的事，你不会把那种事说出口。尽管我是在写编年史，并且把自己的角色确定为“忠于事实的记述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去描述那晚发生的事。的确，我作出过承诺，可这一次我不准备信守诺言。很抱歉，读者会告诉我他自己私事的细节吗？诚然，如果没有对那些可怕瞬间的细节描述，读者对情节的理解也许会有某些困难（对此我并不确信）。但这种误解的影响只会持续数秒就会过去。在全世界，每一瞬间都会发生残暴的事情，最好让这些事情悄悄过去，这样你手中的笔就不会受苦。而且，事情的全貌只存在于亲眼目击者的大脑之中；没有任何描述，我再说一遍，没有任何描述能够成功地传达当场的恐怖。

一块石头投入河中会产生一圈圈不断扩大的波纹。就那天晚上而言，我最好把那块石头包起来放在我的衣袋里。

我只能说，在那天晚上，我觉得第二天早晨太阳将不会升起，至少对我是这样。我要换一个说法：对我来说，那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夜晚；可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 第二部 旅程

---



第二天，就是前一天晚上的事情发生之后的那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躺在卧室的地毯上。我看了看窗外灰色的世界，看到了人们所谓的“一个崭新的早晨”；花园的景致一如昨日，所有的小鸟仍旧在树枝间跳来跳去，浑然不知周围发生了什么事，而我知道一件大事已了。一，二，三——我强迫我那沉重的身体起来去冲个澡。在浴室我发现贴在镜子上的一张便条，那是奥维德的字迹，其中包含了一点内容——一是表示歉意的因素并稍有一点发挥：“这事伤害了你，但更伤害了我”；二是实际的因素：“我把孩子带上了”；还有就是对未来表示疑惑、恐惧的因素：“我希望你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不要走得太远。爱你的……”等等，等等。

我一辈子一直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也

不会太过分，所以我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刚过九点钟，房间里很安静。我自语道：米娜，结论是比我更强大的力量主宰着世界；所以——有关昨夜的记忆又在敲击着我的大脑——我已经同意加入时间警署，尽管只是在后勤保障的职位上。在凌晨我已经同意为弗罗拉提供纸质食物。是的——我已经同意入伙了，我已经同意在刚刚溜过去的瞬间的救援军中成为一名士兵。为了爱你又有什么不可以做呢？

我下楼到厨房给自己冲了杯咖啡。我查验了一下，想知道我的发音能力是否已经如约恢复，当然包括那些喉音。我走进弗罗拉的房间，目的是要给她准备食用纸。她不在房间里，我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可我知道她会回来，因为她的食物在这儿。

我从抽屉里取出空白纸；相对于我从铝制托盘和烧烤铁板得来的那种沉甸甸的安全感，这些纸又轻又脆，让我反感。我发现你手上需要有 50 页纸才能找到一只托盘给你的感觉。自从上一次写电影剧本已过去了多年，岁月严重侵蚀了我的写作能力。这也是件好事，我一边整理书桌，一边想着。谢天谢地，反正剧本不会有什么结果，也不会拍成电影，所以我也不会看到那事的“发生”。

我决定给她准备三天的食物，一顿饭三个场景。无论如何那位夫人只吃原稿，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记住我写了些什么（因为我也不会再有机会读到），所以我不假思索地脑子里有什么就写什么。我的上帝，我真是训练有素，简直令人称奇。以我多年来形成的性格，我对自己的工作做得真是不错；我能同意做这件事真可算得上是个乖乖女，其实我一点选择权也没有。反正一天花二三个小时就够了。谁知道呢，



也许某个场景会卡在她的喉咙里，那她就会一命呜呼，一切就会重归正轨；也许或多或少会留下一两处伤痕，反正伤痕总会有，不因为这事，也会因为别的什么事。

我拿起一支笔，开始在纸页上乱写对白，就像那位美国画家提起画笔往画布上甩颜料。对于他，那是艺术，而对于我则是食物。我发觉自己又开始熟悉这一特殊的写作形式：内景。一家大银行。傍晚。一个军裤兜里插着手枪，头戴巴拉克拉瓦大毡盔，年约40岁的男人上场。等等。

至于情节——你要保证让它复杂化并且加以解释——你需要有一种方向感，这不是我的强项。但这会儿我没有必要绞尽脑汁，于是我随意在纸上乱涂，说那劫匪也是一个鼓手，曾在一个集体农场里生活，而他抢劫的原因就是人们通常偷窃的原因：他们当然是缺点什么。于是我紧紧盯住这个前农场工人不放，替他臆想出他在挟持那位银行出纳时所说的台词；描述他如何一路节外生枝地回到了他租的公寓；他又是如何从警察的追捕和交通事故中九死一生的，以便使弗罗拉觉得味道够足。就这样我一直写到中午。后来我又加了点东西，说那个劫匪在劫案发生之后去找他的一个朋友，想告诉他他抢了银行；这位朋友的女朋友说他去了匈牙利；劫匪问她他到匈牙利有什么事，是不是去旅游？她回答说她弟弟在那儿执行军事使命，他们之间已经有六个月没有互通音信，所以他去那儿找他；而结果他却正在隔壁听着呢。故事——故事——故事，都是扯谎；只有这样我的两个赞助人才会放过我。

在午饭前，我已经完成了约20分钟的电影剧本，接着我就巡回去接我的孩子们——也许还有他们的小朋友——来

吃午饭。在路口等绿灯时，我忽然想到我根本没有午饭给孩子们吃，只有那老巫婆的午饭。每一站上来两个孩子，我的每个孩子都带了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都带着一个大书包，他们都饿得想吃东西。突然一个孩子说了一句意大利面条，于是孩子们都齐声呐喊，宽敞的车里充满了他们的声音。

车上共有六个孩子，都想吃意大利面条，而我却没有面条。我怎么会这么蠢？我骂自己道。我怎么没做意大利面条呢？那么简单，你拿来面条，一做就成了。我抬头看了看反光镜。我看见午餐袋在我身后摇来摇去，吃剩的面包卷的碎屑也在里面摇来撞去，一股橄榄味传遍车内；我的小儿子哭了起来，另一个孩子从座位上掉了下去，他的安全带扣打了别人的眼睛，这个孩子的眼睛疼起来，又一个孩子的眼睛也疼了起来。我后面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司机失去了耐性，她在超车时骂道：“笨蛋！谁发给你的驾照？”我女儿想起来她有什么东西忘在学校了。你得回去，妈咪！呆会儿我会回去的，呆会儿。不，现在！呆会儿。不，现在！妈咪——面条!!! 于是所有孩子齐声喝道：意大利——面条，意大利——面条。回学校！我的女儿也在嚷嚷。

我听见在我车后面一辆摩托警车的警笛声。孩子们在模仿警笛声。我把车开向路边，我吃惊地发现那警察正示意要我停下来。我把车开到人行道上，这时孩子们都一言不发。我打开座位旁的电子车窗，那警察把头探进车内。我在心里对他说：微笑一下，我想看见你微笑。但他一边打量着车里，一边说：

“难道你没看见那骑自行车的人吗？”

“什么？”

“就在路口，你把你车后面的一个人碰倒在路上。”

“我？他怎么样？”

“你的指示灯没亮，”他把手伸进车内打开了指示灯，“我看灯还可以用呵。”同时他紧接着说：“你很幸运。他什么事也没有。他只是滑倒了。”

“谢天谢地，他真的没事吗？”

“只是膝盖上碰了一个包。你比你想象的还要幸运。那骑自行车的家伙是个贩毒犯，跟他或他的家族牵连起来可不是开玩笑的。”

“他现在在哪儿？”

“他现在肯定已经离开了。别担心，他什么也没看见。只是驾车要再小心一点，女士，你从一个车道转到另一个车道没有打信号。”

他要看我的证件，我就把证件递了过去，他又说：

“女士，小心驾驶。如果你需要什么，跟我联系，或者跟就近的警察分局联系。”

我不敢说这就是他确切的意思；真的，他为什么要对我说那句话呢？也许他的意思是：如果那个家伙找我的麻烦就与他联系；可那个家伙并不知道谁碰了他，怎么会找我的麻烦呢？不管怎么样我对那警察说：“是的，是的，当然。”于是我小心地从人行道开到大路上，所幸这时路上空无一人，所以我也不必过于担心一些交通规则的约束。在我小心翼翼地驶向赫兹利亚商业区时，孩子们都很安静。在那儿我买了三只烧鸡和一些快要凉了的土豆片。回到家我就把所有那些吃的装上盘让孩子们去吃，我要到门廊上坐一会儿。

在门廊上我苦苦思索，试图把整个路程再现一遍以便算出那个自行车骑士是从哪儿窜出来的，但没什么结果。我又自语道：谢天谢地这事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人死掉。我在冥思苦想和心存感激之间动摇不定，还有点怀疑那个警察是想要一耍我罢了；正在此时，我听见弗罗拉的房间里传出一种声音，表明我为她预备的食物正在被她撕开吃下去。我透过她门口旁的蓬莱蕉偷偷看去：她仅用十五分钟就吃光了所有那二十分钟的剧本；我原来还以为足够她吃三天的。

“怎么样？”我走进去问道，同时禁不住去看她的肚子。

“不错，”她说。“尽管我对你还有更大的期望。”

“你还期望更多？”

“是呵，像他们常说的：你的工作是差强人意。你喂了我一堆无稽之谈。作为开始，我愿意接受，但以后不行。”

“你觉得哪儿不够好吃？”

“总的来说不是很好。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

“一点也没有。我只想实事求是。你觉得哪儿不合口味，我就加以改正。”

“你要加以改正？”她哑然失笑道。“将来你会明白：有的是胡说八道，有的是臭狗屎。”

“我明白。”我说，尽管我一点也不明白。

“不要以为我不欣赏你的工作。我相信，如果你坚持不懈——你会受到补偿的。你在我的恩人白名单上了。”

“你是说我可以提出三个愿望？”

“一切都会好的，只要不断出剧本就行。”

话音一落，前门“呼”地一响，以我为妻的那个人到了。弗罗拉出去迎他，我则打算下楼去花园。可是如果我要

走楼梯的话，我就会把自己暴露给他，这一点我还没有作好心理准备。我左右张望了一下，没有孩子或孩子的朋友或是邻居看着我，我就从阳台那儿爬了下去。

这其实很简单。在弗罗拉刚来以及在她来之前那些安静的日子里，有时我坐在阳台上会想：从一棵树上爬到这座房子的二楼真是太容易了。但我从未想到我会真的利用这一秘道，而且这次我是朝相反的方向溜走的。我迅速到达地面，只是把裙子弄得有点脏，身上也划破了几处。然后我快速走进房间并下到地下室里。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在这儿给她胡写一气，而不是在楼上写。在几乎干涸的水坑和堆放的箱子之间（我不记得箱子里都放了些什么），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角落。我自语道：老天爷，你的地下室需要大扫除了，也许到春天我会着手做这件事。我把一件可以用作书桌的家具搬到亮处，那儿恰好有一束天光穿过地下室一处断开的护窗板。我又搬来一把不带背的高脚椅坐了下来。我不禁想：米娜，现在你是在自然之中了，你周围的一切都是自然的：蜘蛛网，霉菌，而且没有电灯；这是你的洞穴，你就是一个史前的女人了。

我听到头顶上一阵细碎的、频率很高的脚步声。我看了一眼我的斯沃琪表，走出地下室，直接上了那辆通用车，去送孩子们走上向上或向下的生活道路。我在日落时分才回来，孩子们冲进屋里；我仍留在车里想把车稍稍整理一下。十分钟之后，奥维德上车坐了下来，道：

“开车，我想跟你说件事。”

“我觉得你能说的都说了。”

“开车，我要你开车。”

于是我又发动了引擎。我有时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动力的方向盘。我驶离街道，上了向南的滨海路。奥维德说即使我是对的，也不能说明他是错的。之后他又向我道歉，说他整天都没有吃饭，对所发生的事感觉坏极了。可他还是要求我，或者说是乞求我理解这都是某个极其重要的事情的一部分。这事极端重要，我一旦理解其重要性，就会心甘情愿，心情急切，甚至意气昂扬地坐在那儿为弗罗拉写电影剧本。接着他就投了一枚重磅炸弹，就像他们在报纸上常说的“投了一枚重磅炸弹”。

“弗罗拉是乌托邦的一块碎片。”

我能说什么呢？自然我的回答暂告阙如，因为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是的，而你是在帮助她继续生存，这很了不起！”

“奥维德，”我发觉自己在说，“一个破碎的乌托邦就不再是乌托邦了。”

“不，不，每一片乌托邦都包含着重建整个乌托邦的基础。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耸了耸肩，仿佛是说：这我理解不了。这种感觉是我和奥维德之间一个重要的会合点。他同时也说：“我有时明白，有时不明白，唉，这个我也理解不了。”他指了指一条岔路，那条路通向一片极少人游泳的秘密海滩的入口处。

“什么？”

“在这儿拐弯。”

我按他说的做了，有时服从更有好处。我把车停下来，感觉他是要我俩都把座椅斜放下来，于是我熄了引擎。而他却把点火开关半开着并开车灯照着我们面前的一棵橡树。

“看看这棵树。”

“怎么？”

“一件艺术品！我父亲一定会这样说。我也跟你说：他说得对极了。你看伫立在这儿的的是一个多么独立的生命，它一无所需，只求清净度日罢了。对这棵树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它棒极了。”我说道，而那棵树确实不错。

“令人惊叹！”他说。“有些树有三百岁，这棵好像也有一百岁了。我真羡慕这棵树。能成为这棵树一定很不错，我跟你说。它一无债务，二没有人迫害。有朝一日它也会被砍倒，跟我们大家一个下场。”

无论如何，若只是为了一棵树，他未免也太激动了。这又让我害怕。除了树，我不敢说一句话。

“瞧它的枝叶，它的树干，多漂亮！”

“真不错。”我说。

“简直是一个奇迹。你看所有的车都从他身旁经过，可没有一辆停下来看一看这棵树，他们是在忙他们自己的事。”他一边说，一边看着自北而南疾速而过的车流；可他表情之严肃不像是在看自北而南的车流。我怕极了。

“你怕我吗？”他的目光突然从车流转向我说道。

“不，不。”我说。而他大笑道：

“我也害怕！我也是！只有弗罗拉不怕，只有她一个，真是一团糟！”他微笑着说道。

“会好起来的。”我说。

“每个人都这么说。最近一直回避我的人都说，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你知道，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在一切好转之前，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是呵。”我说。

“听着，米娜，事情可能真的会变复杂。”

“什么事？”

“我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一片乌托邦不会在一个大晴天降临到以色列的每一个家庭。”他似乎有点着恼。“这不会发生在每一个家庭，而且它会导致无法预料的后果，绝对无法预料。可我说过，事情会好起来的。”

不久之后，我们回到家打开了大门，这时弗罗拉迎了出来。她站在我们在东赫兹利亚的家门口，身体被一种使命感激动得前后抖动。她仿佛在宣布什么重大喜讯似的对我说，她与我将要进行一次旅行；这非常令人激动，这非常伟大。她说我应该感到激动至极，因为她激动至极，因为这的确令人激动不已：她和我，只有我们俩将进行一次旅行。我一脸惊诧地看着奥维德，他显得跟我一样惊讶。我想问她她说的是什么旅行；我们刚刚达成协议，我会安心静坐为她写剧本。我已经在地下室为自己安排了一个窝，我已经答应，同意，接受了他们所有的要求，还要怎么样？

奥维德对她说：

“弗罗拉，是什么样的旅行？”

“一次时间旅行！”弗罗拉大声道。“噢！为了它我等了很多年了！旅行为期四十天，你妻子要跟我一起去，为我提供食物。”

“四十天？”他大声喊道。

“我要你重新考虑一下。”我说。“对任何旅行我都不感兴趣，哪怕是一天，所以请你重新考虑。这对孩子们也会是一次精神创伤。”



“精神创伤！任何精神创伤也不值得放弃你将喂我以助我完成的使命。”

“什么使命？”奥维德问道，他的背弓得越来越厉害，像一只痛苦的猫。

弗罗拉侧身过去，低声道：

“我有理由相信，时间警署的副警长暗杀了时间警署的警长。我有充分的根据去进行调查，也有必要带米娜跟我一起去。”

“你这些怀疑有什么根据？”奥维德问道。

“我曾经热恋的时间警署的警长已经有许多天没有在我们的无线电上与我通话了。与我通话的他的副手的声音我觉得可疑！毫无疑问，他在对我说警长不在的时候隐瞒了什么！去这儿了！去那儿了！十分钟后回来！他在隐瞒着什么。我想去查明他们到底隐瞒了什么。我可不是三岁小孩！”

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我说：

“他隐瞒了什么，你有什么可担心的？”突然间人们隐瞒的所有事情在我看来似乎都值得隐瞒。换句话说，如果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该是多么令人瞠目。有些事情就该扫到地毯下面，有时候这样才好。可这个二百岁的女人却不这样想：

“在这个案件中，由于时间警署的特殊性质，也由于它在形成时间、人类与地质年代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我认为不应该冒险置之不理。”

“那这个时间警署的副警长住在哪儿？”我问道。

“在时间中的一个点上。”

“他长得什么样儿？”奥维德紧张兮兮地问道。

“别担心。”她噗哧一笑。“你没什么可害怕的。”

“你干吗要担心？”我问他。“该担心的是我。”

他没有答话。

“假如你有兴趣，我们一旦到达那一点，我会告诉你他所在位置的年代和时刻。时间警署的高层人员在某一连续体上的点与点之间不断运动，以逃脱瞬间的束缚。没关系，这很复杂，现在不用去管它。长话短说，有某些瞬间极富进攻性，但我们能对付，我们能对付，你不必担心。”

她紧紧握了握我的手。感觉到她的皮肤贴在我的手上真是一种相当奇特的体验。她身上凉得像蜥蜴，我讨厌这种感觉。

“我不想去。”我说。

“谁也没让你去。”奥维德怨恨地说。我不明白他到底是站在哪一边，更不用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属于哪一方。突然间我想起来我是在反方，而我想再次站到正方。于是我说：

“我坚决不去。我可以给你写任何主题的剧本，你要我写多少我就写多少；甚至可以包括复杂的间谍情节，这些情节我还从来没能弄明白。我向你保证我会把它们理清，同时也不会太平庸。至少我会努力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她留在这儿，把剧本给你送过去？”奥维德问道。“你不能让一个妈妈远离她的孩子，也不能让孩子远离他们的妈妈。”

“有一个办法，”弗罗拉道。“可要想旅行成功，你必须等二十年。我可没有二十年的时间了，我只有几天时间。”

“我有二十年的时间。”我说。

“我没有。”弗罗拉道。“时间警长也许还活着，也许正在生死之际徘徊，他是活了一千年的人，你以为这事那么简单吗？”她怒气冲冲，脸涨得通红。

“她就是这种人。”奥维德说。“她就是这种人。她就是突然想要什么没人能给她的东西，也必须有人把那东西给她。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她向我母亲要不可思议的东西，向我父亲要不可思议的东西。人家一直对她说：‘我们没办法，我们没办法。’你为什么不明白人家没办法做你要求的事？你怎么这么自私？”

我从来没见过我丈夫这么生气，真的没见过。

“你为什么这么自私？”我问弗罗拉。“我原以为老人因为衰弱会更善良一些。你明白你在干什么吗？”

“你不明白我们必须为她忍耐吗？”奥维德咬牙切齿地说。“你难道不明白她把我们置于何地吗？你是在犯罪。”他说着轻轻推了她一下。“在时间警署那儿难道没有法律吗？你们难道没有任何限制吗？”

“有，这就是一个：你们的孩子不会注意到他们的妈妈不在身边。”

“他们不会注意到是什么意思？”我问道，就在同时，奥维德向屋里跑去。弗罗拉在他身后喊道：

“他们睡着了。整个旅行期间他们会酣睡不醒。他们会有甜蜜的梦境；每一个孩子的梦境都是根据他的年龄和最隐秘的愿望形成的。相信我，如果他们生活中会有什么难题，他们的梦里不会有。我向你们保证这只会对他们有好处，这

将是一次奇妙的、令人净化的睡眠。你也需要。也许等你回来时——我会给你安排一周左右的睡眠。”

“什么？”我说道，我是指整件事；可她确信我是指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的，一星期的睡眠，无人搅扰，没有意识，我会给你安排的。你觉得怎么样？”

“那吃饭该怎么办？他们在四十天里吃些什么呢？他们习惯我做的饭菜，他们需要我。”

她没有答话，这时奥维德从屋里出来了，心情平静了一些。

“还行，他们真的睡得像小宝宝。”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你可以说我是徘徊在绝望与昏沉之间。

“奥维德，”弗罗拉又开口道，“你将每天照常上班，你将完成你必须为他人完成的义务。你将看到你的效率会极为优良，生意会开始红火起来，资金会开始流动。你回到家吃了东西就上床睡觉。在睡觉时，你会梦见你在喂你的孩子。在你作梦喂孩子之前不要作任何别的梦。他们在睡眠期间会增加两公斤体重，醒来后不久又会减去一公斤。什么也不用担心，他们的睡眠健康而正常，没有任何副作用，没有任何积淀，只是长一点而已。假如你作梦喂他们好吃的、妈妈做的饭菜，他们就没理由醒过来。人们吃得饱就睡得香。”

“我明知我的孩子处于昏迷状态，我妻子又游荡在某个时间洞穴之中，我怎么还能睡得着？”

“一切都会皆大欢喜，别担心。乐观点，让那一片乌托邦去处理一切吧。”

“一片乌托邦？”

我朝着门走去。

“你要干什么？”弗罗拉从身后喊道。

“她是去吻一吻我们的孩子，她是去跟他们告别。”

“我要去睡觉，所有这些事都让我恶心。明天我照常把孩子们叫醒。”

我正要迈步进屋，一阵大风把我掀出门外；就像是一个农民把一袋袋多余的谷物往外扔，还带着一点敬意，但还是把它们扔了出去。

“这所房子对你已经关闭了。”弗罗拉道。“跟你的丈夫说再见，”她指令道，“迅速摆脱不愉快的情绪，不要流泪。”

“不要流泪，是她说的。”我丈夫一边说，一边勉强作出微笑的表情。

“快点！”弗罗拉道。

“我希望我嫁给你没有嫁错。”我一边把脸凑近他，一边低声抱怨道。

“一有机会就摆脱她，”他耳语道。“别担心孩子们，我会照看一切，我……我……”

他很快地吻了我一下，头也不回地走进屋去。只剩下弗罗拉和我要去执行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使命。



那女巫开始朝这一小片别墅区的出口走去。她的步伐缓慢，但充满热忱。她背着一个破烂的肩包，肩包的重量把她的右肩坠得斜下去。她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语。她告诫自己万一遇上时间警长时不要感情冲动，还

要求自己在他那无可抗拒的目光注视下保持镇静。同时我也环视着邻里的房子，然后目光久久停留在自己的房子上。假如有人在弗罗拉来之前的几个月告诉我，某月某日你将开始一次时间旅行，你的孩子将酣睡四十天，以及什么时间警署警长之类的事情，我对这种预言会反感得像将要以脸去迎受别人的喷嚏。可现在我却已“陷入其中”，我已经进入了那个喷嚏。但我还没有认命，我小声对自己说：米娜不要怕，我会对付它。“它”会被摆平的，米娜能够驾驭它。

“那么，”我对她说，“我们怎么起飞？骑一只鹅？还是骑扫帚把儿？”我还是不太相信这一切竟然在发生，我决定采取一种妥协的策略：假如你不理解，你就冲过去；也许如果我冲了过去，我就会尽可能快地熬过整个这件事。

“不用鹅，不用扫帚把，也不用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她说。

“可是？”

“我们先到那棵树那儿，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看见了。”她指的是别墅尽头的一棵树；有关是否拔除这棵树的争论已经沸沸扬扬地进行了多年：我赞成拔除，因为它阻碍了车流的行进，但多数派作出了决定：保留这棵树。

“我们到了那棵树旁边，你说点荒唐之极的话，我们就能借此起飞。”

“我要说点胡话？”

“是呵，是呵，你的胡言乱语轻得无与伦比，像你这样的女人懂得如何大量制造胡言乱语。”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你带着我并不是因为我的剧本，

而是因为我的胡言乱语？”

“你充满了胡言乱语。你得不时说点胡言乱语，这样我们就能起飞并继续前进。”

“真是胡说八道。”我说。

就在那一刻，弗罗拉猛地打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别那么对我说话。”她说。“明白吗？”

“什么？”我蒙了。

“下次你再讽刺我，你连脸都别想找到。”

“什么？”

“现在说点胡话！这可是严肃的事！你以为你还在家养花吗！”

她差点打碎我的下巴，我感觉关节都松脱了。

“说胡话，听见了吗？”

我试着朝空气中甩了几句我每天常说的荒唐话，一句接着一句，但弗罗拉直摇头，说：“不对，不对，必须是纯粹昏乱，绝对荒唐的话。”

我们来到那棵树旁。弗罗拉说要为我们起飞准备气体。她从她的破包中取出各式各样的粉末向空中挥洒，念念有词道：“噫，充满物质之空气；噫，显要人物之气息；噫，赫兹利亚之空气，升腾并超越你自己，再度下降向前进，亦上亦下快来临，完毕。”以及其他许多我从来没听说过的胡言乱语。

“准备好了吗？”我看她像是完事了，就问道。

她眨了眨眼，于是我清了清嗓子。我恐怕万一再不成功她会再扇我耳光，我就使出了浑身解数。

“有朝一日，”我说，“我要写出真正有价值的电影剧

本……”

“不错，不错。”弗罗拉一边用手感觉空气一边说。

“有朝一日，”我接着说，“我会写出一部真正有价值的电影剧本，有人将据此拍一部电影并赢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怎么样？”

“太微弱了。你激动得走神了，应该又简短，又愚蠢。”

“简短而愚蠢……没毁掉我的事毁掉了我。”

“不行，再来。”

“是要简短而不知所云？”

“完全正确。”

“还是要冗长而不知所云？”

“简短而不知所云。”

“六个人雨天吃毛巾。”

“对对对。”

“六个人雨天没吃毛巾。”

“好，”弗罗拉说，“快，抓住我，抓住我的衣襟。”

于是我抓住了这个二百岁女人的衣襟，她的下摆有一点松，后来……

我无法描述借助我说的某一句胡话而起飞的感受，并非力不从心，也不是不愿坦白，而是因为，若不用一些其他的胡话就不可能加以描述；为了解释，我不得不说更多的胡话。我只能这么说：胡话助你飞腾——这是确定无疑的。

在我所说的胡话之波上飞行的过程中，我看到我在其中生活与行动的现实在向我靠近，而根本没有离我远去，正像我预想的一样。换句话说，两个相互矛盾的事物在这里起作



用。飞行是发生了，我感觉到确实有那么一次飞行，而在同时，赫兹利亚也离我更近，但它已然变幻，就是说，我不再能在大商场购物，没人会认出我。

在那一时刻，我一点也没去考虑我是在抓着一块乌托邦碎片的裙子，也没有考虑我把三个小孩和一个男人留在了家里，而这个男人是在梦中喂养孩子。我根本没有想什么，现在想起来真是令人称奇。突然间弗罗拉冲我转过脸来。她的脸真是可怕，又长又宽却毫无深度，仿佛她的脸已经在纸上被人碾平并风干了50年。后来我怀疑我的脸是不是也是那个样子，幸好我没办法验证。那种景象你是不会忘记的。

“什么也别提，米娜。”弗罗拉道。“话由我来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区域，其中两分钟之内幻觉多于现实；随后的三分钟现实多于幻觉；后来的五分钟之内，一切都是个弥天大谎，再后来似乎每个人都在说着纯而又纯的真理，但这是一个蓄意的谎言；然后的十五分钟一切都各归其位，以便每个人都可以从意念中恢复过来；再然后又重新开始——两分钟幻觉多于现实，三分钟现实多于幻觉，等等等等。”她安静了一会儿，然后约略地指点着广大的空间，“注意，这里有许多死去的大象，还有不少河马也在这儿丢了魂。你看见了吗？”我点了点头，因为我的确看到了，至少大的轮廓如此。

她继续说：“在地球上灭绝的恐龙带着它们灭绝的消息来到了这里，我看见它们在这儿到达了终点……我认为，我那亲爱的时间警长是在另外一个地点；我全心全意地希望他仍然活着。我们必须到达只存在现实与幻觉或幻觉与现实之差异的区域。你别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我的恋人就在

那个区域，在某个时间点上，天知道是什么时候。小心，米娜，小心！”

我不知道要小心什么；有人告诉你要小心，可是小心什么呢？我四下张望，没发现什么我要小心的东西，可弗罗拉看到了，她又喊道：

“这里有一些非常残酷的瞬间；如果它们把你击中，可以刹那间使你消失。有一个瞬间已经在你耳畔掠过，等一下，”她在衣袋里胡乱摸索了一下，取出一片黑面包。“它们狂热地喜欢黑面包。”她说着把面包投向空中，面包即刻没了踪影。“小心！”她又喊了一声，又扔出一只黑面包。“幸亏我事先想到了。我们必须到达天知道是什么时候的那个时间点。但不用担心，”她看着我说道。“以爱情、责任以及两者结合的名义——我们会成功的！”

我还能说什么，我可没爱上她那位老头，他在天知道何时再呆上一千年我也不在乎。我希望她离我远点，我一点也不在乎。什么？光看看她的脸就能让我哑口无言。

“好。”她说。“你看见那棵树了吗？”她指了指一个巨大山谷中一棵孤零零的树。“我们将在那上面降落。我要你给我准备食物。现在我需要大批量的食物，也许需要三小时的食物。我建议你写一个家族的三代人……每一代人一个小时。别忘了那些原则：把每一个情节线索引向适当的结局：爱、恨、肉欲，嫉妒与贪婪——我要是忘了点什么，你自己去想，你是剧本作家。”

我们降落在果实累累的板栗树的树冠上。她从包里取出一捆纸，从衣兜里又掏出一片黑面包，然后对着我吹了三口气。

“我正把感知残酷瞬间的能力传给你。我要睡一会儿了。”她说就在一个树枝上安顿下来。她像一只蝴蝶一般搂住树枝并刹那间与之融为一体。于是我吃一个栗子，写一页剧本，再吃一个，又写一页，从我头脑中倾倒出成吨的对白，有现成的，有非现成的，千万次地重复；使我惊诧的是第一代人与第二、三代人不单单行为完全雷同，而且每隔30年他们就处于几乎完全相同的境遇，说着一模一样的对白。在写作过程中，几个残酷的瞬间的确出现了，它们看起来像是栖息在树枝上的黑色逗号。它们一旦威胁我，我就把弗罗拉交给我的面包屑投给它们。另外，有一些美好的时刻也来造访，它们唱各种各样的歌，而且一无所求。

在写完两小时的电影之后，弗罗拉醒过来开始吃饭。她吃得比我写得还快，所以我们是同时完事的；更准确地说，我放下笔之后，她只是稍过了一会儿就吃完了。

在做完苦工之后，我瘫倒在树枝上一连睡了好几个小时。醒来时，我发现我们俯临一个巨大的红色的湖，发出一道强烈的悲惨的蕃茄酱味。天气是刺骨地冷，那一片乌托邦却不见了踪影。老天爷，我俯看着那个红色的湖自语道，也许她死了。我爬上树顶去察看这一地区的全景，可我没得出什么有用的结论。这一区域被山脉或半山脉所包围，显然它取决于幻觉与现实关系的状况。无论如何，这个地区极为遥远，而惟一的出路显然是通过这红色之湖。我试图说点胡话并借此飞回去，但我的话落入湖中，激起一处白色泡沫并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让我担心的是附近既没有残酷的瞬间也没有善良的时刻，也没有任何东西我可以问问题或得到答案，不管结果会多么残酷。

我怎么办？我哭了。我坐在树上，为我自己，为我的生活，为我的孩子而哭，为了那些我不再听也不再唱的歌而哭。在我的家，在我的出发点，在我的根据地，每当我把碗碟装进洗碗机时，我总会唱起那些歌。我擦了擦眼睛，站在一根树枝的尖上，交叉双臂，跳进了湖中，我一下进入一部黑白电影之中，不过剧本可不是我写的。

在各种漂亮人物之间游来荡去，我觉得不太舒服。这些人都脸色苍白，说着一位面目不清的剧本作者给他们写的台词。我并不是在布景之中或是在电影里，也不只是在银幕上游荡，而是这也有点，那也有点。我只记得解冻了的对话片断，一个希望，半催眠以及无法射击的武器所构成的场景。还有男主角头发的气味，女主角颈部的香水味，他们接吻的镜头，他后来拒绝她的样子，而她又骂他是下流胚。我没有妨碍任何人，我在那儿如同空无。

电影结束时我被抛回了那棵栗子树。弗罗拉正坐在那儿，说她希望我学会了一点写剧本的方法，应该明白相对于破烂来说高品味意味着什么。她指着下面的蕃茄酱湖，道：“瞧瞧你那令人恶心的剧本对我干了些什么？”

对于这条从来未曾透露给我的新信息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我想冲个淋浴，可又没有淋浴可冲；再说，弗罗拉非常生气。

“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如果你想蒙蔽我的眼睛，那我们什么事也办不成。现在我们的旅行要持续更长的时间，因为我不知道这湖过多长时间才能干涸。你写出胡话，而我把它们吃了。你必须说胡话，而不是写胡话。我真是太生气了，我想揍你。”

她走近我，脸上充满了即将爆发的怒火。她举起手，就要朝我打过来，我想她是要打我的鼻子。说时迟，那时快，我一躲，她那骨节粗大的手就打在一个树枝上，并卡在那儿了。我忍俊不禁。这太逗了，所以我笑了。

“你笑什么？你这蠢材，你这糟糕透顶的剧本作者，你笑什么？把我放开！”

我又笑了起来，这根本无法遏制。

“你如果不把我放开，如果你不把我放开，如果你……”

“什么？什么？”

“我就不告诉你这次旅行到底要花多长时间。”

“什么？”我的笑声僵住了。

“这次旅行，你难道不想知道这次旅行要花多长时间吗？”

“多长时间？”

“把我放开，我就告诉你。”

我折断了树枝，然后她说：

“二十、三十，也许五十年。”

“不——！”我尖叫着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脑袋。“不——，这太糟糕了！”

“太糟糕早就死掉了。”她说。

“这太糟糕了。”我继续喊道。“你对我的所作所为太糟糕了。你把我引入了歧途。立刻把我送回赫兹利亚！”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旅行缩短为几个星期，米娜。”

“是什么？”

“让它尽快结束。就是要抓紧点，加上准时。你必须全力集中于剧本的写作，你必须全身心投入到剧本之中去，直

到完成再收回心思，然后休息十五分钟，再立刻进行另一部剧本的写作！”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为什么不让我清净点？”

“因为我要见我的恋人，同时整顿几个腐败案件。这个任务绝不是容易的事。人们通常都会失败，咀嚼你的剧本能帮我策划和思考。”

“可是弗罗拉，”我面露仇恨地盯着弗罗拉。她注意到了我的表情。

“这是一个不错的出发点，”她说把纸和圆珠笔递给我，“一部以谋杀开始的剧本。内景。卧室。谋杀。”



她需要动作与谋杀，那我就给她写动作与谋杀。我写我所能想到的谋杀以及其他凶险的情节、阴暗的地窖、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我写了三部曲，每部长三十分钟，是关于敌对家族之间的遗产之争，遭受挫折的爱情。另一部剧本是写戈兰高地的酒商之间暧昧可疑的谋杀案，最后是真相大白的结局，一个谋杀犯一命呜呼。在一次恐怖行动中好人也不幸殒命，尽管你在干掉坏蛋之后再把好人也杀掉不太时兴。那老太太把所有这些剧本——犯罪故事一扫而光；爱情故事，她也照吃不误。她把我的风格称为气体现实主义，换句话说，既不全是现实主义，也不全是气体。我说：“不管你叫什么主义，只要能让你满意就行，我们好尽快回家。”

可就在这时，她开始变本加厉地找我的岔子。她一边吃一边说：我作为一个剧本作家的道德困境不够明确。这些剧

本的道德问题没有从适当的角度加以展现。我对她说：“你想说什么？告诉我什么是适当的角度。”只要我能回家，她是不是能把我置于正确的角度我一点也不在乎。

她说一个道德困境本身也应该包括坏人的痛苦，而且，你如果想展现一幅完整的图景，那么好人也不应该那么太好，而要带有超常失误造成的偏差，但对于坏人则是故意的增减。坏人永远不能愚蠢，好人也不能，否则剧本就不会成功。明白了吗？

另外，她还说，你必须保持中立，但也未必。表面的中立非常符合时间警署的利益。她说电影是时间警署所有警员的最佳娱乐手段，电影的发明对他们来说是伟大的一刻。世人早已习惯于电影的奇迹，与此相对照，在时间警署的总部，他们至今仍然会在休息时坐下来看劳雷尔和哈代的电影，仿佛它们是刚刚制作完成的。

这位老妇人继续宣扬道：一部电影剧本的道德困境若加以适当的构思会发人深省。时间警署喜欢让他们客户的思想时时受到启发，尤其是对于那些极其天真的人；当他们的思想受到激发，就会向空中释放出一种波，这种波会打开时间警署办公室的门窗，让那里吹进新鲜的空气。

我不想拿这位老太太口中吐出的所有知识垃圾来为难读者，我在树上一连听了三个月已经够受的了。我还听到了对于时间警署所有可能的分支机构的介绍，以及他们作出决定的过程；这一切与法律全书一样令人厌烦。

我不记得在那棵树上度过的日子里我到底写了多少部剧本，我想大约是二十部或三十部。简而言之，它们都被吃光并消化了。在这期间，湖也干涸了。我们从树上下来，走过

迅速干涸的区域，脚下的路有点像退潮时的海滩。弗罗拉一边拄着一根树枝艰难前行，一边指点着各种各样我可以吃的海鲜；她还从正在消失的湖中拣起遭人遗弃的西红柿并对着合适的目标练习瞄准，主要是瞄向时时袭击我们的残酷的瞬间。她告诉我，她曾经是一名神枪手；在很久很久以前，即上个世纪初，她还年轻的时候曾被派遣去执行危险的使命。她此去要向总部的人表明她还没有咽气呢。



就这样，我们走呵、走呵、走呵（请注意我描述能力之贫弱，我毕竟只是一个被吃光了剧本的作者罢了），直到我们看见一辆棕色小巴，上面用白色字母写着：“伴你一生。”弗罗拉说：“好极了，正是时候。现在，我亲爱的，我们将要进入幻觉与现实，或现实与幻觉的差异地带。你需要戴上这个头盔。”她指了指在岩石上的一种球。“它的构成是——你最好不要知道它的构成物质。”

我把那个像头盔的东西戴在头上。它的味道我真不想形容，就有有点像变质的冰。于是我们上了那辆小巴。用几何名词来描述，我是在某一地带之内的一辆小巴内的一个头盔之内的一个女人，而这一地带将要变为其所构成的两部分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我是一个另一个女人的旅行之中的女人；她与我迥然不同，比我年老得多；我是达成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我们的方向，据我理解是正前方。我们在那辆小巴的后座上安顿下来。弗罗拉说，只要我们在差异地带，我就可以给家里打电话，但我应该现在就打，因为接收强度在迅速减弱。



“电话在哪儿？”我在头盔中问道。

“问司机，”弗罗拉回答；她自身在区域间转换不需要头盔或其他屏障。

“有司机吗？”我问道。

“司机想有就有。一部分路途有司机，一部分路途有手提电话，有时两者都有。”

“现在有吗？”戴着臭烘烘的头盔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有。”

“劳驾，劳驾，”我在头盔中瓮声瓮气地说，“我可以用你的手提电话吗？”

“嘘——，在这儿别说手提电话，这是一句粗话。”弗罗拉道。

“可我已经说了。”

“没关系，他没听见。问他你是否能用他那个东西。”

“什么？我才不干这样的事呢。”

“他们就是这样称呼手提电话的，你明白吗？你反对？该怎么说呢？你不但要适应各个国度的不同的语言形态，还要适应不同年代之间的差异。”

我不知道那个词我是怎么说出口的。事实是：那个东西，也就是手提电话，就在我的手中，我可以对着它说话；换句话说，是通过它说话。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先按 70，之后是 700，然后是 09，再按赫兹利亚的号码。我不相信我会成功，但我竟听见奥维德的声音，他在电话线的另一端礼貌地说。

“你好。”

“嗨，奥维德，你好吗？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嗨，米娜，我简直不敢相信！是你！你在哪儿？”

“我还在旅行途中，现在我头上戴着头盔。一切都好吗？孩子们怎么样？”

“在睡觉。”

“你在梦里喂他们吗？”

“我还能有什么选择？告诉我，你听起来怎么怪怪的？”

“我是戴着头盔说话。味道难闻极了，不过没关系。你  
好吗？生意怎么样？你找到那个小偷了吗？”

“生意好起来了，情况在好转。孩子们也不错，你尽可以放心。一切都不错。你怎么样？”

“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如果我告诉你我这么长时间没打电话的原因，你是不会相信的？”

“什么？”他没有听见。

“我跳进了一个蕃茄酱湖。这个地方整个荒唐透顶，就别问了。”

“是呵，真荒唐，你说得对。把你送到那儿去就很荒唐，我早该阻止她。总之，我早该让她离开我们。你什么时候回来？”

“时间可能会更长一点。好吧，我得走了。这个电话随时可能消失。我不知道这要花多少钱，也不知道我该怎么付账。”

“好吧，米娜，再会。”

我关上电话，迅速把它还给司机，可那司机已经不见了。他回来之后给了我一个账单。结果我需要以生命来偿付那次话费。我的命付一次电话费？

“那是不是也太贵了？”我一边说，一边看了看弗罗拉，

她对司机规定的价钱很是担心。

“不那么贵，”司机道。“这是折扣价，瞧瞧他们，”他指了指两块巨石之间的一堆骷髅。“那是上一回买卖的结局。”

“弗罗拉，想想办法。”我嘶声道。

“请问，”弗罗拉身体悄悄向前探了探，对司机说：“全价是多少？”

“两便士，”司机说。弗罗拉脸上立刻现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我的命难道还不值两便士吗？”我问道。

“放松点。”弗罗拉对我耳语道。

“你有没有两便士？”司机问道。“你要不要发票？”可还没等我回答，他又考虑了一下，道：“等等，你给什么地方打电话？我的东西在哪儿？”

“我都给你了。我是打给以色列。”

“那是什么地方？我从来没听说过。”

“你从来没听说过以色列国吗？”

“没有。”

“那你听说过什么国家？”

“加利福尼亚，日本，马提尼克群岛，保加利亚。”

他试图说出更多的国家，可他又放弃了努力，说：“现在我不知道该收你多少钱。等一等，我要与中心联系。”

“瞧瞧你干的好事，你这笨蛋。”弗罗拉怒气冲冲地说：“他会给办公室打电话，他们就会知道你是从以色列来的，时间警署不会让你入境的，你瞧瞧你干了些什么！”

“就因为我是以色列人？”

“那还会因为什么？”

“以色列人又怎么啦？”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感兴趣。以色列——意味着麻烦，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起，”我说，同时担心这次旅行会花更长的时间。“我只是想给家里打电话，是你告诉我……”

“你真是信口开河。你本可以说你是打到保加利亚的。”

“我怎么知道？”我嘟囔道。“我怎么知道我不应该说是以色列人，而恰恰应该说是保加利亚人？”

那司机正用无线电与他的上司联系，等有了回音，他就问该拿以色列人怎么办。

“你有什么护照？”我问弗罗拉，好像我自己有什么护照似的。

“我们被登记为克里特人。”

我在头盔中深吸了一口气，我感到目前的困境像毒螫般刺痛了我。

“这些皮箱是哪来的？”司机关掉无线电对讲机转过头来问我道。

“什么皮箱？”我问道。我出发时没带皮箱，什么也没带；我是一无所有地离开了家。

“是不是有人帮你打包？”他继续问道。

“没有，我根本没有打包。”我回答道。

“是不是有人交给你一个包裹？是不是有人说‘把这个拿一会儿’然后就走开了？是不是有人偶然塞给你什么东西？是不是有人给了你一包饼干？是不是有人叫你告诉某人什么事同时把一个袋子塞到你手里？”

“没有，当然没有。他想要干什么？”我向弗罗拉问道；

她正看着窗外。

“你说你是以色列人，”她头也不回地说。“现在你就自食恶果吧。”

“是不是有时候你的行李无人照看，是不是有一个瞬间你的眼光离开过你的行李，而有人趁机往你的塑料袋里塞了点什么东西？”

弗罗拉冲我耳语道：“照他说的做。顺水推舟就行，这都是些手续。”

“就我的记忆而言，没有这种时候，没有，没有。”

“就你的记忆而言？女士，我可不能依赖你的记忆。我希望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些问题。”

“她当然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弗罗拉插话道。“你问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清二楚，而问题是你什么时候停止问这些问题。”

“我觉得问完了我就停止。停车。”他自语道。“下车，打开你的皮箱。”他又对我说。

他把那辆小巴停在路旁，然后就不见了，还没来得及再次让我打开皮箱。

“一点也别理会，”弗罗拉一边随我下车，一边说道。“这些是时间警署的安全措施，可这整个是一个大骗局。没什么严重的。你就假装在開箱子并四下摸索，你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就行了。我要到总部去，别忘了我们还有重要使命有待完成。”

司机回来了。我打开箱子，在里面摸来摸去。

“塑料袋里是什么？”

“揷扣。”

“这个呢？”

“鸡。”

“好的。这是你的吗？”

“是的，是大约十块奶油松饼。”

“还有这个，有电吗？”

“没有。”

“嗯……”他沉吟道。“但我想要你把它打开。”

“打开？”

“打开它？”

“好吧，我正打开呢。”

“好，”他向里面窥视了一下，道：“这也是你的吗？”

“是的。”

“还有这个？”

“这儿的東西都是我的。我打的包，我没从别人那儿拿任何东西，我的记忆绝没有问题。”

“那好，剩下的就是电话费的问题了。”他从我的皮箱子摸出两个便士，兴高彩烈地回到那辆小巴，可他接着又沉思了一下，说：

“实际上……我感觉想用枪杀了你。我们正在大减价期间。我不知道在大减价期间是不是能收你两便士。你不能只是宣布大减价，要有诚意。”

“你想杀了我而不想要两便士？”

“让他杀了你。”弗罗拉深思熟虑地说。

“让他杀了我？”

“是呵，让他杀。那又怎么样？让他杀你。”

“如果我死了，谁给你写剧本？”

“你不明白这儿的人都是在吹牛皮。他是说说而已。他说他要杀你，就让他认为他在朝你开枪，就让他认为你身体里有一颗子弹，死掉了。让他杀，干吗不？”

“你要我站在哪儿？”

“哪儿方便站哪儿。”

“这样行吗？”

“很好，别动，我想瞄准。”

“好吧。弗罗拉，你肯定这没事吗？”我对站在我身旁的那片乌托邦问道；她的思绪还在游荡。

“绝对没问题。”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道。

“好，我瞄准了。”司机说。“别动，别动。笑一笑吧，像蒙娜·丽萨那样笑一笑。”

“如果你不介意，我不想像蒙娜·丽萨那样笑。我是米娜，不是米娜·丽萨，也不是蒙娜·丽萨。”

“你说得对，你完全正确，等一下，我得换电池。”

“你的手枪里有电池？”

“我不是用手枪向你瞄准。”

“那是什么？”

“一种迫击炮，一种特殊的手上武器，有特殊效果。”

“你用迫击炮向我瞄准？弗罗拉，他是不是在用迫击炮对着我？”

“让我想想——随便让他拿什么对着你，你有什么可害怕的？你用了他的东西，现在你必须付出代价。让他瞄准。先生请快点，我想在天黑之前到那儿。”

“好，我准备好了；一、二、三。”

“行了吗？”弗罗拉道。我听见了她的声音，可我没看见

她，因为她与我和我的行刑者之间相距甚远。

“好了，她已经还清了债。”他说。

“现在一切都安顿好了吗？”她又问道。

“现在一切都完美无缺，你们可以走了。”

“弗罗拉，”我低声道。

“嘘，”她走近我身边耳语道。“拽着我，假装你死了。放松你的颈部肌肉，让你的脑袋耷拉下来。”

回到小巴里，我听见那司机在抽泣，显然他是在哀悼我的死。他对一些完全虚幻的生灵说我是一个多么有魅力的女人，我是多么杰出；他对我的死是多么遗憾，他甚至没机会把那两便士还给我。于是弗罗拉对我耳语道：“多看看光明的一面。尽管你死了，可你至少给家里打了电话。”

## 5

我们开车行进了一段距离。我们将把风景留待下一次再描绘；换句话说，就是岩石如何让位于树枝、树木与花朵，如何又有溪水、鸟儿，然后又是树木；树丛中又是如何带有很浓密的部分，但那却并非鸟巢；小巴有时会在侧风中摇摆，描写风的插曲我们也留待以后再说。路也不是固定不动的，这是肯定的。问题是我无法活动，因为我要装死。只是在弗罗拉告诉我司机不在的时候我才能坐起来，只有这个时候我才能看一看外面的风景，所以对路的描述无论如何不可靠也不连续；也许在我藏匿装死时发生了比我坐起来所看到的更美丽、更有趣的事情。小巴开得飞快，这毫无疑问；不管有没有司机，它踩了油门急速奔驰；发动机发出那种单调而无可躲避的声音，这意味着你可以相



信它一路都不会出问题。

“那我们什么时候到那儿？”我在某一瞬间问弗罗拉。

“大约在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将到达幻觉与现实之间的地带，两者之间差异的那个区域，其差异取决于某时某地幻想与现实哪一部分更大。我们到那儿之后，不要说你是从赫兹利亚来的，因为这毫无意义；它太小，有可能会失踪，你也可能会失踪，那我就要找你，你也找我，我们两个就会互相捉迷藏。你可以说你是以色列人，但不要说你住在赫兹利亚。”

“为什么？”我又问，她不耐烦了。

“因为你如果说你是赫兹利亚人，他们会开始问你一些令人厌烦的问题。他们会问你在赫兹利亚住了多长时间，天气怎么样，当然首先就要问它在什么地方；他们并非真的对这些感兴趣——他们就是为问而问，想听一听问号的声音。恐怕在你没滋没味地解释赫兹利亚的位置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你让对方感到厌倦，这时你会脱口而出说你写剧本，我吃剧本。这事我可绝不希望让它发生。”

“哎，那么这是个秘密哦？”

“当然是个秘密。我觉得你最好说你住在耶路撒冷。人们常听说耶路撒冷，这会让他们满意。”

“如果他们问我在耶路撒冷的什么地方住怎么办？”

“谁也不会问你，他们最不感兴趣的就是细节。只要梗概的梗概就行，只要有写下来的意愿就行。因此，如果他们知道我吃那些包含各种各样细节的电影剧本就会大为难堪；像诸如此类的细节：银行经理办公室。白天。一位黑美人上场，头戴一顶上插天蓝色和青绿色羽毛的帽子……我又有点

饿了。”

“那他们如果问我到那儿干什么怎么办？”

“你想加入时间警署，你是来参加入门考试。”

我们又一次陷入沉默，路又一次疾驰而过，又一次我们将留待某个另外的机会再讲述。只要指出没有任何其他车辆向同一方向行驶就够了，只有我们，以及现实与幻觉或幻觉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之地的浩瀚空间，其间是伟大辉煌的虚妄。

当司机进入小巴时，我看到了一片灰色的天空和弗罗拉下巴的底部。像那种下巴的底部真是不可想象，要相信其存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像我一样在彼时彼地看上一眼。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为繁复的下巴，尽管我一辈子也只见过二三个人的下巴底部，但我敢保证这只下巴的底部具有惊人的独特性：亿万条皱纹，每一条皱纹都自成体系，并同时生发出更多的皱纹，然后再生发出新的皱纹，直到让人觉得这一切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脸上，真是难以置信。这还仅仅是她下巴的底部而已。这古老神秘存在物的一个缩影几乎让我张口结舌，这当然是在比喻意义上说的，因为我戴着头盔。

我正躺在那儿的时候，弗罗拉开始哭了起来。泪水一点点聚集在她脸上皱纹的网络之中，再向下流到她下巴的底部，然后在那儿所有的皱纹里辗转流淌；有些泪水滑落下来，又曲曲折折地流到我的脸上。弗罗拉的泪水正在沸腾，冒着蒸汽，其温度达到了沸点。每一滴泪水就是一次灼痛，我禁不住暗想：在她的泪管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觉，那一定像一台蒸汽机，她的眼睛又怎么能看见东西呢？

她哭的时候，司机又离开了。我坐了起来，想弄明白司

机不在的情况下这辆小巴是如何继续行驶的；他又是如何在它行经的某个确定地点再度上车的，尽管他没有前进一步。

出于好奇，我还想弄清楚他在外面干什么。车开动时，我好不容易看见他在一棵树旁小便；然后车门再次开启，他又坐在了司机座上，好像这只是一次正常不过的停车。

但我从自己的剧本写作中已经懂得这一套：一个发觉自己被卷入某一阴谋的人、受害者或是帮凶，从来都搞不懂这一阴谋的全部，事情如何彼此相联系，谁为谁工作等等——直到他真正明白的那一刻为止。从我剧中人物的经验来看（包括我以前相对自由时所写的剧本以及我成为这伟大暧昧之体系的一员时所写的剧本），我明白我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去挖掘。目前这一点似乎并非合适的地方，所以我就原原本本地接受了这些稍纵即逝的情境：她流下的灼热的眼泪，他小便后回到小巴却丝毫没有错过一分钟的旅行。

我们到了，怎么说呢——是那种到达的感觉。你到了，而你不想下车，但那小巴又将向另一个目的地起飞，它只停了几秒钟。它要着急赶路，你不得不下车。



那小巴就此摆脱了我们，与它的司机疾速地驶向远方，留给我们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整个在小巴中的旅行通道也离我们而去。弗罗拉与我——现在正静静地——站在一扇覆盖着植物的大铁门前面；那些植物就像是一名影星走上阳台呼吸新鲜空气时漫不经心地甩向她赤裸双肩的裘皮，她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爱上她的角色，而那个人想带着她投奔某个遥远的小镇，她却拒绝了。

“在你触动大门将它打开之前，我对你有一个请求。”弗罗拉说：她已经不再哭了。

“什么？”

“别让任何事情影响你。”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所有你看到和将要看到的東西。不要让它们影响你，我是说你的剧本写作，不要把那些东西写进你的剧本；你的剧本实际上是我的。”

“你是说我不应该把荒诞无稽的东西写进我的剧本？”

“一点不错，”她说。“那些东西根本无法消化，还让我胃痛。最重要的是，米娜，它们对我施加了令我无法承受的负担。”

“对你？”我惊奇地看着她，因为，她自身即她的存在就是荒诞无稽的。

“就是那个原因。”她说指着指大门。

我触动了门，从一棵树后面出现一个眼睫毛巨长的女人；如果我是诗人，我就会说，她就是睫毛，其他全是胡说。她说：

“请进来，我们一直在等你们，你们旅途是否愉快？”

“还好。”弗罗拉道。

“你们一路上一定是又累又饿。别担心，查尔斯一连三天都没出厨房，大家就等你们了。”

弗罗拉瞥了我一眼。我们正随着那女人睫毛扇起的气浪前行，弗罗拉放慢了脚步对我说：

“你吃吧。我从来不吃查尔斯做的饭，但这并不是说我不饿。你吃完之后，休息一小时，然后给我写一部四十分钟

的剧本。”

我默然无言地表示同意。我们走进一座古老的石砌住宅，走上吱吱作响的木制楼梯。弗罗拉对睫毛说了两句就走进一扇门，我则继续跟着睫毛。

“请，”睫毛说着打开一扇大门，然后在我身后关上门，她自己并没有进去。我迈步走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十四个人团团坐在一张桌子周围。我一进门，他们都站起来迎接我，问我旅途如何，是不是太累等等。我得承认在当时我感到尴尬，从来没有人问过我那么多问题。这些人快活到了夸张的程度。

当查尔斯端来第一道菜时，那十四个人（都是不同年龄的男人）分别站起来自我介绍。他们相貌各异，我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亲缘关系。比如说，有一个人是红脸白发，还蓄着胡髭；另一个人则脸长、鼻子尖，黑发飘洒在脸的一侧；还有一个人灰发垂肩，大宽脸膛。有几个人像是某种学生，戴着眼镜，面露犹疑之色。我在他们的眼光中看不到迸发的火星，在场的人也没有任何合谋的迹象，他们都显得直率而端正。

轮到我时，我说我名叫米娜，米娜·丽萨，来自耶路撒冷。我在说谎，可我也毫无选择。听了别人自我介绍的方式，我明白我要想活下去必须要有点名气。如果我说我是来自赫兹利亚的米娜，他们准会用他们的表情把我灭掉，就像明智的老弗罗拉灭掉我的电影剧本一样胃口大开。

坐在我身边的一个男人说他负责整个地区的水暖系统。他转过头来问我米娜·丽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与伟大的列奥纳多有某种联系。我需要立刻给出长度适当的回答；因为

我注意到，在这儿对问题的回答都有最佳长度，其中要以一件轶事开头，但也仅此而已，然后是逗人发笑的事，再加上点现实的结构就能使答案得以成立。于是我说：

“我的名字是米娜，我母亲的名字是丽萨。我母亲是瑞典人，我父亲是比利时人。”

“嗯……”旁边那男人道。

“我母亲去世时，我父亲正在参观卢浮宫。”

“他是画家吗？”

“不，不，他只是在参观卢浮宫。”

“嗯……有意思，你母亲去世时你父亲在卢浮宫。”

第一道菜上过了，我继续道：

“他离开卢浮宫就给家里打电话，他感觉有些不妙。”

“嗯……”

“我接的电话，我对他说：‘爸爸，丽萨死了。’他心情烦乱，头脑糊涂，他说：‘米娜！丽萨！’从那以后，我就叫米娜·丽萨了。”

“啾啾！”

“这儿的水暖系统维护得很好嘛。”我说道，因为我对自己刚才讲的那个傻乎乎的故事觉得不舒服。

“你怎么知道？”那人洋洋得意地问道。

“从鱼的味道就能知道。”

“一点不错！”他快活地笑着说道，同时把叉子在他自己面前挥了一下。

这时坐在桌子末端的一个男人站了起来。我旁边的男人告诉我，他是菲利克斯·沙本先生，负责该区域建筑的保险事务。

“嗯……”

“你必须对这里的每一座建筑进行认真的保险，”他接着说。“这是由于整个地区的特殊性质造成的。”

沙本道：“我建议我们举杯祝酒！”于是大家都举起杯来，我也一样。沙本继续道：“我建议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举杯！为现实与幻觉或幻觉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而举杯！我们所掌握的奇妙差异万岁！我建议为今天从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来到我们身边的可爱的客人举杯！祝您健康！”

“祝您健康！”大家对我说道。我也微笑着说：“祝你们健康！”而我心里却想：奥维德，你这赫兹利亚下流胚，下次你如果没有半点征兆就使那么大劲打我的脸，我就会还手；瞧瞧，就因为你和你们家的老女人，我都落到什么田地了，天知道这都是怎么回事。她在哪儿？为什么这儿没有女人？这个区域的女人都哪儿去了？

“劳驾，”在叮叮咚咚碰杯之后，我问坐在身旁的那位水暖系统负责人，“先生，能否请您告诉我，因为我是从遥远的耶路撒冷来，您能否告诉我女人们在哪儿？”

“女人？”

“是呵，女人，这里男人们的女眷，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女人，她们在哪儿？”

“女人们很忙。”他说。

“她们在哪儿忙？厨房里吗？”

“有些女人在厨房，有些——不在厨房。”

“那么她们在哪儿？”

他没有答腔。不知是哪道菜的盘子给撤下去了。酒杯再次斟满，宾客们的脸上泛起红云。我不再跟那个水暖工搭话

了。查尔斯端着一盘五颜六色的菜肴走了进来，于是大家欢呼：“哇！”

我转向坐在我左手的人，先是平淡无奇地问道：

“那是羊肉吗？”我问道；我知道他们认为对烹饪的无知相当迷人，他们很喜欢。

“那是一只绵羊，”他说。“查尔斯每年都要做……”

“同一只绵羊？”

“当然不是，我们是要吃掉它的！”

“哦，当然，我真傻。我是想说：是不是同一品种的羊？”

“是同一品种的绵羊，分毫不差的同一品种。他们是在某个偏僻的山谷养羊，每次只养五只，否则山谷里的草料就不能在羊之间均分。公羊要用一辆黑色轿车送往前一个时间区；你在路上一定曾经过这个时间区，在那儿现实多于幻想或幻想多于现实。”

我发现他很看不起前一个时间区，你不必成为一个伟大的剧本作家也能感觉到他语调中的傲慢与不屑。

“你知道，”我说；这时上面提到的那只绵羊的一部分被放在我的盘子里。“在那个区域的几个月时间内我没有注意到他们吃什么，实际上我根本没见过他们吃饭；真实情况是，我没在那儿见到许多人。”

“我认为他们是在躲避。在他们那个地方，我也会躲起来，听着，这话别告诉别人：那儿的人很落后。无论现实多于幻想还是幻想多于现实，他们竟然都能够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快乐而满足。总之，在现实与幻想之间不断变动相对性的基础上，你怎么可能建立什么等级制度或文明体系呢？这是



智力低劣的表现。”

“啊哈。”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如果那里的人低等，差异之区的人又能好到哪里去。他却自动回答道：

“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这儿你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差异。”

“你说得绝对正确，先生，这是两者之间的差异。”

“这才是真正的出路。在这儿，只有在这儿。那儿的人不懂这个。”

“你说得绝对正确，先生。”

谈话又一次暂时停下来，可我还想继续下去，我感到一种冲动，我不想再与别人开始一次新的交谈。

“你是不是听说过现实？”我问道。“我是说现实，那些真正发生的事情，那个存在着的 world。”

他困惑地看着我。

“谁没听说过？”

“你当然听说过，先生。我从没有怀疑这一点。你最近听说过什么事，先生？我是说真实世界的新闻，不是指这个差异世界，也不是较低级的区域，你最近听说过什么新闻吗？”

“夫人，”他说。“很遗憾在我自我介绍时你没有听清楚。我是玛可斯。”

“很高兴与您见面。”

“我半是记者，半是报纸。”

我不想去看他的双脚，你不必是一个剧作家就知道报纸是什么样儿。我问他：

“鉴于您的身份，而且我懂得您的职位的重要性，也许

您知道，这里的女人在什么地方？”

“女人？”

“是呵，女人，她们在什么地方忙呢？”

“我愿意告诉你，可你要发誓不告诉任何人是我说的。”

“当然，我发誓。”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就相信我吧，相信我，您得相信我，我必须知道这儿的女人在什么地方！相信我，先生，相信我。我就在这儿，您能摸到我，您就可以相信我。”

“真的吗？”他看着我，眼中充满了恐惧。“我可要把身家性命都放在你手里了，夫人。我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你来自耶路撒冷。”

“您只要这样做就是一位英雄，一位大英雄。告诉我，女人们在哪儿？”

“所有的女人都都在写电影剧本，”他对我耳语道。“那些没写剧本的女人正在被训练写剧本。是差异之地的人发现了剧本写作。现在可不是从前的景象。接着吃，装作你在笑的样子。”

我继续吃着，显得很放松。

“他们用那些剧本做什么？拍成电影吗？”

“你疯了吗？这里可不是现实，我不知道他们拿女人写的剧本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们都散落在本区各处一部接一部地写电影剧本。”

“女人们愿意做这件事吗？她们愿意一部接一部地写剧本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接着吃，装作笑的样子。”

“如果她们愿意，为什么这会是一个大秘密呢？”

“难道你什么都不懂吗？写剧本在这儿是被禁止的。这有可能被误解。你以为大家都明白吗？这是堕落。这里是差异之地，你难道不明白？如果我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笨蛋，我根本不会理睬你。”

“对不起，我不是笨蛋，最后一个问题。”

“绝对是最后一个。”

“我在哪儿能找到一个女人？我是说一个写剧本的女人。”

“我知道在那条大河附近的灌木丛里有女人。真是件丑闻！耻辱！你写剧本吗？”

“不，不。”

“那好，吃最后一道菜吧，是爱尔兰奶油。还有，你可以在女厕所里找到女人。”他说完把勺伸进爱尔兰奶油盆里。

用餐已毕，人们分散到了阳台和花园里。我也出门来到一个漂亮的花园里。这时天气清冷。我朝房间的窗户看去，想找到弗罗拉。我一个窗户一个窗户地顺次搜索，我想我连一个窗户也没放过。有些窗户关着；有些开着，色调柔和的窗帘轻轻飞动，可总也逃离不了窗户。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她仍没有出现。她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倒真让我吃惊，我觉得不太舒服。我知道她一定会很饿，而我也感到一部剧本的构思开始形成；我也想把这一构思尽快打发掉。

一个男人在冲我微笑，他身材高大，穿白衬衫，戴着厚厚的眼镜。我不知道是否我只要报以微笑他就会心满意足，还是他要跟我搭讪。他在原地踟蹰了一会儿，似乎犹疑不决，随后就朝我这边走过来，手里端着一只高脚杯。他问了

那个弗罗拉认为没人会问的问题：我到底在耶路撒冷的什么地方居住。

“在城西区，”我勉强笑了笑答道。“请原谅。”我说着走进了女洗手间。



有时候你走进女洗手间，你会看到一两个女人在大镜子前化妆，而你永远弄不清她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当然我从来没有停下来询问她们的身世。尽管有时我确实想问，尤其是当我碰见某一个烦恼的女人；我想对她说：即使有人痛击你的下巴，而那个人又是你亲近的人，你又无法报警，你总可以跑进洗手间。他不会跟你进女厕所。所以，你应该尽量在大宾馆里过周末，那里有着豪华的女洗手间：洁净的大玻璃镜，香气袭人的香皂；不用碰水龙头，水就自动流到你的手上。女洗手间就是这样。

我现在走进去的洗手间的确宽敞，主色调是一种桔红色，门、洗手池以及噪音颇为夸张的干手器都是那种颜色。但厕所里面很安静，一个人影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剧本作者。在那些小隔间对面，我倚在冰凉的瓷砖墙上，看着镜中的自我；我就在那儿，这个米娜无疑是我本人。我的头发长了一些，灰黑色的发根冒出了约三厘米，在耳畔有几绺头发从我的辫子上散落出来。我不想离镜子太近，我满足于在三米的距离照镜子。这时一个隔间的小窗户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其他隔间都没窗户，惟一的通风管就通向那扇小窗户。

我走进带窗户的小隔间朝外面看去，窗外除了被人遗忘的花园一角之外什么都看不见。花园里疯长着多年无人修剪

的植物。我正要转身离开，我发现隔间里面墙上有一处字体很小、已经模糊了的题词。有人在那儿胡乱写了点什么，也许她的钢笔不出水，或许别人曾经擦过，也可能她自己又改变了主意。

我花了几分钟才弄清楚上面写的是什麼。我从我鞋底上刮了点泥再把它抹在题词上，终于解读出那句话。一阵巨大的羞愧感从我内心涌出，传遍了全身。我不禁摸了摸我的脸颊，我不必照镜子也知道我的脸一定红得像蕃茄。

那儿写的是：“解放一切剧本作者。”我摸不着头脑。解放剧本作者！从谁手里，从哪儿解放出来？解放到哪儿？她们是不是也在说我？

那面镜子方向传来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偷偷朝外面看是什么人。一个女人正站在那儿用桔黄色的拖布擦桔红色的地板：她的面容极其平常，稍有些皱纹；头发也有些蓬乱，但不会惹人注意。当我从隔间里出来时，她有意不朝我的方向看。作为女人，我禁不住观察她的活计。不同的女人擦地的方式不同。我曾见过一个女人把拖布弄出一个洞，然后再把它缠在拖杆上，当时我觉得那女人很聪明，因为这样那块拖布就不会散开来。还有一回我见过一个女人把拖布折叠数次再擦地。这个洗手间中的女人采用的是一种相对流行的方法；她身体前倾几乎与地面成六十度角，把拖把推向前方，然后再两边拖动，不是像我在赫兹利亚那样前后擦。

我一直盯着她看，时间长得似乎已让人无法接受。她停下来对我说：

“女士，请走过去。”

我走到地板已晾干的另一面，这样我只好走到镜子前

面。我散开辫子，然后再编起来。

“劳驾，”我对那位清洁女工道；她又已经起劲地干起活儿来。“我在哪儿能找到染发液？我今天刚到这儿。”我指了指我的发根，有些歉意地笑了笑。

“跟别的地方一样，”清洁女工说。“在商店、超市、化妆品店。看看标牌。”

我让自己显得无助的样子，这一招果然奏效。

“夫人喜欢什么颜色？”

“暖棕色，你瞧见了么？”我指了指我在家里已经染过的头发。

“暖棕色在这里是很流行的颜色，你在哪儿都能买到。”

她只剩下一小块地板要擦。我心想：此刻是难得的机会，于是我问道：

“我从剧本作者那儿买是不是会便宜点？”

她立即将拖把朝洗手间门一捅，“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她倒没有跑出门外。她回身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异常恐怖，我不禁也害怕起来。

“你绝对绝对绝对不许大声说那个词！”她眼睛急速地四下张望，然后一遍又一遍地搜查那些小隔间，双脚在她擦得光可鉴人的地板上踩来踩去。

“剧本作者吗？”我小声道。

“别响！”她说又检查了抽水马桶后面和垃圾箱下面，显然是在寻找窃听装置。“你必须向我发誓不再当我的面说那个词，永远不要，我不想再次经历那一切。”

“永远不会。”我啜嚅道。

我已经打算放弃并离开；这时她突然回心转意，说：

“她们的确有暖棕色的存货，可你现在找不到她们。”她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表。“现在她们正在为她们的主人写剧本。我可以告诉你她们什么时候休息；但是你如果把我泄露出来，上天不容！”

“好吧。”我说。

“好极了，”她说。“她们在晚上八点钟搁笔。”

“那晚上八点钟我在哪儿能找到她们？”

“在湖上的船里面。你与她们在一起，一定要小心你说的话。”

“为什么？”

“她们可不那么友好。就跟她们说你需要染发液，按她们出的价把钱扔给她们。我想她们最多收你一毛二，她们接着就会把染发液扔给你，然后逃开。她们觉得自己遭了抢劫，这使她们内心极为脆弱。告诉我，你真的不想到普通商店去买吗？你只不过多花三分钱，还能避免与她们打交道。”

“我真的不想去普通商店。”

我正要离开，继续我的行程，她又拦住我说：

“你是不是也是剧……剧……”她使了好大的劲要说出那个词，或者是要避免说那个词。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接着说：“一想起那种写作的痛苦，我就觉得不堪忍受，什么‘内景。医生的房间。夜晚’之类的东西。如果你还有点脑子，千万别告诉任何人你懂得写作，不然你会惹一大堆麻烦；他们会让你在这儿痛苦一辈子，你就再不会知道休息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你从哪儿来，女士，可如果我是你，就绝不会去碰一支笔，我只要拖布。”

“谢谢你的忠告，”我说。“我会照你说的去做。”

“我认为要保持差异之地的魅力与独特性，它必须洁净而优美。他们一旦把它填满也就毫无特色了。瞧瞧前一个区域里那些恶棍，你见到那儿的脏物了吧？在剧……里面有许许多多细节，没有细节，就没有剧……我们这儿最不需要的就是细节，它们只会引发难题，从来没有任何好处。一点也没有！”她叫道。“应该把自己的手砍掉，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说。

我离开洗手间，来到大厅里的众人之中。我变得心事重重。那清洁女工的话使我更加怀疑弗罗拉是为那些大家一致默默惧怕的人工作。我害怕弗罗拉这个事实本身也加强了这一怀疑，似乎人们所惧怕的事物之间有某种联系。一个侍者端着盛满甜食的托盘朝我这边走来，我对他微微一笑，向他示意我暂时不需要这些美味。他走了过去。于是我上了曲曲折折的楼梯，去寻找那个带我离乡背井，辞亲远游至此，却已无影无踪的女人。



我来到二楼。这一层有二十个房间，房间里或空无一人，或上了锁，门把手上还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我注意到这些房间的门是那种宾馆里常见的门。这些门看起来倒像是属于同一家宾馆，可当我打开未上锁的门时，我发现这些房间彼此迥然不同；它们的不同到了不可能共存于同一家宾馆的地步，除非是各个宾馆、各个时期和各门派的房间为了某个目的而在此聚齐。也许这就是一家宾馆，也许这里的宾馆就是如此。我问自己：这是不是为了幻想的目的，为了造成令人烦恼的差异的效果而进行的一种



夸张？这种差异当然是现实与幻想或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两者的次序取决于孰多孰少。我就这样想着，尽管有关差异的事儿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

我走进其中一个房间。房间窗户正对着一片湖水以及湖上的空船；湖面反映着斜射的阳光。我看了看屋里的时钟：差十分钟八点。我不知如何是好：或者等在这儿，也许弗罗拉会来找我，同时也可以随便在什么纸上给她写点吃的；或者下楼去看一看船上那些遭了劫而不太友好的剧本作者。最终，我选择了第三种可能性，表面上看是最为方便的办法。房间里墙壁的高处伸出一条铁臂，上面固定着一台电视机，在我旁边的柜子上我发现了遥控器。这遥控器看起来有些陌生，但我很快学会了使用。我按下一个按钮，屏幕上满是各种不同情景中人们的面容，他们的身体也处于不同的角度；大多数时候他们是一些不同的人，但有时又是同样一些人。我想这是一台十分正常的电视机，于是我开始换台，希望能找到像 CNN 或 BBC 等熟悉的电视台；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一些新闻，哪怕是有点印度的新闻我也会觉得新鲜，即便不完全是新鲜，我也会比现在多知道点事。

如果你让自己的手指在遥控器上跳起舞来，你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看到更多的东西，我就是这么干的。可我找不到任何熟悉的台；有各种语言的电视台，而说各种语言的人们忽儿微笑，忽儿表情严肃。但是在四十八频道，我看到一位极显要人物的葬礼。一大群身穿黑色西装的人在棺材后面行进，其中有些人在哭泣。我看见弗罗拉正走在人群中，走在棺材后面队伍的前列，她身穿黑衣，手持一块白手帕，擦着她那滚烫的泪水。

我大惊失色；我把遥控器放在我的膝盖上，身体后仰，以便更好地理解我眼睛看到的景象。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弗罗拉，而她显然终于从屏幕里看见了我，因为她直视着我。葬礼盛大而隆重地继续进行着。最后，以黑色大轿车和丰田车缓缓殿后的整个车队到达墓地，下葬仪式开始了。正在此时，屏幕上突然一片空白并迅速在中心缩成一点，然后那亮点也了无踪影；这时有人急匆匆地敲门。

“是谁？”我叫道，心里充满了恐惧，因为这根本不是我的房间，我答话本身就是个错误。门开了，门廊上站着接待员，他说我呼叫他了。

“我没有呼叫你呀。”我说；可他说我呼叫过，要不然我就是在看四十八频道，反正这在他的监视器上有同样的效果。

“我看了四十八频道。”我坦白道；他要我跟他走。

“可这不是我的房间，”我说。“而且我进门时电视正是在四十八频道。”但那接待员道：“米娜·丽萨小姐，请跟我走，你必须办理入住手续。”

我随他进了电梯下楼。不知又从哪儿突然蹦出电梯来；一切都是个大骗局，弗罗拉说的对。可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重新出现，我们好继续完成我们的使命，或者她至少要让我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电梯是那种老式的，运行极慢，五分钟才下到一层。那男人把我领进一间几乎空空如也的大厅，随手关上了门。厅里的一张矮桌上是一些托盘，上面的开胃酒刚刚被喝掉。在大厅那一头站着的一个人对我说：

“乘萨比娜航班前往芝加哥的旅客，这是最后一次通告；乘萨比娜航班前往芝加哥的旅客，请立即到第二十七登机

口。”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问他道。

“如果你登上去芝加哥的飞机，你就不必交电视使用费。”

“使用电视要花多少钱？”

“本来是五分钱。但因为你使用了高品位的四十八频道，你得出大价钱，啾啾，你得出大价钱！”

“多少？”

“你得写点什么。”他凑近我说道；他身材矮小，脸孔很长，鼻子又皱又小。

“比如说？”我问道，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

“在‘内景、一个大厅、白天’这些词后面的东西，什么都行。”

“一部电影剧本？！”

“不然你就去芝加哥……但我要事先警告你。”

“什么？”

“再过五分钟，瑞士时间，将有一次转换。”

“一次转换？”

“你将感觉到反感、厌恶，接着又是反感，然后是宽慰。这就是当差异转换时发生的情况。到目前为止，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差异我们已经历了一年，现在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即将开始。”

“那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是以色列人，与我有什么关系？”

“这与你是否是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意味着：如果你现在不上这班飞机，你就永远上不去，因为飞机就不

会到达目的地，而这又意味着：如果你留在这儿——你必须写一部剧本。”

“可我不懂怎么写剧本！”

“那你就学嘛，她们没有一个人懂，最后还不是学会了。那些不想轻松学的就苦苦地学。她们都陷在里面了，陷进去了！是的，这是真正的二十二条军规！一个陷阱！”

他突然恶毒地大笑起来。又过了三分钟，我听到飞芝加哥的飞机起飞了，这时转换也发生了：我感到反感、厌恶，接着又是反感，之后是宽慰。

“这次转换很轻松，”一个人走进屋说道；他接着就匆匆地横穿过房间。“很快就过去了，没造成什么伤亡。”然后他从另一扇门出去了。

“先生，”我对留在屋里站在我面前的人说。“我有话要与警方说。”

“请便……”他把电话朝我这边挪了挪。我犹豫地问道：

“要收我多少钱？”

“什么？”

“给警方打电话。”

“等一下，我去查一查。”

他翻阅了一些文件，抬头道：

“两个半普通镜头，或者一个追捕镜头，加上一场枪战等等。你愿意怎么付？”

“一个追捕镜头。”

“我还以为你不会写剧本呢！哈哈，可把你逮着了！”他说。“你想现在付还是以后再付？”

“以后。”

“好吧，拨 17，再拨 900，然后就与警方接通了。”

我照他说的拨了号码。我决心通过正常渠道行事：通知警方弗罗拉失踪了并表明我要求当面与权威人士谈话，我只想把我所知道的事实告诉他一个人。过了许久，警方才接了电话，说：“这里是时间警署，你听到的是一段录音幻觉。我们正在处理已打进的电话，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请等待。同时，我们建议你继续正常的生活，经常来查询，有必要时可以预约。”

我放下了听筒。那人已经开始忙他的活计，他说：“别介意，所有的警察都在参加时间警长的葬礼，葬礼之后将举行时间警署副警长宣誓就职的聚会。”

“时间警长死了吗？”

“是的，我们一直在等他的普通法夫人。她已经到了，现在他们正给他下葬。”他开始收拾那些空托盘。

“他的普通法夫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太清楚，好像是弗罗拉，差不多吧。她比他年轻多了，上层社会就是这样，什么事儿都可能。”他带着某种神秘兮兮的神态又低声说道：“他们说弄得她对剧本上了瘾。”

“让她上了瘾？”

“是他们这么说，我没有查过。这与我没什么相干。你如果问我，这事也与你不相干。”这时钟敲了九响，那人道：

“他们马上就要来把你带走，我的小姑娘，你想不想要一杯咖啡？”

“把我带到哪儿去？”

“带到写剧本的地方。你还没有回答我咖啡的问题呢！”

“好吧，请来一杯。”

我坐在扶手椅上，那人给我端来一杯寡淡的蒸馏咖啡。我问他咖啡要多少钱，他说咖啡是免费提供的。我呷了几口，味道一点也不好。我担心弗罗拉的命运，也担心我自己的命运。她在四十八频道上那种表情——她当时要我做什么呢？跳进屏幕？把她的食物偷运进去？无论如何我还没给她写任何东西，而现在我又对他们负有义务。我边呷咖啡边想：现在是谁控制着谁？连这么简单的事我都不知道，真是乱成一团了。我的孩子们受制于他们的梦境，奥维德受制于他那无法控制的悔恨，弗罗拉显然受制于时间警署的副警长，而我——一个剧本作者——则受制于这个差异之地，差异本身又受制于我已然忘记的什么和什么；还有他们给我的咖啡——在这儿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做热咖啡。



我把小杯子放在圆玻璃茶几上，那男人立即把它撤了下去并消失在一个高高的吧台后面，从那儿传出哗啦哗啦洗盘子的声音。我注意到这个地方在几分钟之内已变得异常整洁。门开了，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走了进来。他向吧台后的人打听他要带走的某位女士。我站了起来，因为我就是那位女士。

他在我前面约两米大步前进，领我沿人行道来到一辆马车旁。我一坐上马车，那几匹马便撒蹄飞奔。尽管当时的情境极为混乱，我还是要非常诚实地说，他的那些马真是棒极了。它们是那么轻盈而自由不羁。我与车夫都没有说话，只有马蹄哒哒哒的声音。六匹马协调一致，沿着曲曲折折的路

飞驰而去，没有一个令人心烦的问题；这真让人大为轻松。

这时夜幕已然降临。

“你是不是办了退房手续？”马夫过了一会儿问道。

“还没有呢。我刚刚办了登记手续，为了退房，我得给他们写点东西。”

“啊哈！”他叫道。“你是剧本作家吗？”

“剧本作家？”

“那你是怎么说呢？”

“不，不，这只是还债。我用了四十八频道。”

“你一定看了葬礼，多盛大的葬礼。真让人遗憾。即便他活了一千岁，一生中成就众多，这毕竟令人遗憾。”他擦掉一滴眼泪。“我们到了。”他说着停下车，勒住了马；这些马可不愿意停下来。

“你自己能对付吗？需不需要帮忙？”

“我能对付。”

“朝这个方向走，那湖离这儿三十米，”他用手指了指道。“但不要一直走到湖边。”

“不要？”

“剧本作者们都在那儿。你在沿路会看到一个洞，你就进去；里面有一张书桌，你坐下来写了剧本就离开。我一小时后回来接你。如果你突然碰到一个剧本作者，告诉她你在工作。她们不会打搅正在工作的人。即便你没工作，你也说你在专心思索。得儿——驾！”他吆喝一声，六匹马疾驰而去。

四周一片寂静，不见人的踪影。我形单影只，只有与孤独为伴。我感觉到我想要对这一情境作出某种结论的愿望在

折磨着我。我站在一棵树旁，就是那种奥维德大加赞赏、大为惊叹的树。我不知道他会对这棵树作何评论。他的父亲，那位植物学教师，曾教过他如何识别树龄。总之，一切都曾经十分清晰明白。而现在，一切都弄得一团糟。所以我站在这棵树旁边也许是想在离开它继续我的行程之前获得一点信心。无论如何，一棵树毕竟是你寄托和倚靠的东西；而当我看到这棵树的树皮上刻着字的时候，我真是不胜惊讶。我看见了，也感觉到了；是的，树皮上刻着六个字“解放剧本作者！”

所以把我带到这儿的那个男人把剧本作者称为剧本作者不只是说漏了嘴。她们在树上刻下口号，把树皮都剥了下来。我查看了附近其他的树，那几个字或高或低，字迹或深或浅地刻在树上：“解放剧本作者！”瞧，我刚刚到这儿一个小时，我可不必那么激动，我心里想着；可我知道，甚至在那一刻我也没能正确地分析局势。

我走进了洞穴。里面每隔一段大体相等的距离都点着油灯。地上松软，我好像是踩在海绵上或是细沙地上。入洞愈来愈深，我不时回头去看洞口。我发现洞口是洞中最黑暗的地方，因为洞外没有油灯，漆黑一团。

“你有什么构思没有？”一个人在我身旁说道；我看出是一个女人的侧影，可能是一个剧本作者。

“请别打扰我，”我说。“我在专心思索。”

“我绝不会想到去打扰你，”她说。“我只想帮助你。这是你的桌子，惟一的问题是椅子。”

我看到了书桌，但真的没有椅子。

“我愿意给你造一把椅子，只用三秒钟就可以。”



她把双手的手指交叉，平放在我身后。我叹了口气，我已经知道我掉进了陷阱，我不需要宾馆里的那个家伙恶声大笑来提醒我，可我还是禁不住感到我越陷越深了。这个女人竟然要我坐在她的手上来写那个追捕镜头。

“你们是不是经常你坐我，我坐你？”我问道；那女人说：

“有必要就坐。请坐吧。你打算怎么处理你的剧本，你想雕刻还是想手写？”

“我想还是手写吧，这样他们来接我的时候，我就可以随身带着稿子以便在宾馆办理退房手续。”

“噢，你这可怜的女人。”那剧本作者道。“你这可怜至极的女人！”

“我不认为我是那么可怜的女人。”我说。“你有纸笔吗？”

“在抽屉里。”她答道。

我拿出一叠纸和铅笔，开始为付电话费写一个追捕镜头。我写的是在广大的想象空间中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部落之间的一场追逐；接着我又为使用四十八频道快速写了一部三十分钟电影的剧本。我还重写了一部过去的剧本给弗罗拉吃。那女人一直为我托着“椅子”，我写完之后她问道：

“我读一读，你介意吗？”

“没关系。”我说。

她站在那儿读完了我写的剧本；她的长发飘落在稿纸上。

“你知道，”她读罢说道，“你写得不错，可我觉得不太可能从这一切之中提取剧本要素。”

“剧本要素？”

“但无论如何你也应该试一试。你想到船上去吗？我们在那儿被掠夺得几乎无法活动。你是不是觉得很累？”

“也许吧，是因为一路劳顿。”

“哦，对了，你是到这儿来旅行的。我忘了，好吧，这是你的稿子。”她把稿子放在书桌上。“我希望你尽快被释放，再会。”

她走出洞外，向右，朝湖的方向走去。我拿起我的手稿，坐在书桌上等待着。我的手指抚摸着那张古旧的书桌，发觉上面有许多划痕，显然是多年来剧本造成的。洞里没有电视机，即便有，我也不敢打开。我在书桌上打了一会瞌睡，然后突然被马蹄声惊醒。我冲出洞外，看见那辆马车冲我驶来，上面坐着那位把我带到这儿的车夫。我挥舞着稿子迎上去，可当马车驶近时，我看到弗罗拉站在那儿亲自驾着六匹马。她经过我身边时甚至没有放慢速度，只是喊道：

“快跑，米娜，快逃命。”随即她消失在黑暗之中。

跑？我心想。我能往哪儿跑？我的心怦怦直跳。她说跑，我就朝某个方向跑下去了。我想我是在差异之地中跑。我跑呵跑，如她所说，我在逃命。接着我听到狗的狂吠、马的嘶鸣，或远或近的枪声，以及各种各样黑暗所自然产生的低语声。我赶忙藏在一个朽空了的树干中，蜷缩在里面，不知此身为何物。恐惧攫住了我，我不知还能不能从那棵树中出来，像人一样舒身展体，再次以女人应有的姿态，体态端庄而谦恭地款款而行。我一点一点逐渐去理解我听到的声音。我发觉在我的听觉范围之内，就在我附近，将有某种聚会。是的，剧本作者们就在那儿，她们在交谈。

“我知道我下个月就会写出我一生的最佳剧本。”其中一位说道。

“你老是那么说，而结果你总是写出最平常不过的东西：内景。将军的房间。夜晚。”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无论如何没有什么能留存下来，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全拿走。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不要忘了莎罗娜前天说过的话。”

“我说什么了？”莎罗娜道。

“你难道忘了吗？你说如果我们写出极品剧本，他们就会难以下咽，就会噎住他们的喉咙。这想法很精彩，你得加强细节。你的剧本里细节不够。发生在克莱拉身上的事再也不能发生了。她写的一部剧本几乎没有细节，瞧瞧她现在的遭遇。”

“可怜的克莱拉。”

“我认为如果有人写出充满细节的极品剧本，就真会噎住他们吗？我根本不相信。”

“如果我们想逃离这个地方，我们似乎没什么选择。我们必须继续尝试，尝试一切。”

“那根本不对！”有人喊道。“那是一个错误。我们必须打破这个圈子，而不是去扩大它。”

“欧赫拉，别冲动！”

欧赫拉继续说：“不存在什么充满细节的极品剧本，根本没有这回事，重要的是故事，情节的线索。只要坚守故事线索，就是好的；不坚守线索，就不好。我们努力过头了。

克莱拉不再与我们在一起也不说明她的路是错误的。”

“胡说！”有人轻蔑地说。

“绝不是胡说，”欧赫拉继续道。“不必要加上你们念念不忘的细节，情节线索越强，他们窒息得越快。情节才是重要的。我们的问题在于情节。如果我们使用情节，他们就能对我们的资料进行筛选并随意加以利用，他们就完全能够控制我们。如果我们找到一个没有任何细节的长长的故事线索，他们就会窒息。你会看到，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咀嚼的东西。他们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有着正常细节的正常剧本，突然间，情节的线就会噎住他们。我听维斯察对罗德里格斯说我们正让他们有好日子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抵得上一个大公司！”

我突然听出说话人的声音，就是那个曾给我当椅子坐的剧本作者。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坚持那么干。”另外一个颇有权威的人说道。“那是一场结局难料的不负责任的赌博。我说我们还是应该继续使用细节；同时也应该调查他们到底拿我们写的剧本做什么！要继续堆积细节，直到他们左右不分，晕头转向。我认为我们不仅要调查他们如何处理我们的剧本，还要找到证据！这是一家工厂还是什么？产品运到什么地方？我不明白，我想弄明白！如果这是一家工厂，他们为什么不付我们报酬？我们有权分享利润！我们要成为合伙人。”

“对呀，对呀，合伙人，利润，我们有权利。”几个剧本作者应和道。

“别废话，”欧赫拉又高声道。“我还要在这部影片里出现多少次？看看克莱拉的遭遇，她是如何英年早逝的。我们

绝不能害怕重蹈她的覆辙。一部情节线强劲的剧本会噎住他们的喉咙；那他们就该知道是什么击中了他们的要害！他们会知道是我们。”

“对对，我们！”二三个剧本作者也应声附和。

“至于所有那些证据，”她继续说。“我们向谁提交证据？你真是天真，小蜜包，竟会去寻找证据，好像你无法依赖你自己的智力……”

“我们会向他们呈交证据。请别叫我小蜜包。我们毕竟应该心存感谢。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这差异之地抚养我们。现在我们要说：够了。我们要介入。”

“感谢……介入……这是什么思维方式。”欧赫拉抱怨道。

那个被称作“小蜜包”的人继续说：“我们要带着证据去找他们，我们要把我们的牌甩在他们的桌子上，对他们说：‘抓到你们了！’我们将加倍获得报酬！我们要求我们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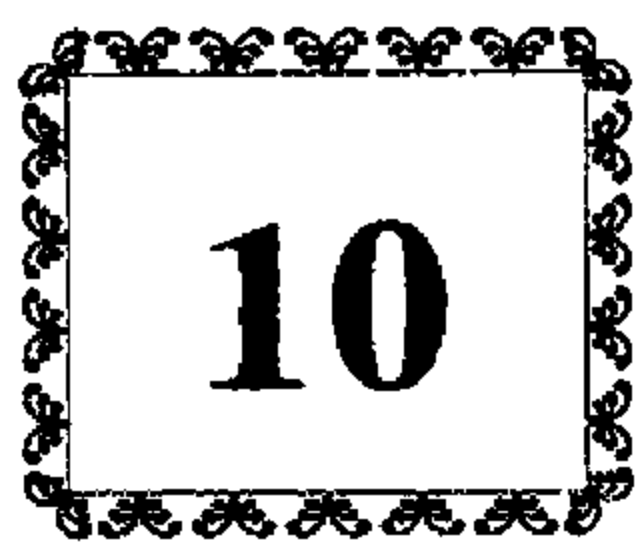
“你在说什么！你真的以为那帮上了瘾的怪物会理睬你的那些证据吗？你真的以为他们会给你你所应得的东西？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给你的，你还欠着他们，你还以为他们会给你你所应得的东西？是啊，他们真会给你你所应得的东西！”欧赫拉窃笑道。

“把一切都寄托在某个情节线上，我亲爱的欧赫拉，你难道不觉得这既天真又荒谬吗？我亲爱的欧赫拉。”

“一点也不……”

她们就这样彼此辩驳，围绕两种可能性不断扩大争论的范围。我终于从树洞里挣脱出来，跟着她们。她们朝湖边走

去，然后各自上了船坐下来。共有二十条船，但黑暗中我看不清船上是不是都坐满了剧本作者。我静静地来到近处，看到她们都在船上安顿下来睡着了。在码头的一端停泊着一条空船，这应该是克莱拉的船。我带着稿子上了船，沉沉睡去。



黎明时分，一种重物扔在身上的感觉把我惊醒。我惊愕地睁眼一看，是一叠空白纸和一支派克笔，笔上刻着：“米娜原谅我奥维德。”我想：难道真的是奥维德要我原谅他吗？自从上次与他通话已经过去了那么长时间。可是当我用湖水洗过脸后再看那支笔时，我发现上面的字迹已经被抹掉了。我自问：这纸和笔是从哪儿来的呢？换句话说，是谁把它们扔在这儿的？我想这也许是我弄糊涂的例行公事。那些剧本作者此时不在船上，她们正在沙滩上玩一个彩色大沙滩球。

我把船摇回岸边，岸上已空寂无人。我不清楚这一切之中哪些已然发生，哪些几乎发生，哪些没有发生，反正效果是一样的。他娘的，我心中骂道。然后我走上沙滩，剧本作者们到哪去了，她们一分钟之前还在这儿，细节派和情节线派都在。我能说什么呢。

我沿岸边走着，湖水掀起的波浪忽儿抚摸着，忽儿退去。过了一会儿，我发现石灰石的崖岸上开凿了一排排的洞穴，洞穴里坐着正在写剧本的剧本作者们。她们的双手与笔锁在一起，双手又与双脚锁在一起，所有作者脚上的锁链又与在她们上方盘旋的涡轮机连在一起；涡轮机正把第一个作

者的稿子吸进去。真是开眼界，我一边惊叹，一边继续观察，后面还有呢。

吸进剧本的机器本身以透明的管道通到树顶，又从树顶通过更粗大的管道接到山上；他们应该是在山上提取剧本要素，之后又不知作何用途。我开始朝山的方向走去，就在这时，我发现我的腿被锁在一条链子上，这条链子又与其他链子锁在一起。在锁着我的那条链子上有一个小标签，上面写着：“欢迎入会。”

我走近三个剧本作者，与她们打招呼，想与她们交谈，可她们都说她们正忙着专心构思，不要打搅她们，要我拿点纸开始干活。

但我不想干活，我手头有一个追捕镜头和重写的旧剧本，我想把它们发送出去。我问其中一位作者工头什么时候回来，她笑道：“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一个工厂吗？我们是自愿在这儿的。我们情愿做这一切，我们是完全解放了的剧本作者。”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求得到解放？那剧本企业的事又是怎么回事？”

她耸了耸肩，想了想道：

“我们不时会有要求解放的冲动，获得解放多么美妙，那自由的一刻。我是说——外景。监狱的高墙。白天。狱门打开。”她说着眼望着山峦。“前几个世纪的数百名囚徒轰然一声怒吼一涌而出！你不觉得这很美吗？”我没有答话，她接着说：“外景。马场上。白天。丹尼尔从狮子的巢穴逃回来，伤口的血渍尚未干透，他拔掉栅栏、马群奔腾而出——自由！你以为有什么能替代自由吗？”

我仍没有回答。

“那五六秒钟，最初的二十分钟，你知道吗？最初的二十分钟最好。后来就会出现新的难题，我想你也必须从它们的控制之下解脱出来。”她说完回到案头继续写作，同时摇了摇头，好像要把刚才说的话摆脱掉。

我发现我可以用手通过身上的锁链，可是我一旦要离开，那条锁链却又阻止了我。我不知该作何想法：我是否被锁住了？我是自由人还是囚徒。也许我已经作出了妥协？但我一直是被迫作出妥协。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争辩也毫无意义，于是我回到克莱拉的船旁。我正要上船，突然间所有的剧本作者在我身后喊道：

“站住！白天禁止上船！站住！”

但我没有听从，这一次我没有听从。我一接触湖水，锁链就从我身上滑脱了。我从水中走过去上了船。我发现船首绑着一条粗线，我用尽全力拉那条线；也许它连着发动机，也许它是剧本作者们根据其理论所缺乏的情节线，也许两者都不是；也许那只是一条绳子。我事实上听到了发动机的声音，船也开始移动，我当然在船里，无论如何我在那儿，不管那儿是现实与幻觉的差异还是幻觉与现实的差异，不然它就是该地自身减十次乘方。

我没有回头朝剧本作者的方向看，惟一的原因是我一心想找到推动船前进的发动机。船高速飞驰在水面上，风迎面吹拂着我的面颊，甚至弄乱了我的睫毛。天哪，天哪，天哪，这条船要把它自己和我带到哪儿去？但事实很简单；到湖对岸去。那显然要举行一场晚会，因为人们正忙着做准备。桌子上铺了桌布，年轻人正爬杆子拉电线，测试照明与



音响，灯光忽亮忽灭，声音忽响忽停。到处都点缀着彩灯。我注意看这些电线接到什么地方，换句话说，供电设备在什么地方。我终于看清所有电线都通向会场附近的一台咔嚓作响的发电机。我把船泊在一丛芦苇后面，然后上了岸。

从竖在岸上的标牌上我才知道这一通大肆铺张是在为时间警署副警长的庆祝会作最后的准备，他将被任命为时间警署的新警长。既然弗罗拉曾经向我灌输过对他的仇视，也许我可以找到他，祝贺他荣升高位，再询问一下剧本作者们的真实境遇：她们到底是自由人还是囚犯；如果谈得来，我还可以问他该把我的文稿交给谁，以便我可以办理宾馆的退房手续。也许，像他们常说的，他可以为我办点事儿，或者加快事情的进程，正如国王在加冕日会宣布赦免令。

可我又想，这些问题也许会让他心烦，尤其那发电机也让我担心。剧本作者是不是也负责燃料和电力？我不禁问自己，但没有找到答案。我发现弗罗拉化装成一个电工，站在一个电杆旁边，手持一盏大灯。

“我早知道你会来，”她一面恐惧地两边张望，一面低声道。“我很高兴能见到你，我很高兴你没有陷在那儿写什么：内景。医生的房间。夜晚。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她吻了吻我的面颊，继续说：

“今夜是一场大聚会，副警长将任命自己为警长。听着，他确实用刺刀杀死了我的爱人。他企图让他对半小时短片上瘾，可我的爱人没有上瘾。他的临终遗言是弗罗拉，弗罗拉，叫了两次。副警长上了瘾，他每天要喝掉一百部剧本的精华素！你想想吧，我吃你的稿子你居然还小题大作！你太娇惯了，你明白吗？”

“你难道不饿吗？”我问道。“你吃过什么吗？”

“现在我吃正常食物了，与我还是小女孩时吃的一样，就像土豆之类的东西，你明白为什么吗？他们想让我今天晚上肥一点。”

“今晚有什么事？”

“今夜副警长将要强暴我。”

“你？”

“所以他要让我长肥一点。这将是一个可怖至极的仪式。我根本无力面对，”她朝我近一点，说，“我过了那个年龄啦，我再也没什么劲啦。”

“他要在这儿干，众目睽睽之下？”

“你以为在哪儿？你如果不来看，我会感谢你的。知道你没有在场观看，我会好过一点。”

“是的，我不会看的。”

“他是想以这个仪式向差异之地的公民，那帮笨蛋证明他的腰腹之中仍充满活力。反正就那么回事。这三天来我一直在吃土豆、大米，土豆、大米，不允许我碰一部剧本。告诉我，”她换了一副表情对我说，“你身上是不是带着点什么？”

“我身上？啊哈，我带着一个追捕镜头，还有一部你吃过的剧本。可是我要……”

“快，快给我，求你，我只要那段追捕。你不知道我有多需要。帮帮忙，就那段追捕。”

“只是一段追捕罢了，相信我，”我试图推脱。“就是几个警察，可能是我所写过的最愚蠢的东西。可我要用它从宾馆里脱身。另一部剧本也是，你知道，我看了四十八频道。

我看见你看着我。你当时看见我了吗？”

“你以为我还有时间看什么吗？他们在那一刻正要埋葬我那一千岁的爱人。把那个追捕镜头给我，我需要忘记，忘记。”

“我跟你说过我要用它从宾馆退房。”

“你说什么？你如果不立即给我——一切都结束了，它已经失效了。今天因为有了新警长，一切都要废除，然后从头开始。新财政年度开始了。把它给我……帮帮忙。”

我把卷起来的那个追捕镜头递给她。她假装咳嗽，吃了一口；用袖子遮着又吃了一口；装作在弄那盏灯再吃了一口。

“告诉我，”我问道。“这儿的剧本作者是怎么回事？以后会怎样？”

“我知道你在到处探听，”她说。“我劝你别惹事。那事比你想象的还要肮脏，真正的鬼花样。”

“是毒品？”

“你说对了。”她说把整个追捕镜头一口吞了下去。

“弗罗拉，”我对她说。“我们该怎么办？”

“从哪一个角度说？”

“在我们的旅行中，我该怎么办？旅行什么时候结束？”

“已经结束了，我亲爱的，就是在我发现我爱人的确是被时间警署副警长谋杀的那一刻结束的。”

“那我已经自由了？”

“是的。”

“那我怎么离开这儿？”

“通过一部剧本。也许你愿意等开往虚构印度尼西亚的

火车，然后在那儿等待下一次差异的转换，也许你会发现自己是在正常的大家都知道的印度尼西亚；再从那儿经过正常途径，飞机或火车，到达本—古里安机场，再乘一辆出租车回家，也许他们会来接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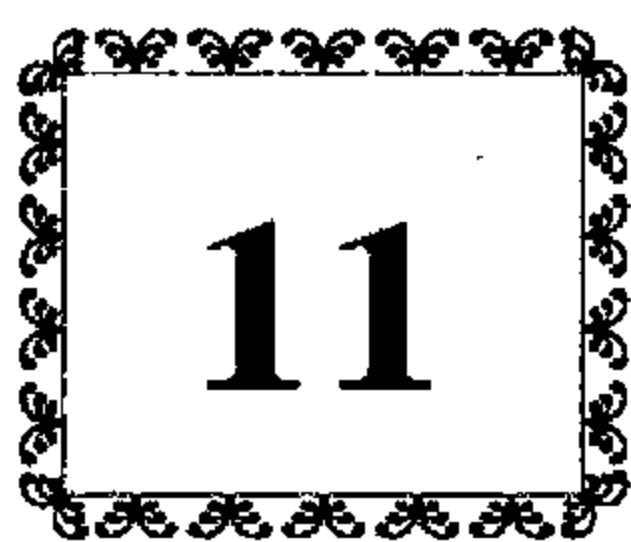
“哪种方法路程更短？”

“等到强暴发生之后，我们会知道得更多。现在我能想到的只是时间警署副警长的手提电话。甚至一位伟大的考古学家也不会在我这儿找到一丝一毫与那手提电话融为一体的欲望。”

“手提电话？”

“在以色列他们叫做某男人的那个东西，在这儿就是手提电话，记得吗？”

“啊哈，”我说道；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好像是说“乖孩子”或“耐心点”，然后走开了。



天色渐晚，换句话说，晚会即将开始，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太阳几乎完全隐没了。宾客开始到达，大部分是中年男人。湖上到处是睡在船上的剧本作者，但其中一条船是空空荡荡的。我不知该怎么办。我不想属于这儿的任何东西，不想属于任何不知其产品归于何处的剧本企业；我不想参加这颓唐的晚会，不想看时间警署副警长强暴他所谋杀的那个人的普通法老婆，不管是不是用他的手提电话。我想回家。

我抢占了一处角落，等待着。表面上看，这次晚会似乎极其正常，是一次鸡尾酒会。人们相互交谈，轻松地欢笑或

互相抢风头。我没有去探究那儿所发生的情况，我沉浸在回家的思绪之中：我是如何回家，他们又是如何欢迎我，门如何为我打开，进屋后门又是如何关上，等等等等。这时，我发现站在我身边的那个剧本作者就是为我提供“手椅”的那位，就是那位力主写出故事线最强、细节最小之剧本的剧本作者，名叫欧赫拉。

“这是怎么回事？你在这儿干什么？”我问她，她答道：

“你仍旧是一窍不通，是吧？”

“很遗憾，我不明白。”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如果我不知道我应该明白什么，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才明白？”

“你应该明白我已经明白的东西，可我明白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明白什么？”

“你难道不明白？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在装蒜？”

“我一点也不明白，真的，我只知道我是在等火车去虚幻的印度尼西亚，要不然我就通过一部剧本离开这儿。”

“真是悲剧，”她喃喃道。“你什么都不明白。也许这样更好。你能承受得了真相吗？”

“什么真相？”

“在强暴之后他们要把我们全部杀掉。”

“我们全部是什么意思？”

“剧本作者，所有十九个剧本作者，我们全部。”

“也包括我？”

“不，我想不会。”

“谁要这么干？”

“你难道真不知道？”

“不，我不知道！”

“时间警署副警长和他的普通法老婆！”

“弗罗拉？”

“嘘……”她止住了我。

“可她……是帮我的。”

“从他强暴她那一刻起，从那件事发生的那一刻开始，她就会忘掉一切去追随他。这是规律。他会把要素直接射入她体内适当的地方。”

“什么要素？”

“我说你是蠢才还是怎么？在他们工厂里生产的最高级的剧本要素。”

“真是这么回事！”

“早晨好。你以为呢——他们用我们的剧本造金字塔和大教堂吗？”她怒声道。“你知道他们拥有的高技术吧，那些实验室？”

“所以这是一项产业，真是腐败！我早就觉得有什么事有鬼，就是不太肯定。谁是幕后操纵的人？”

“一个叫奥维德的男人，大家都为他工作，而他把大家都骗了。”

“奥维德，我丈夫？”

“他是你丈夫？”

“我丈夫名叫奥维德，可我想他是在家与孩子们在一起。”

“也许他不是你的丈夫，也许他是另一个奥维德；我不

知道。无论如何，假如他已经结婚，我可不会羡慕他的妻子。”

“为什么？”

“因为他总是乘直升飞机外出巡游，实地考察。他总不在家，谁知道他是不是给她寄钱。”

“我不知道。”

“你难道不知道你丈夫是不是出门旅行？我知道你们来自现实的人知道的不多，可至少你知道是谁在家吧；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丈夫在国外，你一定知道他没有在厨房里站在你的对面……我明白了，我们对你们的了解比我们认为的还要少。”她自言自语道。

“我当然知道我丈夫是不是在家，”我懊恼地说；当然我不再知道了。我承认在那一刻我曾想过：这是一个我未曾想过的问题。我不再知道是谁去旅行了，我还是他，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在那儿。也许是他去旅行了，而且因为他离开了，我就认为他不在那儿。但如果他离开了，我为什么不在家？

“告诉我，我怎样才能从这一切之中摆脱出来呢？”我问道。

“你必须与时间警署副警长和他的普通法老婆上床，在他向她射入剧本要素之前的一刹那，把要素夺过来，尽量抛向远处。”

“什么？”

“帮帮我们，把我们从这种恐怖中解放出来，什么内景。药剂师办公室。傍晚。……上场。我们彻底绝望了，绝望了，帮帮我，帮帮其他的人。想想我们这些差异之地的囚犯

们所过的生活，我们白天写剧本，晚上独睡空船。我们需要爱，需要一点温柔。难道我们不值得爱吗？我们为什么总是在我们的剧本中遭到喝斥？我们难道不是人吗？我们也只活一次，活得时间也不长。就因为我们被困在这儿，我们被忘却了吗？你是我们惟一的希望。你必须救救我们。相信我，我们不会忘了你。”

“那我该怎么做呢？”

“我是这么想……”

她轻轻拉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出了晚会现场。

“我们到洗手间去，”她说。“我们可以在那儿谈谈。”我们悄无声息地朝洗手间走去。进门一看，同样是处处豪华；漂亮的灯，梳妆台，一切都纤尘不染。还有几面巨大的镜子可以从后面映出你的体形，以及你两边的侧影。她先检查了所有的隔间以确定里面无人，然后向我列举了一系列为把她们从剧本写作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需要做的事。她还重述了她们之间的辩论：有些人认为应以大量细节堵塞整个系统，而像她这样的少数派则认为应以强劲的情节线将其窒息；一个强有力的情节就足够了。

“写一部像那样的剧本可不是容易的事。”她说。

“你是不是尝试过写情节线极强的剧本？”我问她道。

“成百万次，”她说着眼低垂了双眼。“我总是犯同一个错误：我开始眨眼，然后就睡着了。你绝不能睡着，这是必须的，你也绝不能眨眼；因为就在那一刻，那条线就传到别人那儿去了，待我眨眼之后醒来，我就不在同一情节之中了。我就到了另一部电影里。”

“这事是不是也发生在克莱拉身上？她是不是几乎写成



了那种剧本？”

“你怎么知道？”她惊讶地看着我。“她几乎成功了，可接着她就睡着了。睡了个午觉。她一星期没吃没睡没眨眼。但是就在那部电影结束前五分钟，某个想法掠过她的脑际，她眨了眨眼，结果再也回不去了。可怜的克莱拉，她无法承受那种挫折感，跳进了湖中。我爱那位剧本作家。”她说说着眼里噙满了泪水。“她是我的妹妹，我们不仅仅是灵魂上的姐妹，她是我的亲妹妹。”

“我能问个问题吗？”

“什么？”

“你们都从哪儿来？你们是生在这儿吗？你们的父母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父母？”

“是呵，你们每一个人的妈妈，你们每一个人的爸爸。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哪儿？”

“你以为他们在哪儿？这儿，那儿，到处都是。”

“噢，”我继续问道。“可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你们在哪儿学的剧本写作？你们一定是在哪儿学过剧本写作。”

“我们大部分是在我们的祖国加泰罗尼亚学的剧本写作，我们大都是加泰罗尼亚人。我们还有两个爱尔兰女人，一个瑞典人，一个美国人，还有一个疯疯癫癫的犹太女人，她总是觉得自己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我希望她不是我。”我急切地说。

“不，”她不屑一顾地说。“她的名字叫迪娜。你应该读一读她的剧本，真让人恶心欲呕。她认为你只需要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数据，更多的事实。她每开始写一部剧本必然要

预先作一年的研究，但由于幻想与现实之间的转换，她总是丢失她的研究笔记。”她大笑道。

“你们经常读彼此的剧本吗？”

“有时候读。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一部剧本得到实现。实现权不在我们手里。”

“你是说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一部电影？”

“当然没有，我们只是写剧本，我们不看电影。”

“可你们可以去看别人写的剧本拍成的电影啊？”

“不。”

“为什么不？”

“当然是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必须写我们自己的剧本！”她沉默下来，窥视着外面欢腾的草坪。“瞧瞧他们，”她朝簇拥在讲台周围的那群人摇了摇头。“叫他们来，他们就来；叫他们打扮起来，他们就打扮起来。这是他们的大节日。为了看这个强暴场面他们什么都肯放弃。有些单单为了这个仪式托人从本区各处空运来西装。”

我颇有兴趣地看着外面的景象；她回头对我说：

“你真的想帮助我们吗？如果你帮了我们，你在我们的眼中就会成为女英雄。我想你一定明白写一百个英雄故事也无法与一个英雄行为相提并论，尽管它可能会遭到惨败。你怎么想，你会做这件事吗？”

“我不知道。一方面，我一直在为别人做事，为什么要停下来呢？另一方面，我如果死了，或者他们抓住了我，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你有孩子？”

“三个，”我说。“一个十二岁女孩，一个七岁男孩，还

有一个三岁男孩。可他们现在在睡觉。”

“他们会不会成为剧本作者？”她愕然问道。

“我想不会，”我说。“但是在我们那儿剧本写作与这儿不一样，还不是那么糟糕。你只需写——内景。医生的房间。午后不久……”

“不！”她喊道，但她并没有提高嗓音，只是用双手捂住了耳朵。“我再也不想听那几个词组，我受不了！”

“对不起。”我说。

“你应该道歉！”她说说着又恢复了面对我的姿态，显得平静了一些。“这可不是一场游戏，你知道吗？如果你无所作为，他们会杀了我们，他们会把我们干掉，我们还应该有一次机会！”

“好吧，”我说。“但要帮我一个忙。”

“随便什么都行。”欧赫拉道。

“假如我出了事，想办法替我给我的孩子们捎个信儿。”

“告诉我，我会尽力的，我保证。”

于是我把一条给孩子们的两三句的口信告诉了她。除了我的孩子们，谁还会在乎我对他们所说的话？我知道，没有我他们会很不容易，也许那两个小家伙还好点，可我那糊里糊涂的女儿雅黛娜有时候需要有人让她清醒清醒。不管我的旅行是多么虚幻，我还是禁不住害怕：我也许看不到他们长大成人；我也许再没有机会纠正他们不得体的举止，再没有机会坐在他们中间假装心不在焉，然后估摸出事情的原委，再以我所想到的简洁，条理清晰而不为人所察觉的方式为他们去行动。

欧赫拉感到了我的忧虑。她的灰色眼睛注视着我说，如

果她获得自由，她会想方设法把口信转给孩子们；她听起来好像挺高兴。她还说如果她能够到达我们的世界，她将确保我的孩子们绝不会成为剧本作者。她说：我向你保证，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防止这一点。

外面响起一阵有节奏的鼓声。我迅速擦去眼中偷偷流出的眼泪。欧赫拉对我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将要完成的高尚行为。你将在剧本写作的历史上荣耀地占有一席之地。行动吧，我们在注视着你。”

“我到底该做什么？”我们正缓缓朝门口走去，我又问道。

“在他即将给时间警长夫人注射剧本精华素之时，你必须把它抢在手中，尽可能扔向远处，同时大喊三声‘解放剧本作者！’”

“到底在哪一个确切时刻他给她注射剧本要素？是不是与他用他应该用的东西刺入她身体的时刻相重合？”

“他应该用什么刺入她的身体？”欧赫拉问道。于是我说：“没关系，你就告诉我，他是怎么把剧本要素传给她？通过嘴？他是在什么地方把剧本要素传给她？剧本要素如何运到现场？用瓶子吗？谁把剧本精华素带到强暴现场？是有人传递，还是他身上带着剧本要素向她走去？”

她呆呆地望着我。

“你怎么有那么多问题？为了一个行动你需要这么多信息吗？”

“当然，我一无所知还怎么能行动呢？”

“你能，你能行动。”欧赫拉说着走出了洗手间；我耸耸肩膀，跟着她走了出来。路上有许多人朝同一个方向走去。

欧赫拉低声道：“别失败。你如果失败了，他们今夜会把我们全毒死。毒药是差异之地惟一起作用的谋杀武器。”

我站在那儿，而欧赫拉迅速朝码头方向走开了。手擎高脚杯的人们簇拥在一座平台周围。我注意到他们不像在以色列那样挤来挤去，而是彼此说：劳驾，劳驾，劳驾。我礼貌地努力挤过人群，来到离平台最近的一个地方。二百零三岁的弗罗拉正躺在那儿，穿着一件透明的白色睡衣；时间警署副警长从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出现了，腰上围着一条毛巾，手持一个小瓶子。

我周围的人以各式各样的嗓音在议论：来了！瞧瞧他，他可不像是七百岁；他手里拿着精华素；天哪，天哪，我可不羡慕喝这东西的人，谁如果不是这块料而喝了它，那真让人可怜……唔，啾啦啦……瞧他们要干的事……他们要过多久才杀掉那些剧本作者？是剧本作者还是鸡本作者？这帮怪脾气的家伙怎么称呼他们自己？是呵，他们什么时候杀她们？他们是不是会公开展示？也许我们只能听他们说说？我想看一看，反正我已经来了……

我又靠近了一点，我几乎碰到了木制的平台。弗罗拉一见，恐惧地望着我。在所有这一切骚动之中，竟然是我让弗罗拉心烦意乱，这让我有点惊讶。我直盯着她，仿佛四周空无一人。

“走开，”她喃喃道。“你盯着我干什么？走开！滚！”

我绕着台子来到她头边；我怒不可遏，颜面扭曲地对她说：

“你这卑鄙的老女人！快跟我说你为谁工作！”

“你是更卑鄙的女人，走开，我命令你。你想不想回家？”

你想不想见你的孩子？告诉我，想不想？”

我狠狠地捏她的胳膊，使出全身气力要弄疼她。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要不然我就杀了你。这就是你的末日，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哎哟！哎哟！放开我的手！哎哟！哎哟！难道落在我身上的事还不够吗？你又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那精华素是什么东西？”

“如果我吞下那精华素，我就能与你一起回到赫兹利亚，我就不必再吃剧本了，我就能平静地活着，安祥地死在家人的怀抱之中。我想停止这种死后的生命。我想与大家都一样。他们为我从三百六十部剧本中提取出精华。这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太太来说是太多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与大家一样，平静地生，安祥地死吗？”我极其厌恶地说。“为了这个你就让我离开我的家，我的孩子吗？”

她想回答我，可至此一直较为克制的观众开始有节奏地齐声唱道：“动作！动作！”我看了看湖中的那些船。副警长走过来，站在弗罗拉的脚边等待着。我看了看他的脸：在正常生活中，如果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位喜欢“极可意”浴和古典音乐的一家摩托车进出口公司的老板，我一点都不会怀疑；可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显然是喝剧本精华素的瘾君子，一个为达目的无所顾忌的坏蛋。

好几位部长上台作简短的发言，他们对在场的人表示欢迎并宣称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禁卫军即将换岗，一个新纪元即将开始。发言期间，观众们礼貌地保持安静，可大家并没有听，他们哈欠连天；脑袋倒没有动，眼睛却左右

张望。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丈夫奥维德是不是真的与这套人类仪式和电影剧本陷阱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我找不到任何答案，就像眼望着大海的碧蓝，一切都历历在目，就是看不到鱼的踪迹。发言结束，人群又骚动起来。副警长面露渴慕地看着弗罗拉。

弗罗拉对我尖声喊道：

“不要看，米娜，不要朝这儿看。你听见吗？不要看！我一提醒你，你就说出你头脑中出现的最荒唐的话，乘着你最新的愚蠢之波我们会飞回家。不要看！”这时她意识到有别的事在扰乱我，她又喊道：“奥维德是个大好人！这儿的是另外一个奥维德。这儿的奥维德是一个印度血统的英国人，你的奥维德是印度血统的英国人吗？是谁让你有了这个想法？你的奥维德是印度血统的英国人吗？想一想，想一想！”她直喊得声音嘶哑。

该相信谁呢？谁更令人信服？谁是最令人信服的人？我所有的思维线索都断了。那些要求动作的人从四面八方挤压着我，呼出酒精、大蒜和烟草的气味。所有的人都拥作一团，我的鼻子碰着别人的耳朵，别人的鼻子也碰着我的耳朵。副警长向下退了退毛巾，观众大鼓其掌，随即安静下来。此刻，一种无限寂静笼罩了一切，一声鸟叫也不闻，好像真的有小鸟叫过。弗罗拉暴露出她古老的裸体，怎么说呢？一件古董，这两者的相似性不言自明。我回头看了看湖上的船，我看见欧赫拉那美丽的头从一条船上高高扬起，她正在偷看。时间警署副警长打开瓶子，拿着它趴在弗罗拉身上，小心翼翼地不肯弄洒一滴。人们屏住了呼吸；他把瓶子倾侧了一点，弗罗拉张开了嘴。

“快！”欧赫拉喊道。

“快！”弗罗拉喊道。

“快！米娜，快呀！”欧赫拉喊道。

“快！”弗罗拉又喊道。

“时不再来！”欧赫拉又喊了一声。

“真是个可恶的选择！”我叫道。在弗罗拉看来，这在当时是绝对的荒唐话；而在同一瞬间，我双手抓住那瓶电影剧本的精华之精华——我没注意是不是有几滴落入了弗罗拉的喉咙——并尽我的全力朝远处扔去，同时大喊三声“解放剧本作者！”

于是两件事同时发生了：精华素一去无踪，我已经把它扔得远远的；弗罗拉和我也乘上了我当时并非有意说出的荒唐话所产生的强波。一路上，弗罗拉不停地对我气急败坏地说：“你真是个大笨蛋，大笨蛋；那些剧本作者把你引入了歧途！我早就告诉你不要留意周围的情况，你竟然愚蠢到相信她们的话。她们并不存在，你难道不明白吗？”

“可我拯救了她们，”我说。“我知道我解放了她们。”

“你怎么能解放并不存在又无可解放的人呢？”

我没有回答，我不在乎她怎么想。在我们到达幻想多于现实或现实多于幻想的区域之后，我发觉我手上攥着一根线，这不是一根普通的线，这可是一根特异的线，而且线上粘着一张小标签，上面有一行来自湖边停泊的船上的熟悉的字迹：“致米娜，谨致谢意，剧本作者上。”我本想用这个向弗罗拉证明我是对的，可她若有所思，已经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这是一根情节线，我敢肯定；我手中正握着一根情节线，在赫兹利亚我该拿它怎么办呢，我实在不知道。我想



我就把它当作一份象征性的礼物，一个纪念品吧；我把它放在我的牛仔裤兜里。过了一会儿，弗罗拉说：

“我只希望我们不要在赫兹利亚的电影制片厂迫降……”

但实际上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降落在城东的一片田野里，然后我们一路走了回去。

## 第三部 回家

---



我回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买报纸。我想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报纸上毕竟是现实，是真实的生活，是对地面所发生的事实的充分描述。如果他们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哪里还会有人知道呢？我读了读报纸，得知整整过去了七天；在这一周之中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有些事真是可怕，有些事还不那么糟糕，有些事只是不妙而已；还有大量有关政客之间的谈判以及政党内部论争的报道——可能所有这些事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发生过，而且它们都属于过去。

弗罗拉跟上我的脚步有点困难，实际上任何看到我们俩的人都不会认为我们是同路的。在人影长而柔和的时刻，我们走进了那条街。我千真万确地曾在这条街上扮演一个女人的角色。我平日在各种场合

认识的人走过我的身边道：

“嗨，米娜，你好吗？最近没见到你呀。”

“噢，我不是在这儿吗！”我一边说一边继续赶路。

一号小贩和二号小贩走了过去，还有一个穿着四轮滑冰鞋的孩子，却不是我的。我的孩子显然还在睡乡。但只要过一会儿，他们的妈妈就要到了，就会叫醒他们，给他们洗个澡，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比如说：新鲜沙拉，切好的西瓜，还要给他们洗衣服。

我们住的那条街长得像一个故事，一条要走好长时间的弯弯曲曲的街道。既然路那么长，司机就觉得有必要踩油门，我有时候也会猛踩油门。现在许多车都在超速行驶。我的家到了，我说着扭头看了看，弗罗拉正气喘吁吁地站在“禁止停车”的标牌旁。我开门走了进去。

“米娜？”我听见身后传来奥维德的声音。他正站在那儿，双手端着一盘比萨饼，正无处可放。

“奥维德，”我说；弗罗拉走过来看了看我们俩，接过那盘比萨饼，双手伸开，端在身前。

我们倒在彼此怀里，我们之所以没有倒在草坪上，是因为在这类情形下，我们俩用身体阻止了对方的跌倒。倒在彼此怀里的人绝不会脸朝下倒下去，当然条件是彼此跌倒的力量相同，或者其中一人或双方都有力量阻止对方跌倒，以防他或她在倒向他或她的女人或男人怀里的时候使出太大的力气。

“在你们拥抱接吻之后，我想与你谈谈。”弗罗拉对奥维德说。

“我也想跟你谈谈。”我对奥维德说。“孩子们在哪儿？”

我也想跟他们谈谈，我想跟你们大家谈谈，我们都谈谈吧！”

“你妻子救了十九个剧本作者的命，尽管她们不存在，尽管我告诉过她要小心那些人，因为她们是说谎的老手。”弗罗拉道。

“真的吗？”奥维德惊讶地问。

我们进了屋，弗罗拉走在最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你知道她干了什么事吗？”她带着那股气继续说。“她不但没能完成我们为她安排的角色应该完成的使命，我不但没能喝到我应该喝到的东西，在最后一刻，她把它给扔掉了！”

“你拿它做什么？”奥维德问道。他看着我，等待我作出解释，但我上楼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我知道后来他会生气，不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那个，再后来他会觉得抱歉，接着他会变得十分危险。所以我决定现在就去我想做的事，也许以后会更困难。

孩子们见到我很高兴，他们朝我怀里扑过来，没扑准，我也没能抓住他们，结果我们一起滚在地面上。他们肚子饿了，要吃家里的饭；他们还想知道我是不是在园艺及花卉布置会议期间给他们买了什么东西。我问他们是不是一直在睡觉，他们说除了看电视，到邻居家串门以及上学的时间以外他们都在睡觉。我的脑袋一阵晕眩。我掏了掏自己的牛仔裤兜，想知道那根线是否还在；我摸到它还在那儿，不过我没有拿出来。

我知道在楼下正在进行一场主观的信息交换，我焦急地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我听见奥维德走出去甩门的声音，明白那场最后的清算暂时推迟了，我有时间作出计划。同时家

里爆发了一阵骚动。孩子毕竟是孩子。我的双手开始像章鱼的八只脚一样运动起来。他们不要已经冰凉的比萨饼；托盘里的这些饼像是去年做的，他们要别的，我于是开始供应他们。给这个来点薯片，给那个剪纸，再给那个一条拉锁，接着又是收拾，收拾，收拾。我想我一定是连续工作了十个小时。我不时抬头看看天，也许因为那儿似乎是我去过的地方；而现在的现实感，相对于天上的虚无缥缈，会让我感到安慰。同时我也知道，即便我拯救了十九个剧本作者并使她们免于被毒杀的命运，也并不意味着她们会报答我，也并不意味着她们之中的五个会下来承受早晚会来的奥维德的怒火并将其化为一片露水。

房门不停地一开一关，孩子们冲进来，孩子们又涌出去。孩子们属于邻居，他们总是到邻居家串门。他们总想要点什么，像一块饼干，一个鳄梨或是杏，或是真想要，或并不真想要。耐心——我有这种素质真是幸运；对这个，对那个都要有耐心。唉，我想，我与剧本断绝了关系。只要我活着，我再也不会使用这种写作形式——内景。上校办公室。清晨。两个坏蛋上场迅速打开了抽屉……一有机会，我会把我得到的那条线藏在一个抽屉里，压在一些旧文稿下面。

奥维德好几个小时没有回家，我开始替他担心。我不顾我的自尊，敲了敲弗罗拉的房门，进去问她他在哪儿，她是不是跟他说了些什么；她说他走了。走哪儿去了？我问她，同时把房门大开着；她还是面无表情地说他走了。我朝她大喊：“他怎么能走了呢？我刚到这儿，他怎么能这么干？我该怎么办？”我对着墙角嚷道：“他是不是离家出走了？”

“别激动，”弗罗拉迅速换上亲切的语调说。“他没有去

什么地方旅行，当然他也不是自愿去的。你得明白他很生你的气，可他会把这事忘掉的。”

“生我的气？为什么？我干了什么？”我抽泣道。“我在哪儿出错了？我参加了旅行，我做了我能做的。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抑制不住地大哭起来。

“如果你没喊‘解放剧本作者’，如果你没把那瓶药扔掉，它会落到它应该到的地方，它会落在我的消化系统里，那么现在我仅凭意志就能瓦解当今世界上所有最复杂的报警系统，那么我们会发大财，我也就能安祥地死去了。这些年来，我一直想使家族里的某个人富起来，为家族挣一笔财富，却没能成功。人们把到嘴的肥肉都会丢掉，上一个世纪是这么回事，在本世纪也发生过几次。每当我想到有人终于可以成功了——他们反而失去了一切。”

我擦了擦眼泪看着她，没弄明白她到底在说什么。我只感觉到她语调的效果，而不是内容。她继续说：

“你知道吗？由于我的帮助，你丈夫是世上惟一的最有可能破译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密码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最有可能破译世界上最大银行的密码，和世界上最复杂的保险箱密码。你以为我想活下去吗？我早就讨厌活着了，我只想让你们富裕起来，只想结束这无休止的死后生命。”

我摆了摆手，作出一副听天由命的姿态。这些我根本无法理解。这对我来说太严重了，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弗罗拉接着说：

“奥维德卷进了犯罪帮派。他是因为他父亲，那位植物学教师兼赌徒而惹下了麻烦。十年前他向那个帮派的头目保证交给他们最机密的密码，你明白吗？现在他去向他们乞求

保住自己的性命，也保住你们的性命。你明白他这些年来所承受的压力吗？你还以为你掌握着一切吗？你这可怜的小天真！”

“奥维德？匪徒？”

“他只想从别的什么地方重新开始，他只想把世界上十八个最重要的保险箱的密码交给他们，然后带着你和孩子们隐居到什么地方度过余生，而我也要被召回先祖居住的地方。你在电影里看到的所有的人都无法与他惹上的人相比。他们是毫无道德约束的肆无忌惮的生意人，对他们的行动方式也不可能进行跟踪和分析。他们总是掩盖他们的踪迹。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差异之地的人跟他们比起来都是女里女气的胆小鬼。”

“我都干了些什么？”我低声道。

“他除了要他们放过他之外还有一个要求。他对他们说他会把保险箱和警报系统的密码交给他们，但条件是在他们闯入卢浮宫之后让他把真正的蒙娜·丽萨搂三秒钟再吻她的嘴唇。你知道你丈夫是多么爱蒙娜·丽萨吗？可以说他疯狂地爱着她。”

“接着说，”我说道。“摇一摇我，晃一晃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他已经去会见那个给他最后期限的人的代表。在赫兹利亚外城，最后期限是今天上午十点钟。会晤是在海滩上一座废弃的房子里进行。我想他不会再回来了。我对他说过不要去，但没有用。他想先去再说。唉，我们有过大计划，极大的计划。当时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她不禁垂头叹息。

我跌坐在扶手椅上，已经精疲力尽了。

“你是说那个信使会干掉奥维德？”

“我是说他已经完蛋了。”



那天夜里，弗罗拉永远闭上了双眼；她眼睛闭得极其缓慢，如同一朵沙漠之花开放一样慢。一切都结束了，像他们常说的那样。她是在客厅的沙发上去的，我给她盖上了单子。我有幸给她盖上单子并把她裹好。

奥维德一小时之后回来了，说他没死，而是有朝一日会死去，跟大家一样，跟所有的人一样。我对他说，弗罗拉说过他会比我们想象的死得早，他回答说每个人都是死期将至，也都会看到光明尽头的隧道。“现在该怎么办？”我问道，他看着被裹得严严实实躺在沙发上的弗罗拉，喃喃道：

“两百零三年又七天一小时，”他又加上一句：“上帝保佑。”

我想问他我们是不是从此可以正常生活了，可我知道这句话没说完就会消失。我想，假如弗罗拉所说的奥维德深深卷入与匪帮的纠纷之中的事是真的，那我们真的要逃跑了，我是说我们得大规模出逃，甚至要到海外，带着皮箱和假证件。

即便那不是真的——似乎是这么回事，尽管我不敢肯定——只要蒙娜·丽萨安然无恙地呆在她的玻璃柜里，我就有事可做。我将留在家里，全力经营家务，并且不断扩展我的名字 MINA 中的 “I”，也许是每次百万分之一毫米。如果我再次陷入麻烦——我就彻底完了。没有弗罗拉，我觉得我不太可能再次从这儿起飞，不管我说的话多么荒唐。

——完